

黑镜头®

用连续十年追踪摄影报道

惊现中国最底层艰辛民生

中国的故事
第叁辑

精选珍藏本

包围城市

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李海民

著 / 摄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围城市 / 张新民 著 / 摄影.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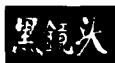
ISBN 7-5613-3014-6

I. 包… II. 张… III. 农民—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摄影集

IV. D42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8916 号

图书代号: SK4N0621



中国的故事

丛书主编 / 黄利 总监 / 万夏

图文编辑 / 万夏 何隽

装帧设计 / 万夏 宋丹

黑镜头—中国的故事 / 包围城市



张新民 著 / 摄影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14.75 字数 / 100 千字

版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613-3014-6/D · 72

定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联系)

封面故事

“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深圳 1992

发售抽签表前的半小时，这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洗出列。他从头到脚全被汗水淋湿，眼窝里挂着豆大的眼屎，手里紧攥着捆得结结实实的钞票和身份证，对着我的镜头绝望地喊：“我排了两天两夜啊……”(p182)

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
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
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

ZITO®

中国的故事
第叁辑



用连续十年追踪摄影报道
惊现中国最底层艰辛民生

包围城市

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张新民 著 / 摄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钟家财的手和脚 深圳 1997

钟家财来自湖南桑植，18岁闯深圳，做过流水线，保安员，饱尝找不到工作之苦，22岁那年干上了洗楼工。





鞋子 云南双柏县 1994

这个少女穿的是她姐姐的衣服和鞋子，旁边是全家赖以生存的下蛋母鸡。



上去再说

江西 1997

春节过后，南下的农民工大量
外出，即使是小火车站也很拥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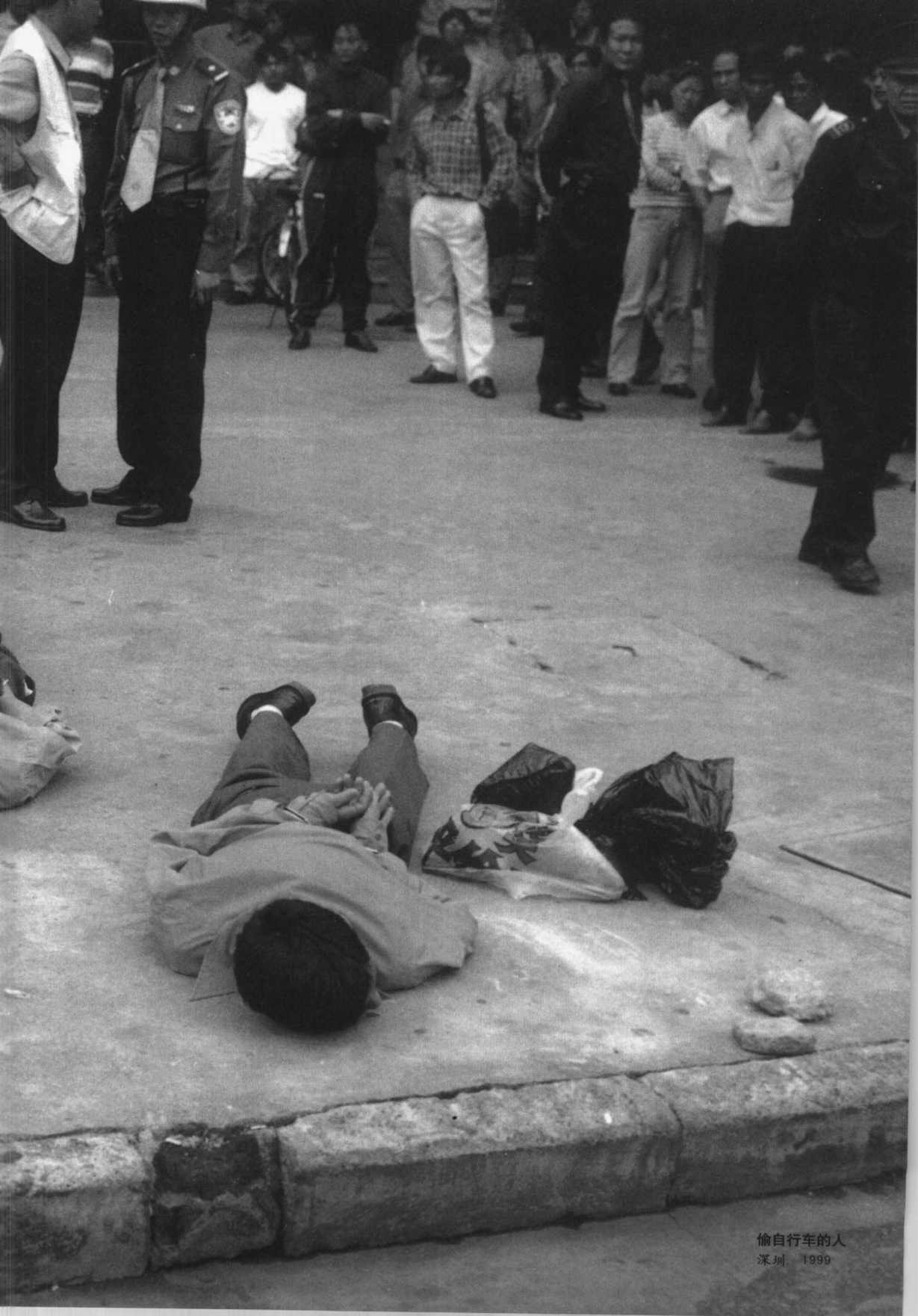


10平方米的空间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来自四川西充县农村的赵云波夫妇住上铺。屋里住的都是老乡，每张铺位把帘子一拉就是一个小家。







偷自行车的人
深圳 1999

顾铮

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

——为张新民《包围城市》所序

美国风景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说：“在我的有关摄影的强烈体验的名单里，包括了在陶厄斯预先看到的斯特兰德的一些底片，威斯顿的肖像与贝壳，斯蒂格里茨的《等价物》系列照片，以及多罗西娅·兰格的高迈的人性肯定，不过我还必须加入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展出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注1]这里所说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指的是亚历山大·阿兰德用雅各布·A·里斯的底片所印放的照片。众所周知，亚当斯是一个追求摄影的纯粹艺术性的摄影大家，但在他的这份名单里，居然会有里斯这样一个从他的摄影标准来看无论如何不会入流的摄影家，这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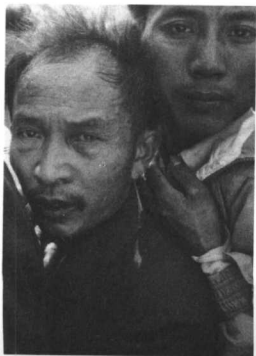
雅各布·A·里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改革家、摄影家，何以获得一向只以艺术性高下为摄影标准的亚当斯的如此隆重的评价？

里斯是来自丹麦的欧陆移民，于1870年抵达美国。里斯登陆之时正值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欧亚移民怀揣淘金梦蜂拥登上“新大陆”的历史时期。而美国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动力为代价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里斯也曾经是这个移民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因此也饱尝了种种苦难辛酸。不过里斯后来成为了一个记者，为《纽约先驱报》采访警事新闻。对于奔跑在采访第一线的里斯来说，他有许多机会面对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了解现实的丑陋一面。而令他最坐立不安的是纽约的贫民窟问题。据记载，在1879年当时的纽约，贫民窟住宅共有21000个，而到了1900年更增至43000个，容纳了400万纽约市民中的150万人[注2]，可见当时移民的生活条件之险恶。

里斯自己来自社会底层，非常同情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并起而用自己的文章为他们鼓与呼，本是天经地义。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他逐渐感到了文字语言的无力。因为语言的描述再怎么详尽总受到文字的限制，无法具体描述许多惨状，尤其拙于表述贫民们的生存空间的整体环境，他们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许多的具体细节。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刚出现不久的摄影。他认识到，在揭露城市贫民的真相方面，照片有其特殊的力量，在某些方面要比文字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因此也更具说服力，更有影响力，并因此可以促使人们起而行，努力消除社会的丑陋现象。于是，他在1888年购买了照相机等一应器材，开始拍摄纽约贫民窟。在拍摄过程中，里斯也受到贫民窟居民的不解甚至攻击，但他不改初衷，坚持实施自己的拍摄计划。在自己举办的反对贫民窟的讲演中，他大量披露了这些自己拍摄的照片。贫民们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马上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并激起了义愤。而他的改善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呼吁也获得了包括宗教人士、社会学家与新闻报刊的编辑等的响应与支持。1889年的《斯库里布纳氏》杂志就以《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为题，在圣诞号以18个版面的篇幅推出里斯的照片，引起巨大反响。1890年，他出版了

脸挨脸，背接胸

广州火车站 1995



同名单行本，再次引起各方对于贫民窟问题的关注。这是第一本以照相铜版技术出版的图文摄影图书，开拓了摄影与文字结合扩大传播效果的新途径。

就在里斯向纽约的贫民窟宣战，以摄影揭露城市丑陋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纷起的年代。他的这些照片也直接影响到了一些政治家。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台奥多尔·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有别于领导美国参加二战的小罗斯福）读了里斯的书，自告奋勇向里斯提出，愿意与他合作一起铲除社会弊端。在他于1895年成为纽约警务评议会会长后，他与里斯一起夜巡贫民窟，大刀阔斧地撤除条件恶劣的警方收容所，整饬警察风气，使纽约的情况为之大变。这可以说是政治家与记者的一次成功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罗斯福与里斯两人之间还发展出了终生的友谊。而里斯也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演讲为主要方式，推动全社会对于城市贫民问题的解决，成为当时推动社会进步的公众人物。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摄影家的里斯，在他于1914年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社会环境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他的历史贡献也逐渐被人遗忘。只是到了惊讶于他的巨大历史贡献的亚历山大·阿兰德的出现，他才重新受到注意并成为摄影史人物。当然，他之进入摄影史并非他的本意，这只是后人对于他的历史贡献所做出的一种评价。当然，以里斯对于社会的贡献，他也应该在社会改革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里斯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想到运用摄影这个视觉手段为社会底层代言，不遗余力地促请公众关注社会问题，以其积极的社会活动切实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几乎晚了100多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头来过。尽管发生的原因、具体过程等全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曾经在里斯照片中出现过的情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有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演。比如，里斯名作《五分钱一个床位》中的惨状，在一个名叫张新民的中国摄影家的照片里，我们发现了变本加厉的翻版。在张新民的片子里，我们更其悲哀地发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共住满了20个人，其中好几个家庭是一家占用一个床位。就是这种现状，使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寝食难安，以他的影像展开了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全程追踪。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以他特有的敏锐与执着，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与里斯只是呈现纽约贫民窟生活不同，张新民所从事的这个影像工程《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描述了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全过程。《包围城市》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的改变，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与谋求个人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对全国30个省市6万多户农民的调查，2001年全国农村共有8961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而据2004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与失业》白皮书显示，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9800万人。此报告还预计未来10年这部分人口将超过1.76亿。这些农民，有的是主动离开贫瘠的土地寻找新的希望，而有些则是无谋开发、政绩形象工程的受害者，被迫失地、离土。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据说也已经高达36%，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加以鼓噪。



股票发售现场

深圳 1992

等候雇佣的“棒棒”们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

1995



然而,这些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甚至令人绝望。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有尊严的解决。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城市远远没有作好接受他们的制度的与心理的准备。他们在城市里所受到的许多对待与他们以前作为一个农民受到的待遇一样,仍然充满歧视,无公正可言。虽然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如此地离不开他们,但城市只是利用他们,并没有想到如何接纳他们,与他们分享城市生活的好处,更没有从他们的遭遇发现城市建设自身的问题所在。农民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中都仍然与城市、城市生活处于对立状态。

张新民的一张高楼擦窗工的照片,就典型地显示了这种对立。他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在窗外工作的农民工。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关系使我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于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是无助的,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这样,他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张新民通过抓取反映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的具体瞬间与细节,提示农民在这个城市中的艰难挣扎。

从张新民的照片,我们还看到,农村中已经只有老人与儿童,大量的青壮劳力都涌入城市而致使农村空洞化。为合法地进入城市工作,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拍摄身份证件照片。而摄影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在这里马上显示出其作为权力控制的特性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视觉制度力量的介入。而他们贴在蚊帐中的美人照片与放大的人民币印刷品,则集中体现了欲望的两个基本形态和现实与内心向往之间的巨大落差。张新民从现实中摘取的这许多瞬间,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并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过程。

当然,张新民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生活现实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已经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张新民,就是以他的摄影观看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被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甚至是有意遮蔽的暗部或者说“另一个部分”作了细腻呈现。

在摄影中,尤其是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中,摄影家与他的被摄对象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议论的焦点。其实,与里斯一样,张新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他从一个四川的小城市流向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心向往之的移民中心城市——深圳。这种经历也许是确保张新民始终能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难并搜集许多细节加以视觉化的根本保证。但是,与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相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新民与这些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摄影就不真诚,甚至还有榨取之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阶层高下落差的平等,其摄影就能够是真诚的?我们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拍摄者的关注对于现实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而且既然是被命名为“底层”,无论谁来表述,除了“底层”自己,其实早就是一个“上层”表述“底层”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但确实需要尽量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碍于社会阶层的高下差异而不去表述他们,那么他们的处境与问

悠着点儿

重庆望龙门码头 1995



题首先就面临无从让人知晓的问题。所以，问题首先不是由谁来表述才是合适的，而是有没有人表述。当然，由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是理想的，但这有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进步与他们自身状况的全面改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只是等待“底层”自我表述的开始而袖手旁观，那“底层”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底层”作为“被表述”的对象，是“表述者”的“他者”。表述者与表述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一致。由于经历、价值观、教育背景等的差异，指望双方一致认可的表述永远是天真的幻想。变形甚至是扭曲（最好不是故意的）则是必然的。但是，“底层”必须“被表述”，因为在“底层”获得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基本权力之前，他们的境况首先需要“被知道”，而此时有人代言是必要的。只有他们“被知道”，才有可能为他们获得发展自身、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字的、视觉的，抑或是文字与视觉的双重的代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需的。张新民的视觉与文字的代言，让更多的人知道底层的存在与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就有着实际的意义。

当然，也有人尝试过让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比如给他们发照相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然而，那也毕竟是被动的参与，一次性的临时参与。从这么一种短暂的过程中，要激发、培养出一种健全的主体性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制度与环境还没有获得基本的准备前，由有社会良知的各方人士为社会底层代言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即使不是完全有效。当然，与此同时，如何促进可以使得底层能够自我表述的制度与环境的准备与建设，如何尽可能缩短底层由他人代言的过程，如何触发底层自我表述意识的生成，如何提升底层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扩大底层自我表述的空间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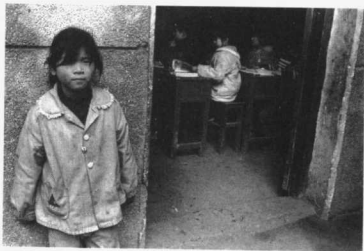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代言表述的悖论效应。张新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实。他曾经拍摄报道过无奈搭建在城市边缘的棚屋区，他的意图是让人知道有这等问题并思考如何人性化地解决。然而，他后来在送出稿子后又有点后悔，生怕这种稿子令他们连这最后的栖身之处也要被剥夺殆尽。收入他书中的一篇《羊城晚报》编辑颜长江的按语就如实地反映出张新民的矛盾心情。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地；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10个平方住10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



教室外的孩子
武汉蔡家田 1995

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做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污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此文道出了现下中国包括有良心的记者在内的有话语权的各方人士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从伦理上说，为底层代言是道德的，但这种代言反而有为行政利用反而使自己陷于不道德之窘境。“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说出了这么一个两难。在一个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与社会援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许多当事官员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刁民”来称呼百姓，习惯上瞒下搞政绩求升官的地方，报道了底层的苦难却反而给已经无法再往更底层下降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又给急欲显示权欲者创造了弄权、炫权的机会，这怎么不让正直的记者踌躇再三？但是，不拍摄、不代言又会怎么样？

在这样的困境中，摄影的无力感就非常明显。如果不与社会其他各方联手，仅仅是摄影与文字的呼号就显然远远不够了。因此，我们在庆幸有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为农民工代言的同时，我们还想进一步发问的是，像与里斯全力合作剪除纽约贫民窟的中国的罗斯福们又在哪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并不像国外的民意代表那样大多数是民选专职代表，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太多时间代表人民，为包括底层在内的人民代言。但是，我们仍然想要发问，在丑陋与不义嚣张横行的今天，只求“政绩”的官员，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可以记者在“发现”了一些情况后，像罗斯福那样，主动与记者联系，一起展开调查并进而革除一些社会痼疾？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做到，那么人民的政治家想来也不难做到。当然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罗斯福与里斯的合作也只是例外。因为从本质上说，官员与记者不应该是如此相互信任、合作无间的，而是应该相互戒备。只有相互戒备才能保证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从事。但民意代表与有良知的记者相互配合，共同为解决问题而合作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行政保持压力，展开督促。但如果记者们捅出社会问题，而记者与行政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时候，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难道只是依靠或相信行政的愿望与能力？如果不能，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我们选出的那些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介入到这场力量博弈中来，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场需要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参加的力量博弈中，立法者往往缺席。于是，记者与行政的较量就往往成了一场没有悬念的博弈。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吁，我们需要像罗斯福这样的负责的作为民意代表的政治家与记者一起关注现实。整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制衡机制，与社会问题作殊死斗争的记者，仍然只是与风车对打的唐吉珂德一个。

我们同样还需要制度层面对于社会进步的各种推动措施。比如，就像里斯的书在当时的美国成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推荐图书一样，张新民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参考读物？尊重人的意识的培养与推广，一是要从小开始，二是要整个教育系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够将此类图书作为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与同情心的参考图书？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了如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配合。而这



“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深圳 1992

就是纪实摄影渗入人心、如何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所能仰仗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当然，摄影家本身如能更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种与社会的互动中去就更好了。

现在有许多严肃的纪实摄影工作者与记者抱怨摄影不受重视，摄影无法在公共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理解、不重视摄影，而是许多权力者与趋权者太善于利用摄影。他们太熟谙利用摄影为自己的政治形象上彩，利用摄影帮助官员打造形象工程，利用摄影为自己谋取私利。应该说，摄影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到了极点。摄影从来就是政治的，而且作为政治的摄影往往为一小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人不是不重视摄影，而是重视摄影过头了。他们重视在明信片上印出光鲜的城市，他们会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做城市形象宣传样本，而其中往往就有利用电脑造假的照片，他们浪费大量公帑搞什么一日新貌之类的摄影活动与出版物，他们会与惟利是图的商家联手将艺术偷换成比赛，并同时中饱私囊。他们喜欢的是曼哈顿化的城市照片，他们要的是人人在莫名其妙地笑的照片。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误导了对于摄影的真切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遮蔽了我们周围需要正视关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大降低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社会能见度。如果摄影只能堕落到以这种方式才能受到重视，获得所谓的认可的话，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摄影与良知的同时堕落。张新民的照片，显然不仅会刺痛许多人的良心，同时也会刺痛某些为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是在故意发难，拆台脚。但是，如果纪实摄影连这点“难”都发不出的话，那么摄影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国的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诸多波折，然而，环视域内，却不见战果向纵深扩大，反见沉滞与低迷，这当然有摄影家自己的责任，但与整个社会环境整体变得唯物、势利，功利与犬儒有相当关系。一方面，一些学者、策展人受命于商业画廊的唆使，挟持资本主义艺术市场逻辑，联手以“艺术”之名排挤纪实摄影，嘲之为不现代、过时；另一方面，肤浅无聊的大众传播媒介则以成功故事蛊惑人心挤占纪实摄影的版面空间，即使是硬派的质报（quality paper），也因广告的无孔不入的侵占版面而使纪实摄影仓惶不知所终，更加之没有一个健全社会所拥有的保持强大社会压力的第三域（third section）社会团体加以支援，因此许多有责任的摄影家就只能是悲壮地孤军奋战，悲从中来。张新民的纪实摄影，显然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以一己之微力就他所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剖切提示，什么是摄影应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的。他以自己的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在中国，这样的摄影家不嫌多，只嫌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作为一个与时代抗衡的手段的可能性与纪实摄影的现实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显得迫切与重要。

在此，还要深切感谢已经为摄影在中国获得大面积的公众认知做了切实工作的北京紫图公司的黄利、万夏两位，他们的热肠与任侠，使张新民的这个文图俱佳的大作有了向中国公众完整展示的可能。



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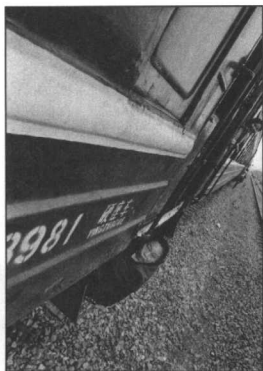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注1]: Alexander Alland, Jacob A. Riis: Photographer & Citizen, Aperture, 1993, New York, p.6.

[注2]: 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北京,p123.



鞋子
云南双柏县 1994



吊在车门外也要走
江西 1997



流水线上
深圳 1992



人力车夫
宁波 1996

目录

序 / 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 顾铮 / I4

第一章 遥远的“黄金海岸” / 22

1. 数据 / 22
2. “山坳上的中国” / 25
3. 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 35
4. “你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 / 41
5. 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 46

第二章 给我碗水喝 / 50

1. 四海 / 52
2. 流水线 / 61
3. 还说四海 / 65
4. 九十三家房客 / 76

第三章 进城 / 88

1. 招工 / 91
2. 山城“棒棒军” / 101
3. 荡悠在高楼之间 / 109
4. “我们打工挣钱，供儿子念书” / 114

第四章 何处是家园 /120

1. 家在何方 /122
2. 的士佬朱国干 /134
3. 伤心家事 /141

第五章 同一片蓝天下 /146

1. 都市里的乡村学校 /149
2. 同一片蓝天下 /157
3. 振兴小学 /164

第六章 人间“喜剧” /172

1. 深圳股潮 /175
2. 别墅养猪牛 /186
3. “传销让我输个精光” /193

第七章 “农转非” /198

1. “我家住在北光小区” /200
2. 深圳百村 /206
3. “农转非”何以人气不旺 /212
4. 关键词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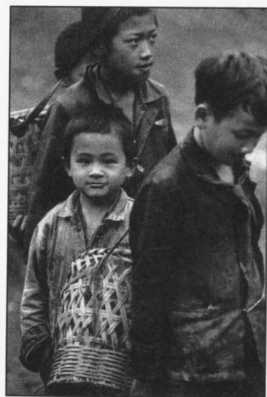
视觉记录与影像选择 陈映芳 /220

我和《包围城市》 张新民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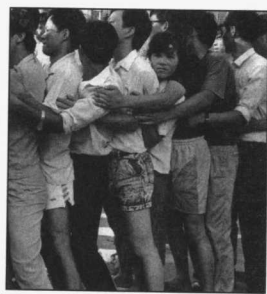
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张新民 /228



破车也行
湖南 1996



背米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抱紧了，别松手
深圳 1992



偷自行车的人
深圳 1999

第一章 遥远的『黄金海岸』

90年代民谣

发东
财西
到南
广北
东中

1. 数据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而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十年降一成》（中新社消息 2002-09-25）

1998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为46 432.2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70.27%。当年稳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约9 500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跨省流动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大省（直辖市）有：四川323万，安徽302万，湖南274万，江西229万，河南215万，重庆177万，广西171万，湖北146万，贵州138万……

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广东省就业的占总数的49.5%，在浙江省就业的占7.7%，在上海市就业的占5.8%，在北京市就业的占5.7%，在福建省就业的占4.6%，在江苏省就业的占4.4%。

进入这6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数的77.7%。在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中，各省（自治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就业去向的主要特征是：

四川省44%和重庆市48%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向广东，流向福建的比例分别为6.7%和10.5%；

江西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59%流向广东，20.4%流向浙江，13.5%流向福建；

安徽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27.0%流向江苏，18.8%流向浙江，20.5%流向上海，10.8%流向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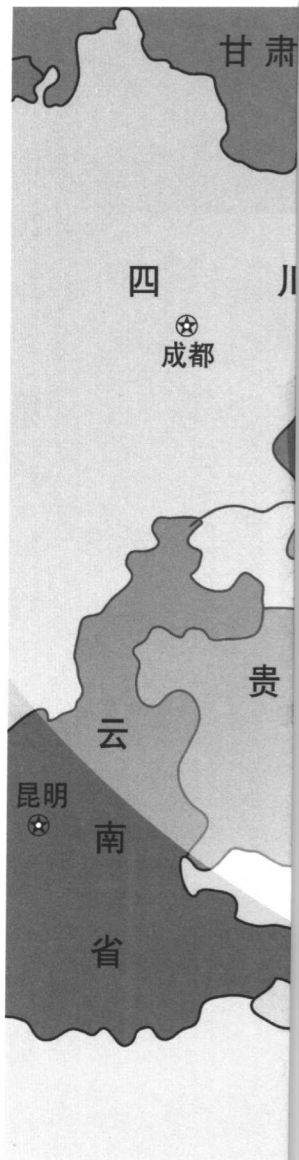
湖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89.7%流向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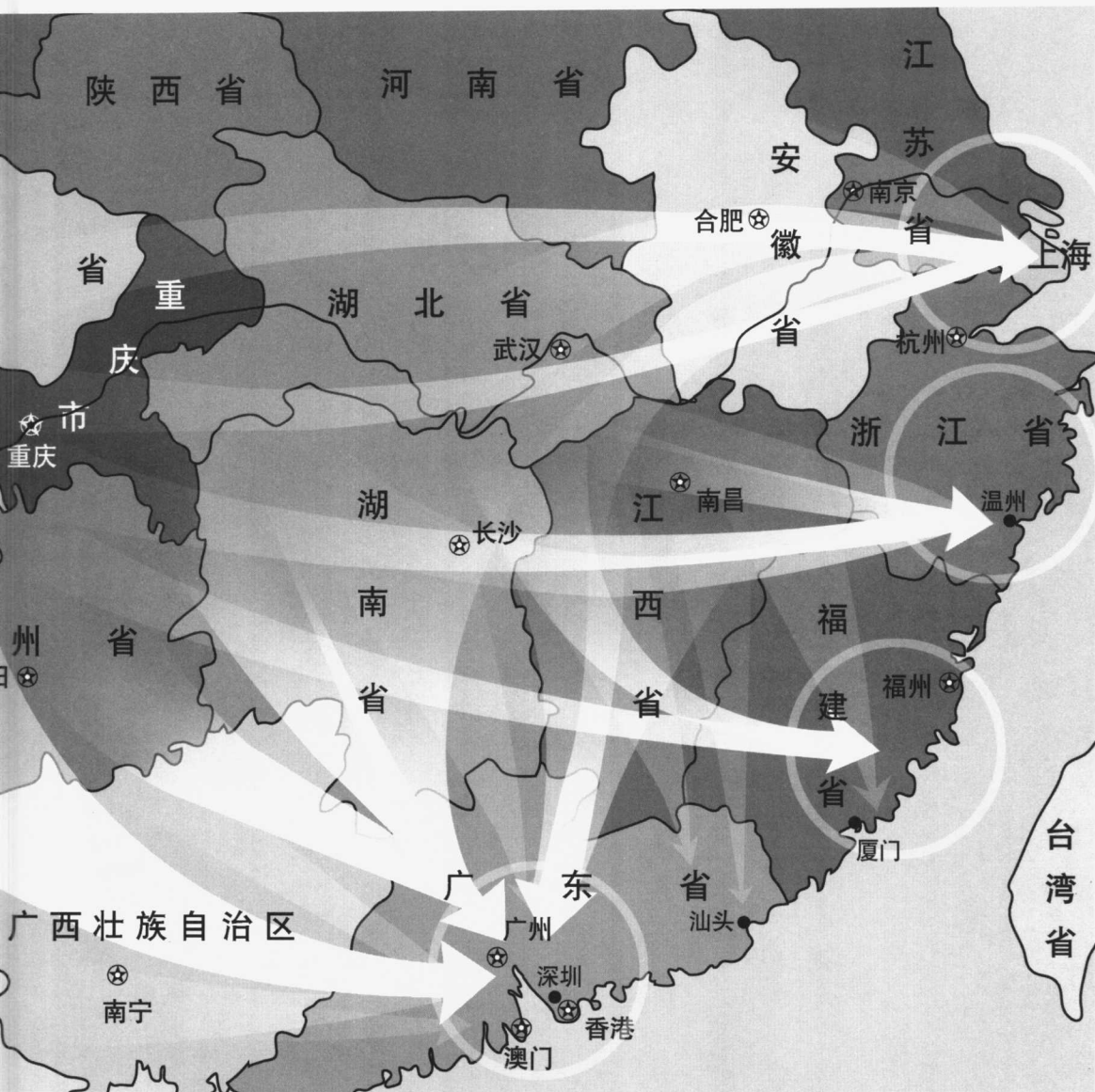
河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42.9%）、北京（占14.4%）；

贵州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69.4%）；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跨省流动农民工的97%流向广东。

进入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占20.8%）、四川和重庆（占16.0%）、江西（占15.7%）、广西（占13.8%）、湖北（占11.0%）和贵州





跨省农民工流向示意图

(占 8.5%)。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工占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的 85.8%。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力就业及劳动状况（1999）》（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数据里的“稳定转移”，指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从数千万迅速上升到 1 亿左右，其中 20% 是跨省流动，约 2 000 万左右。这 2 000 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统计数字显示为 49.5%）涌入广东，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以及沿海的汕头、惠州等大、中城市。



(左页图) 出发之前

云南贡山县吉木斗乡 1997

怒江大拐弯到这里江面呈现出罕见的平缓，独木舟从远古用到现在。怒族村民罗永华和儿子正准备驾舟捕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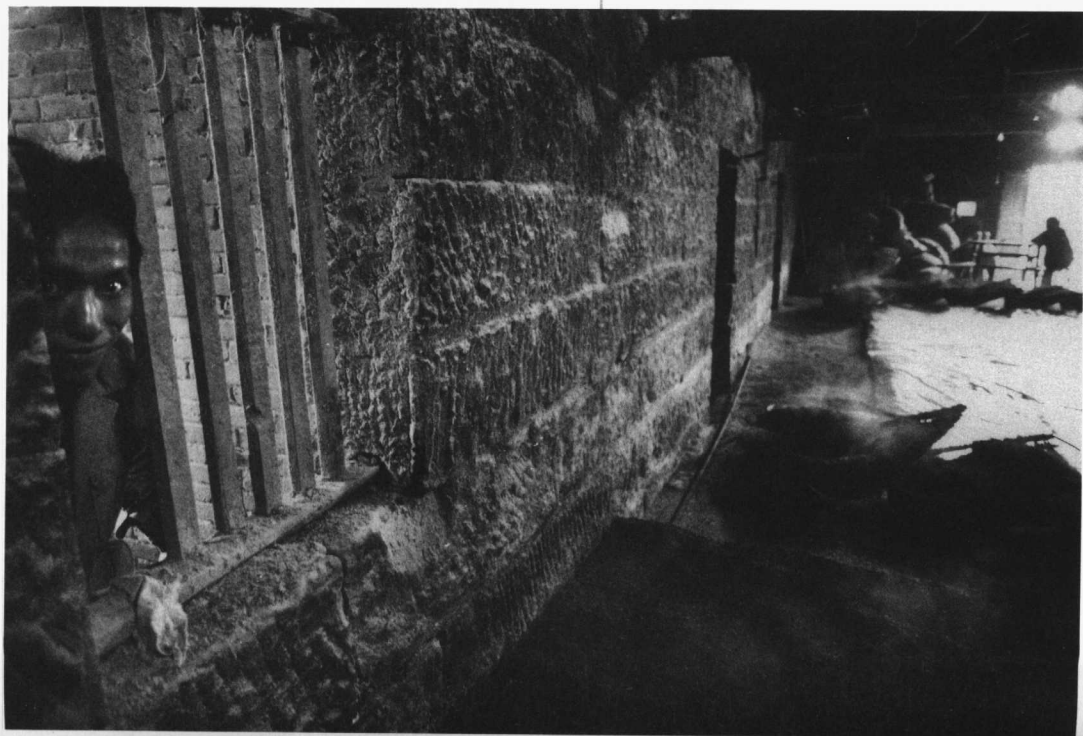
2. “山坳上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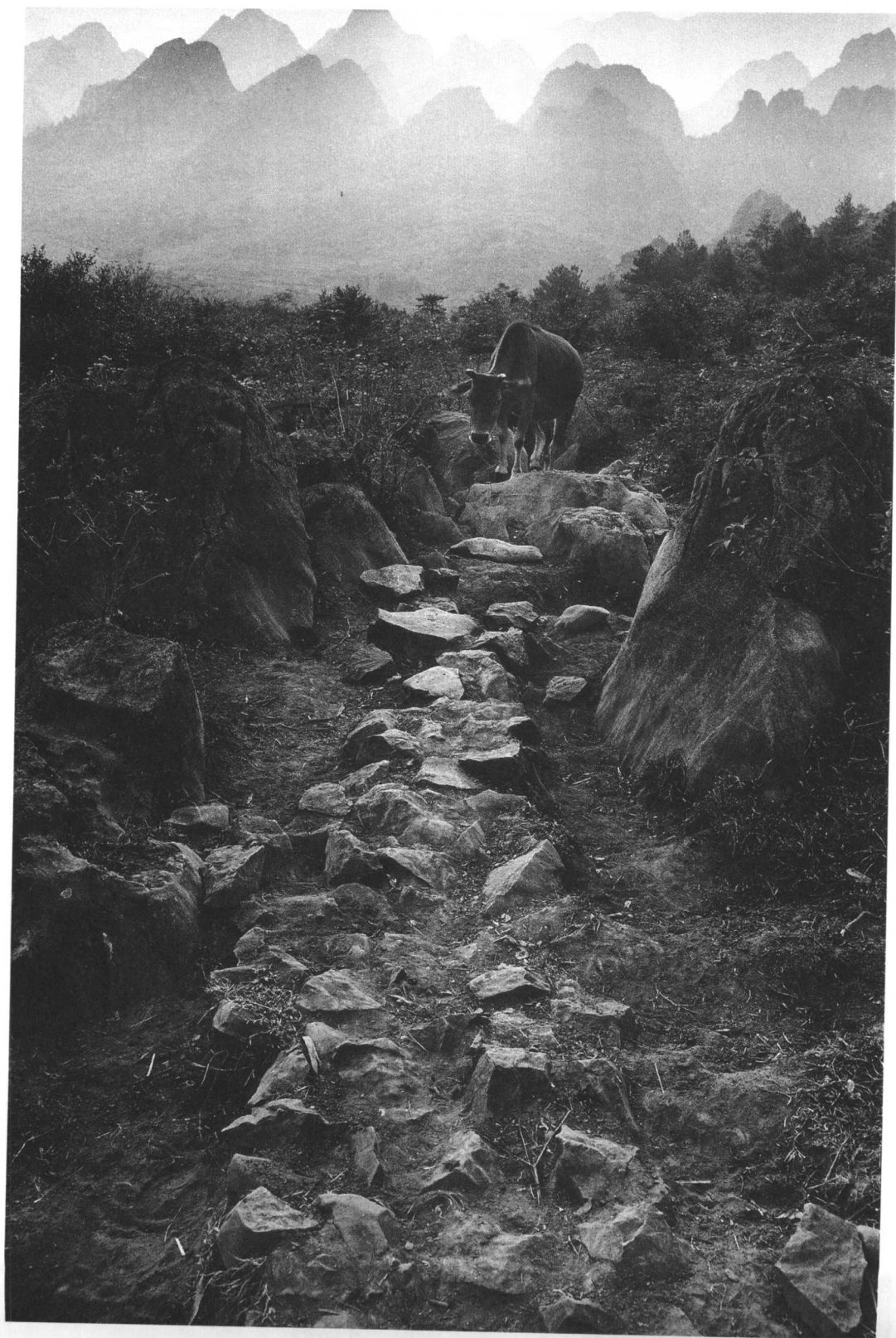
鸡公车，圆又圆，
推起婆娘赶孝泉。

鸡公车，一种木头做的手推独轮车。车架像大写的A，车轱辘穿在A中间那条横杠上，推车人握住A的两脚，肩膀上担着挂在A脚上的一条肩绳保持平衡，手腿腰肩协调用力，屁股扭得溜圆。车可载物，也载人，据说这就是木牛流马，发明者是诸葛亮。这种原始的车，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还很流行，乡镇或者县城街中央的石条路面，可以看见很深的一条沟，那就是鸡公车的车辙。孝泉，川西坝子一个古老的集镇。童谣里说的是，汉子用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推着他婆娘（妻子）去赶集。很浪漫的画面。

村里最大的企业——酒厂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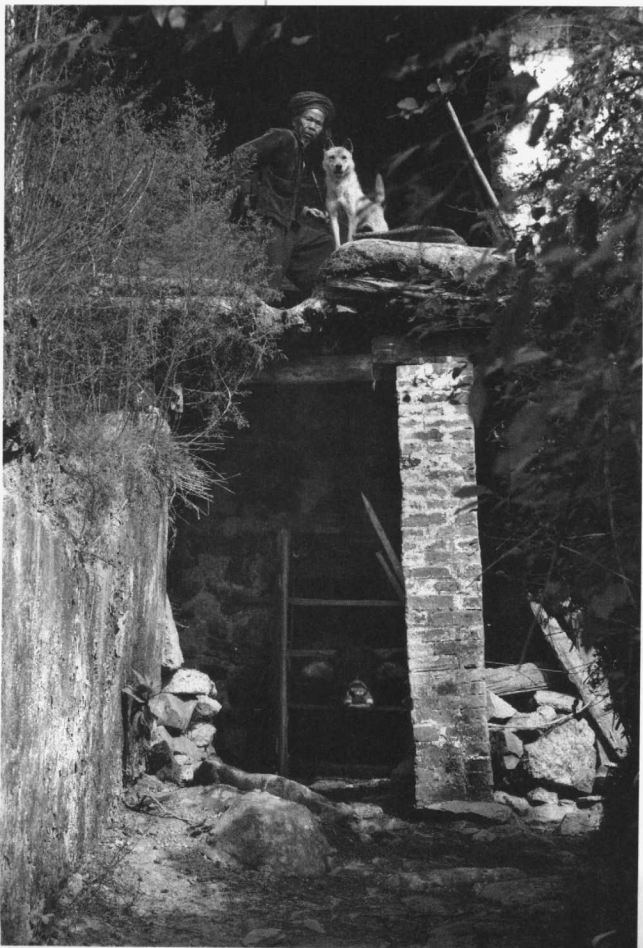




(左页图) 山道崎岖

广东连县 1991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是非常明显。90年代以后，东部高速发展，地区差距急剧拉大。1994年，三大地区差距比为549:212:100，而且呈上升趋势。即便在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广东省，地区差异也非常大。



我第一次出“远门”就坐的是这种车。祖母想带我回她娘家看看。祖母的娘家在25公里外的松林乡，那时候当然没有任何车可坐，只有鸡公车。车轱辘的木拱架上垫两捆谷草就是座位了，小孩靠前，老人靠后。松林是个山乡，进山以后羊肠小道那个颠呀，现在想想也只有鸡公车才可能胜任。坐在车头，看着绵延不断的山丘和坑坑洼洼的小路，我不住地问还有多远还有多远？问得推车汉子都“毛”了，说：“已经走了大半天，快了！”

1991年在广东连县苗族聚居的山区，我又看到了那样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过这里羊肠小道的那个崎岖，即便是鸡公车，也无能为力。远处奇峰拔起，山野间乱石峥嵘，牛和人把石头踩得铮亮，就成了路。哞——，拐弯处传来牛叫声，孩子们光着脚，妇女们背着柴火，走在山道上，消失在半山腰的村寨中。

记得那一次在苗寨，进出任何一户人家都不用敲门，不用敲门是

因为根本就没关门，哪怕家里无人。不闭户，可能被外人说成是民风淳朴，而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屋里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可让小偷偷眼红而伸手。除了睡觉的床和装粮食的木柜子，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这里也是广东。

儿时的松林乡和这里的苗乡，时隔三十多年，相距数千公里，却都把一条同样难走的小路留给了我的记忆。粤北的，我拍成了照片；四川的，我只能记住相关的童谣。

穷乡与僻壤是一对双胞胎，不发达，总是和路不好走连在一起。

过后我老是想起有一本曾经很走红的书，书名叫《山坳上的中国》，想找来看看，可是一直没找着。

格局 广东连县苗村 1991

上层住人，下层住牛。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辖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共有29个乡镇，260个村(办事处)，总面积14703平方公里，居住着傈僳族、白族、汉族、怒族、普米族、彝族、独龙族、纳西族、藏族等21个民族。据1996年统计总人口456729人，92.3%为少数民族，其中傈僳族占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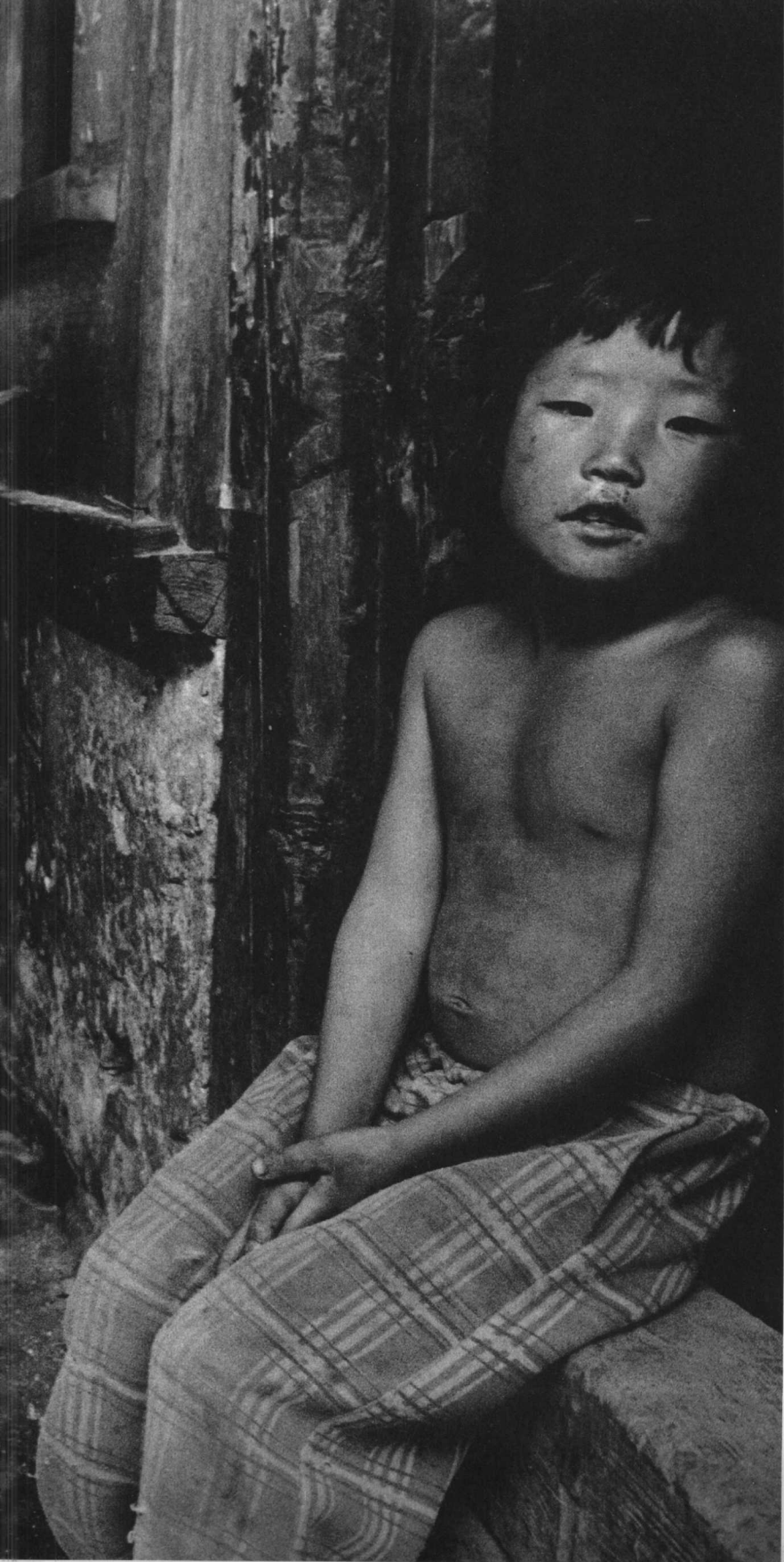
1997年，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为6090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84元。也就是说，每个农民每天的收入不足2元人民币，而且这个数字还是1990年以后“扶贫攻坚”取得的结果。

舂饲料

云南贡山县 1997

原始的劳作方式在这里依然存在。





磨米粉的孩子
云南贡山县吉木斗乡
1997.



茅屋内 云南福贡县马吉乡傈僳族村寨 1997

丰金穗一家5口住在这间茅屋里，所有的家当一目了然。



健步如飞 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 1997

丙中洛乡90年代通了公路，但是有能力坐汽车出入大山的农民依然是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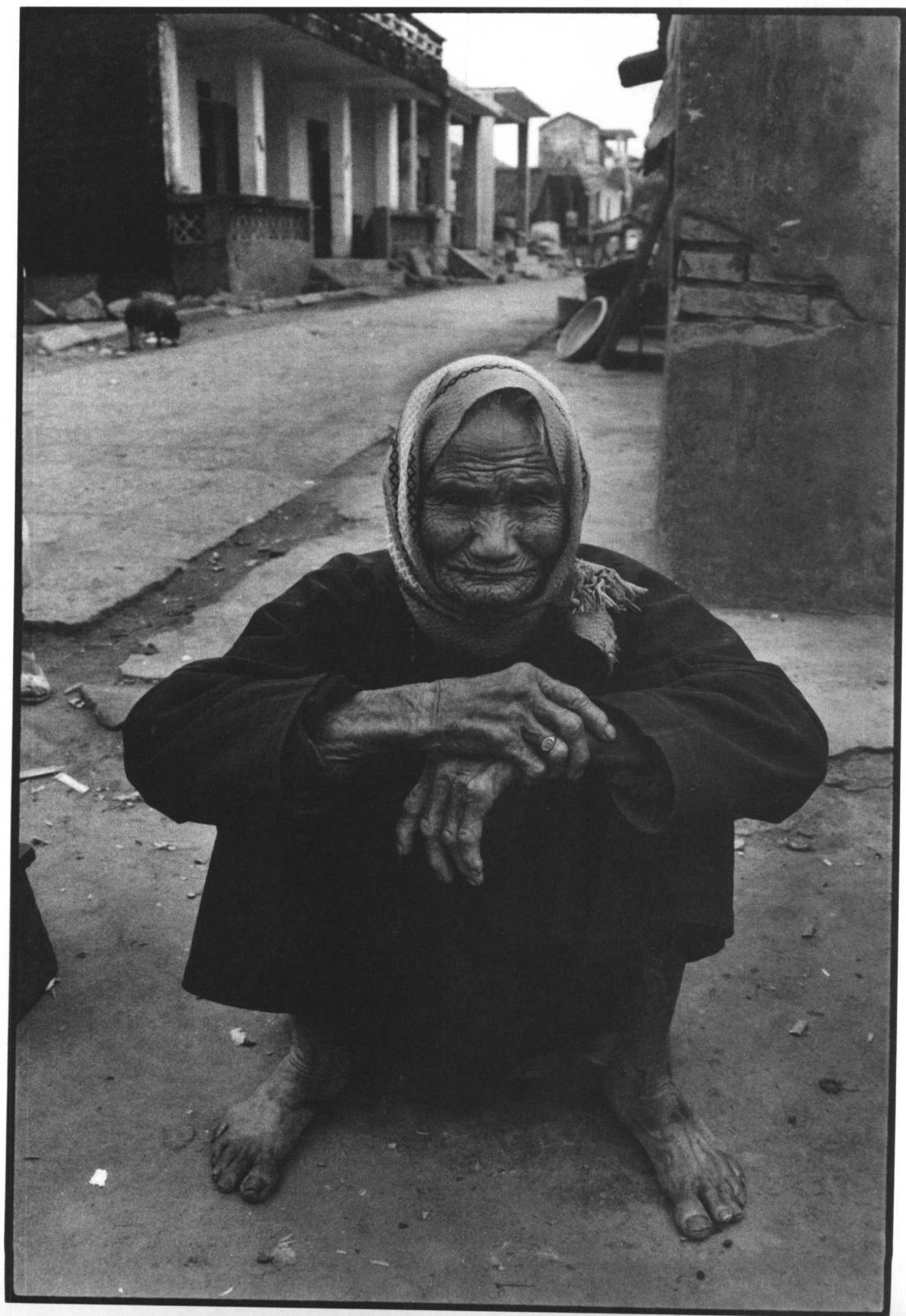


猛禽 云南云龙县 1997

集市上这只可怜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喊价40元。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森林覆盖率达44.1%，各种珍稀动植物繁多，但滥捕滥猎的情况时有发生。



赶集 云南云龙县 1997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左页图) 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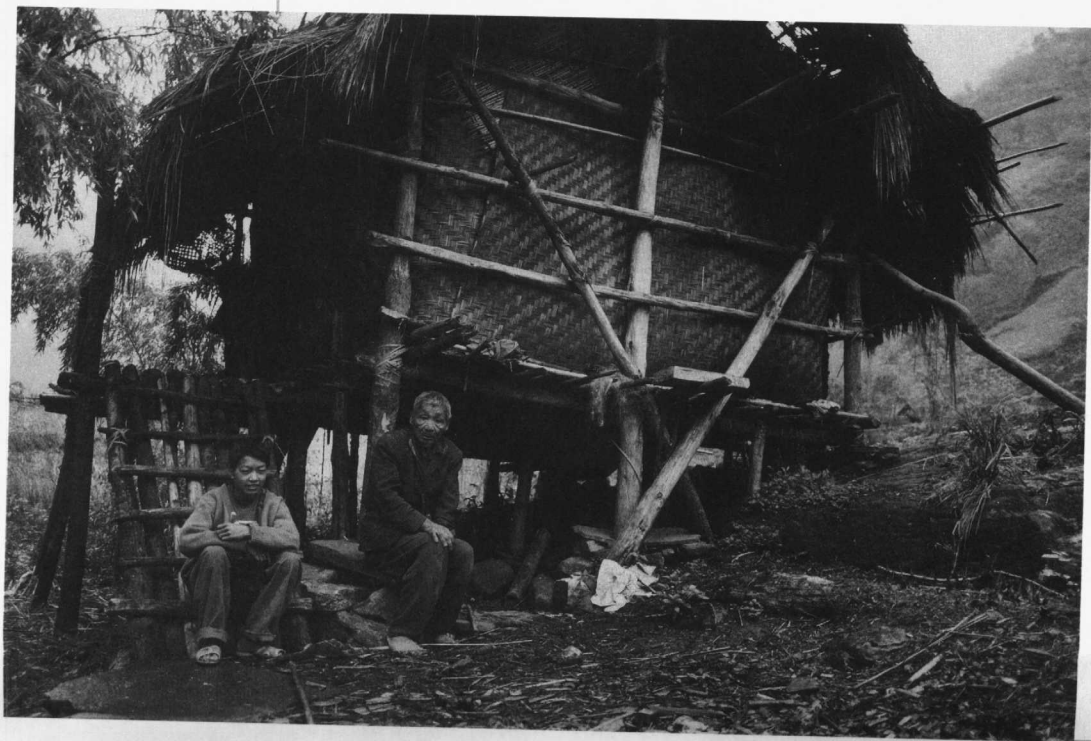
海南天涯镇 1995

“晓得不，谢祥娃又遭逮回来了！”田边地头都在传，“狗日的翘起吊了半夜都还嘴硬。”

谢祥娃是生产队最壮的全劳力，担挑子、栽秧子、打谷子、拉车子，没有任何人敢跟他做对手。二十七八了还叫他“娃”，一是他还没有娶婆娘，二是没谁拿他当个人，因为他爹妈都是被管制着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家过去是柏隆镇上有名的大地主。柏隆乡平川沃野，又守着官渠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留下来的都江堰灌溉网络，人称官渠，后来改称人民渠）水头，水稻亩产好的可以超过千斤，是我们县有名的粮仓。但是在我插队的1970年，每10个工分才值5角7分钱，一个全劳力在农忙季节满满干1天能挣10分，平时只能挣8分。平均下来，像谢祥娃这样的壮劳力，一天挣不了5角钱。生产队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水田，日子过得都很穷。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社员都非常本分，农闲时节也没有人敢跑到外面去打零工。惟独这个谢祥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大队民兵给抓了回来。抓回来当然要捆要打，但是打了没过多久还跑。我想，之所以能把他逮回来，是因为他跑得并不远，一般就跑到

傣傣族农民居住的茅草屋

云南福贡县 1997







邻县。这次跑得最远，跑到了绵阳的一个乡镇，帮一户人家修房子，正在夯土墙的时候被这边去的人逮住了。我想，假如他跑得远一点，比如跑到广东，这边的人就没法抓到他了。不过也很难说，一是他根本没有坐车的钱，也没那个胆量；二是，广东作为反帝反特前线，警惕性更高，万一在“前线”被逮着了，他娃会栽得更惨。那个时期凡是判刑都要贴布告，很大张的纸上印着很大的字，上面细说犯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和宣判结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在县城看到一张布告，有两个中技校的学生，19岁，跑到了广东宝安县的深圳火车站被抓获，罪名是想偷渡。叛国罪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服刑7年。

那是一个不能流动的社会。一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插队头一年住在贫协主任家，房东姓余，他有个侄子叫余闷娃，余闷娃没事的时候愿意和我摆龙门阵。我四仰八叉躺在篾席子上，透过小土窗看星星，窗外蛙声响成一片。他说：“日他妈卖×，这样活着也算是一辈子？想跳农门的娃儿哪儿止他谢祥娃一个，他娃娃只不过破罐子破摔罢了。走正道，只有参军一条路。但是刘木匠的儿子去了三年，莫球名堂，还不是复员回来。招工？考学校？不要说我们了，连你们知青都没门！男的看来是没得希望了，女的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嫁人，嫁得远远的，嫁个好地方，最好是能嫁给城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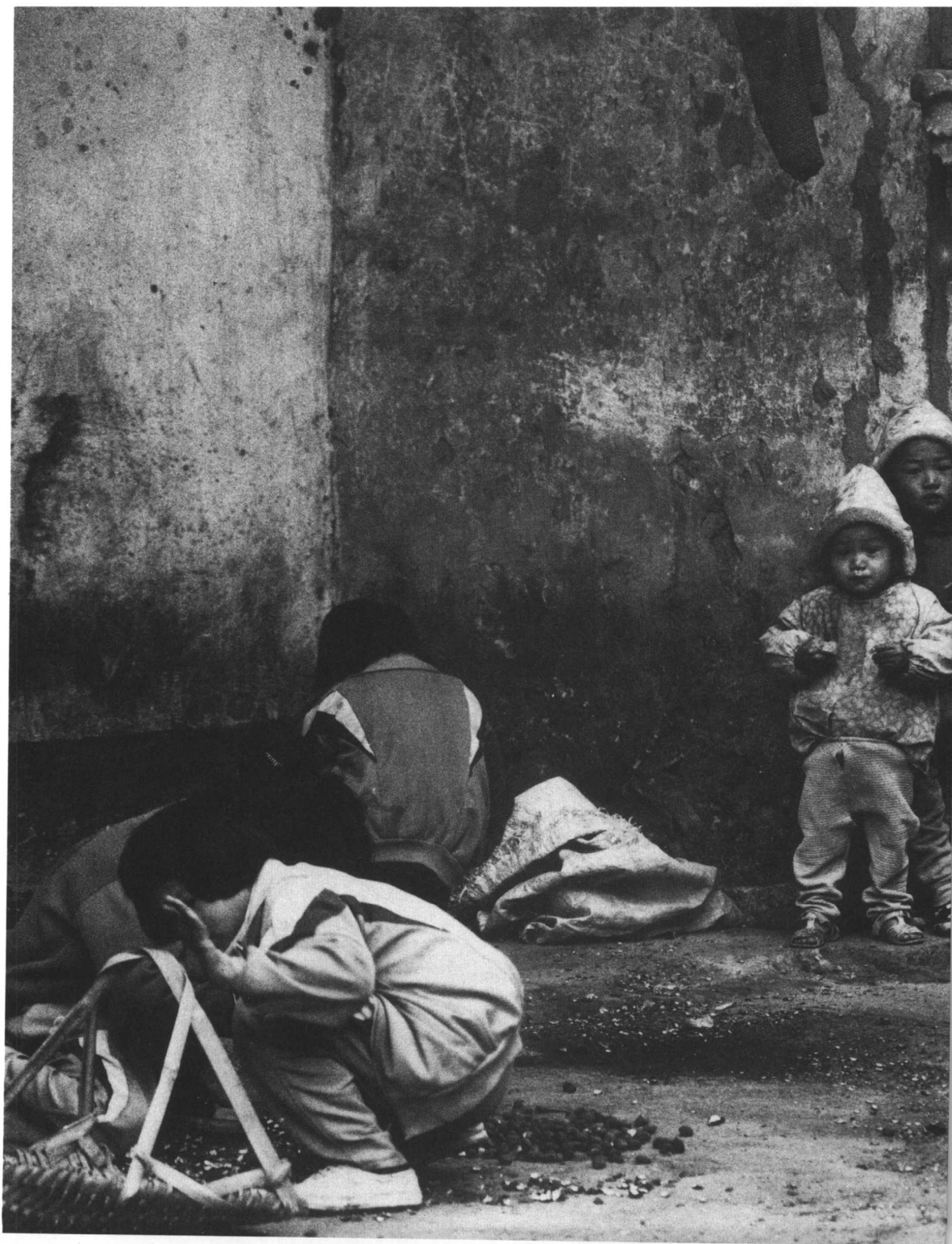
若干年后，我回生产队看望父老乡亲，村里果然有两个姑娘远嫁了，嫁去了河南。夫家虽然在农村，但男人在修焦（作）枝（城）铁路，好歹也算家属了。

闷娃悄悄跟我说，别老在人前提这个事，嫁啥呀嫁，那是人贩子贩过去的，但是人家自己愿意。

人头汹涌 四川德阳 1984

街道快被挤爆了，人头密密麻麻的望不到尽头。这场非集会的集结让城市感受到了农民进城的压力。

在重庆被划为直辖市之前，四川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拍摄这张照片的1984年，四川省全省人口已超过9000万。照片拍摄于当时还是农业县的德阳县城。那一年的10月1日，农民知道街上有庆祝活动，一早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看热闹，街上顿时人山人海。我爬上电线杆拍下了这张照片。而农民真正背井离乡、潮水般涌入城市谋求新的生活，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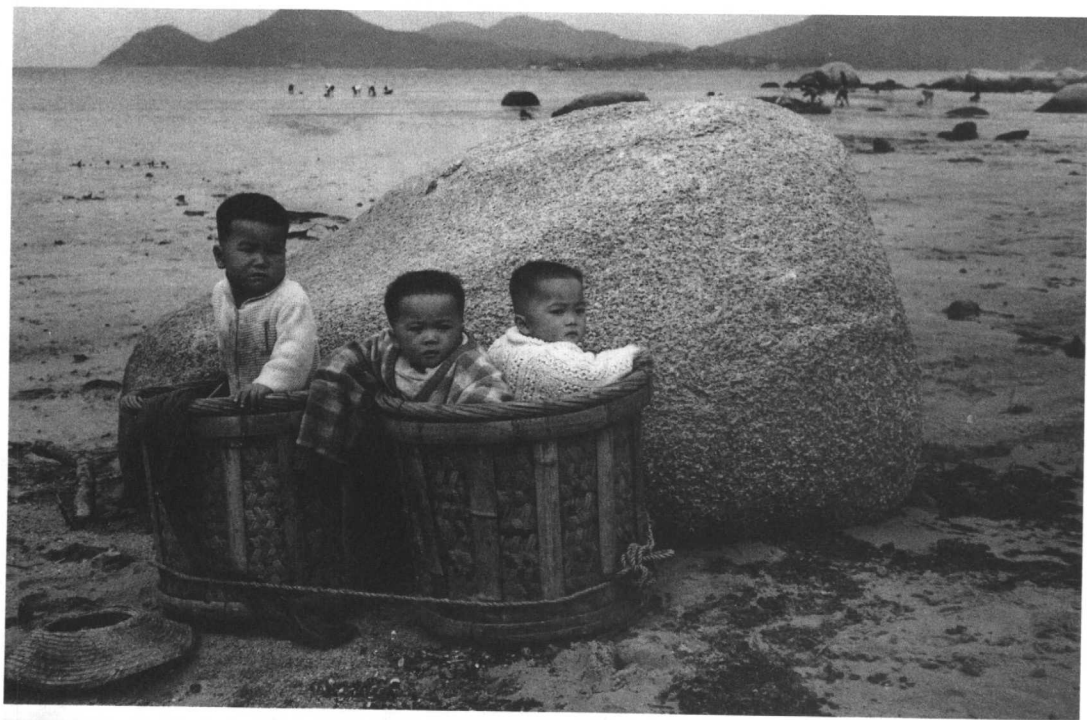


捡煤渣的孩子们 广东清远县西牛镇 1995





编织袋游戏 广东新会县 1993



海边 广东惠阳县 1989

当赶海的村民在海里捕捞时，他们的孩子便被这样放置在海边。

4. “你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

同样是农民,董世宏肯定很难体会谢祥娃余闷娃们的一肚子苦闷。1998年我在江西省的流坑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24岁。也就是说,谢祥娃贼胆大往外跑结果遭抓的那几年,他还没有出生。董世宏读高中的时候是1993年,那正是邓小平南巡后,农民外出打工掀起大潮的时期。董世宏坐不住了,觉得这书再读下去也读不到哪儿去,就辍学出去了,“那年我才19岁”。

董世宏兄弟姐妹7个,3个姐姐出嫁了,一个弟弟两个哥哥都在深圳打工,父亲曾经在乡公所做事,平时只有母亲在家。新建不久的房子很宽敞,地上铺着砂砖,在闭塞、贫困的流坑村,看得出来,已经是殷实人家。董世宏穿件西装上衣,一身很洁净,让我进到堂屋坐。他说,以前家里9口人吃饭,才五六亩田,拼死拼活去种,一年的稻谷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维持生存。“你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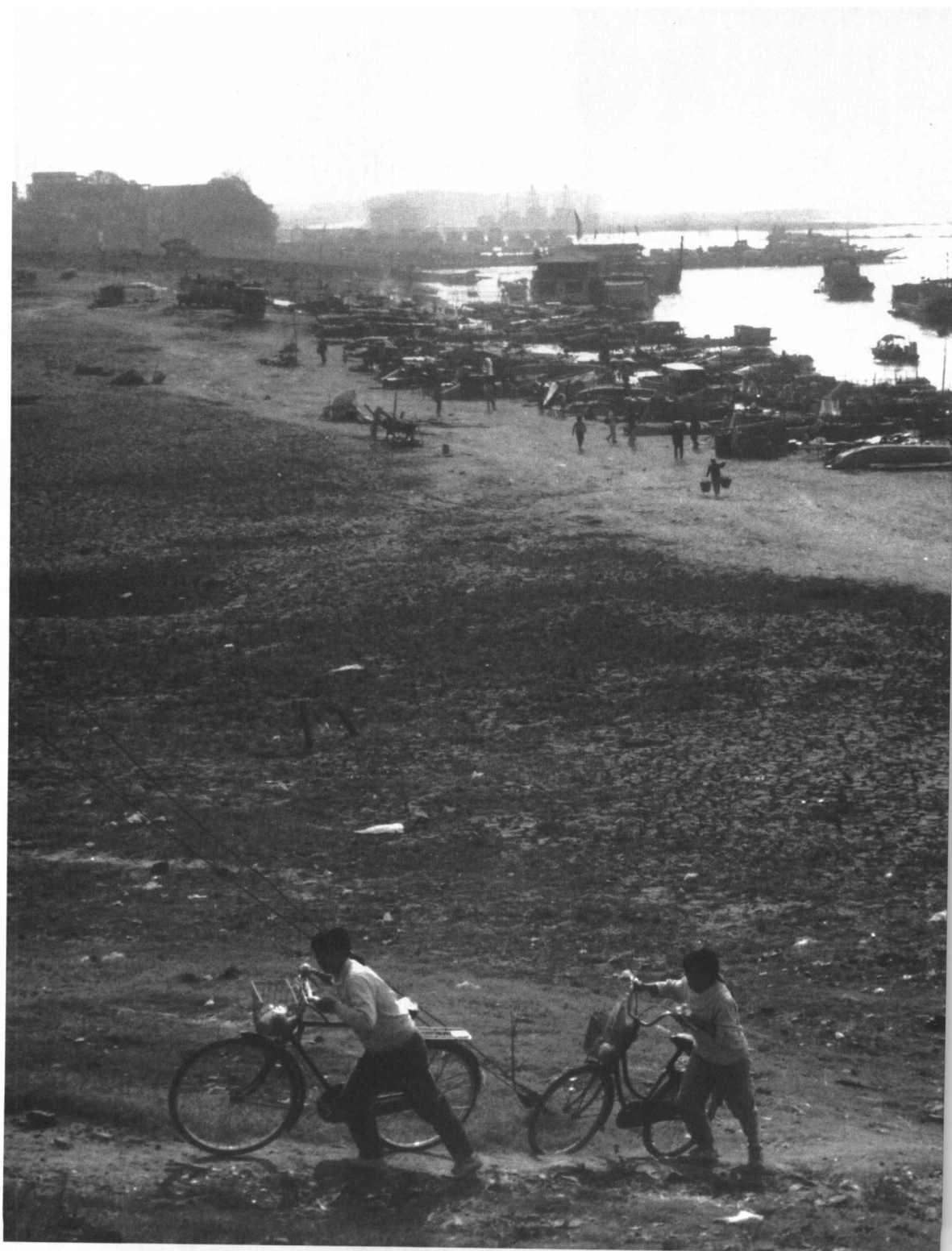
堂屋砂砖地上蹲着个小女孩,我问:“是你的孩子?”

“不是,这是我妈帮别人带的。我的小孩才20多天。”董世宏进去里屋,把他的小儿子抱出来让我看,“老婆坐月子,我才请假回来照顾。再有10天,小孩满一个月。一满月我就赶回广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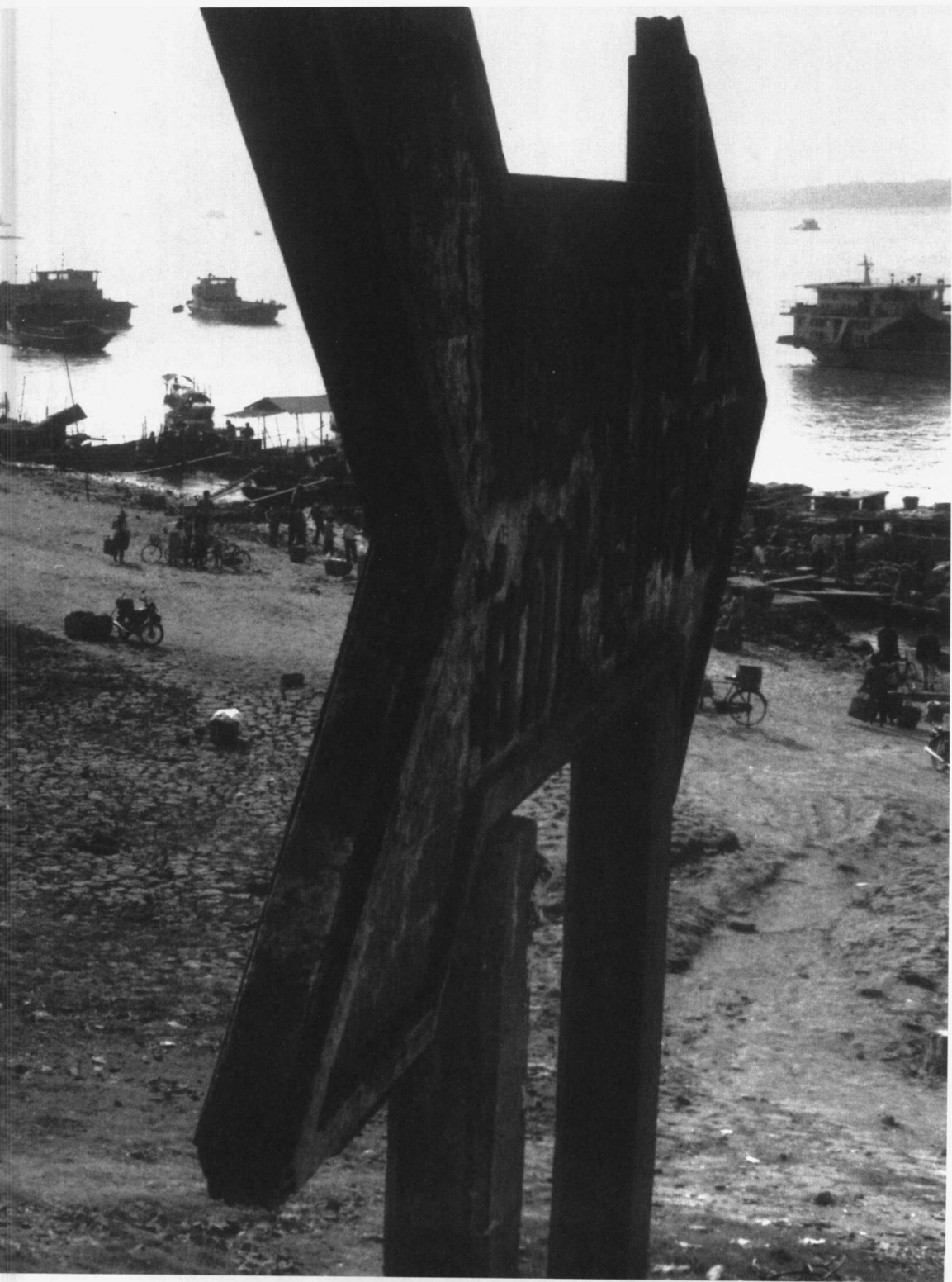
旧祠堂改造的乡村小学

广东怀集县 1991





西江码头 广东三水 1990



姐姐出嫁以后，董世宏家还剩3亩田，兄弟几个出去以后，租给别人种一半，自己老爹种一半。董世宏很干脆地说，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想种田，他自己也不想种。如果不出去打工，呆在家里没有钱挣。

“天一亮你就知道会有什么等着你去干，饭一吃就可以去干，干了就有钱进来，在我们流坑没有这样的事。”

5年的打工生涯，董世宏已经习惯了城市里按部就班的劳作。他说他老婆以前也跟他一起在外面打工，两个人一年除掉自己的开销，年底差不多能带5000元回家。

流坑村4700多人，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打工的村民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外出打工已经是这个古老的、纯农业的村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我去过流坑村很多次，确实很难看到有年轻人在田里耕作。我说：“你们年年出去打工，恐怕已经很难回到田里去了，留下老人在家种田，到他们都种不动的时候，田里还有人吗？”

董世宏说：“出去打工肯定不是一辈子的事。尽管你现在不愿意种田，但是你也有打不了工的那一天，到时候你还得种。就像现在，村里种田的大部分是年龄大的，没什么文化的，或者家里有负担走不开的。种田尽管不划算，但是没有风险啊，你种几亩田，大米还是有得吃嘛，不会没有人种田的。”





驻守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牌坊村人均耕地不到0.5亩，大量闲散劳动力扛着包裹外出打工，近则重庆，远至广东、福建沿海。只留下老人在村子里。

5. 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二十多年前我就到过广东。

那是1976年的秋天，从四川到韶关出差，本来一条铁路就从衡阳下来了，可人年轻，逮着机会就想游山玩水。坐火车坐到桂林不坐了，改乘船，顺漓江而下到梧州，再顺水坐船到广州，上岸就傻了：广州在开广交会，旅馆全满。早上九点从洲头咀上岸就找旅店，一路找到火车站，天色已黄昏，毫无着落，急了，把本来是捎给韶关朋友的一捆黄芪送给了一个广州人。这人喜出望外，托关系走后门把我们给介绍到三元里矿泉别墅，很贵，15元一宿，相当于小半月工资，但是已经没有选择，咬咬牙住下了。这一趟，对广州有了点印象：一是黄芪不再像干柴那样贱了，弄到这儿就变成了好东西，大补，当地人喜欢用来煲汤；二是广州市区并不怎么大，开个交易会就全城爆满，火车站已经是城边，到三元里沿路全是稻田。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按既定方针办”，绝没有想到哪天广东人会领先富起来，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老百姓可以随便流动，流动的人潮直指广东。



深圳经济特区暂住证和边境通行证

(右页图) 东门老城区
深圳 1988





在横贯市区的深南大道上

深圳 1989



12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从海口辗转到了广州。要去深圳，没有边境证。广州的朋友说，很简单，你买到樟木头的车票，先上车，到了樟木头如果查票，你就躲，一般不查的。那时候火车并不挤，去深圳的火车更是宽松，因为，你如果没有边境证，根本就不卖给你去深圳的车票。车门口把得很紧，即便你混进了站台，没有车票也上不了车。我捏着去樟木头的票，坐在座位上，眼睛老盯着过道有没有穿制服的人过来，那心跳得，比火车咣当咣当还响。阿弥托福，车过樟木头，居然平安无事。半年以后宁刚和林登登来深圳，就没这么走运了。在樟木头被赶下车，没辙了，好歹扒进运牛的闷罐车，小伙和小姐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那个时候的特区其实还没有像内地人想像的那样，富得流油。处在探索阶段、忙着躲避世人指责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深圳，各种证件查得很紧，人也比较刻板，不容易通融。记得那年冬天，我在特区报印刷厂盯版，盯完一看表，已经晚上十一点半。出门想找车回蛇口，苦等半个钟头，连根去蛇口方向的公交车毛也没等着。一摸身上，没带身份证，完了，知道没证肯定住不了店。抱着侥幸到旁边的特区报招待所，给人说自己是因为工作误了班车，希望看着脸熟，网开一面给个铺。不行，好说歹说也不行。外面寒风呼号，管登记的缩着脖子要回值班室睡觉，末了说了一句：“你可以在这椅子上躺一会，不过别吵了别人。”我道过谢，蜷在过道的木头条椅上，穿堂风嗖嗖地往骨子里钻，只好又起来，练习云中漫步，在过道来回走，不时地看表。终于到了五点钟，出门，站在深南路上，头上残星闪烁，空气无比清新。半小时以后，头班车来了。

若干年以后，我的镜头里全是汹涌南下的农民工，镜头背后的我已经不是旁观者——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们进入广东，要比我艰辛一百倍。



第二章 给我碗水喝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不是我们你们到哪儿吃东西呀

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

……

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

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

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

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

什么身份证儿暂住证儿健康证儿

难道你们城里就不是我们中国吗

……给我碗水喝

——崔健《农村包围城市》

流水线上 深圳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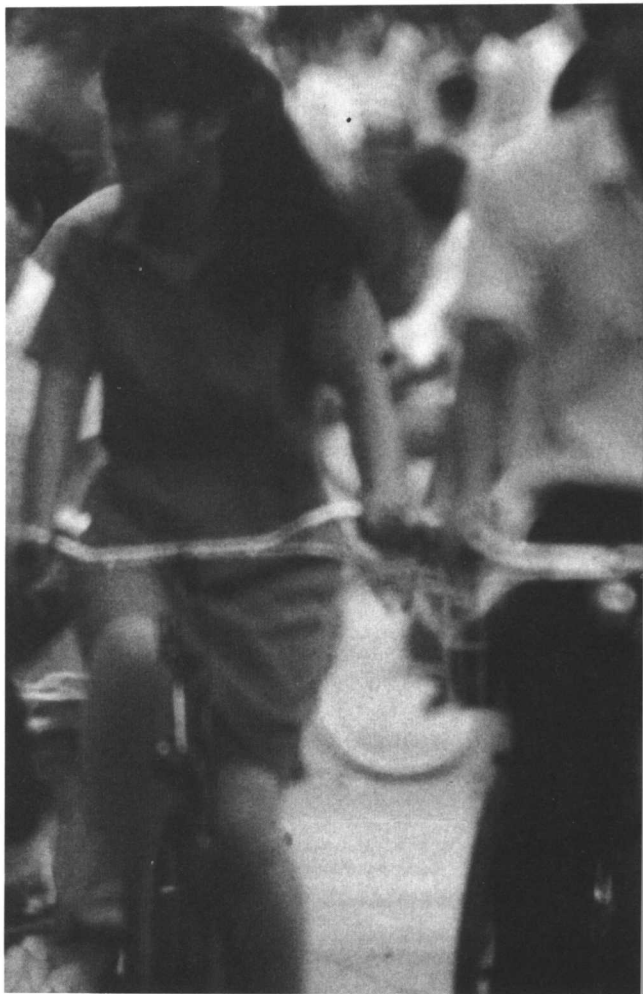
乍一看去流水线劳动强度并不大，但是流水线几乎是永不停歇的，连上厕所时间都有严格规定。流水线不需要太高超的技艺但是需要年轻，18岁以上、25岁以下，流水线永远保持着这个年龄结构，这是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灿烂的岁月。

拍摄到流水线上有人揉眼睛的机会不多，这次是因为有要员来视察，线长宣布暂时停机整理的一个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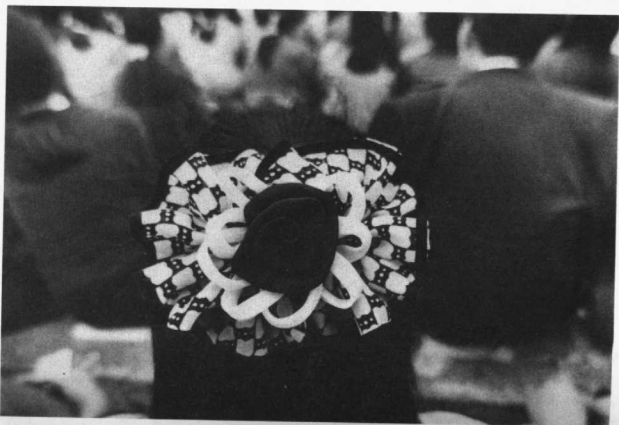
1. 四海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深圳，除了一天起来一层楼的国贸大厦，还有两个地方非常引人注目，一个是沙头角，一个是蛇口。前者是因为那里有条中英街，可以买到便宜的小电器、成捆的香皂、长筒丝袜、成箱的方便面，只要带出关口，就可以赚点小钱；后者呢，因为聚集了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港资企业，总有新鲜事先从那里搞起来，引发了好多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

初来蛇口，很容易被蛇口海滨的洋味十足所吸引。碧涛苑、南海小筑、鲸山别墅、南海酒店，客居着大量的“鬼佬”，于是，在他们的周围有了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壁球室，使他们在打够了保龄球之后，可以享受按摩床或桑拿浴，或者去“兰桂坊”——兰桂坊本是香港中环著名的一条西式酒吧街，但是随着蛇口外籍人士的逐年增多，在南海酒店和鲸山别墅之间，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酒吧一条街，纯粹的西式做派，后来被称为深圳的“兰桂坊”。这一带的碧海蓝天绿树洋房，也就成了地产商的招牌，售楼广告说这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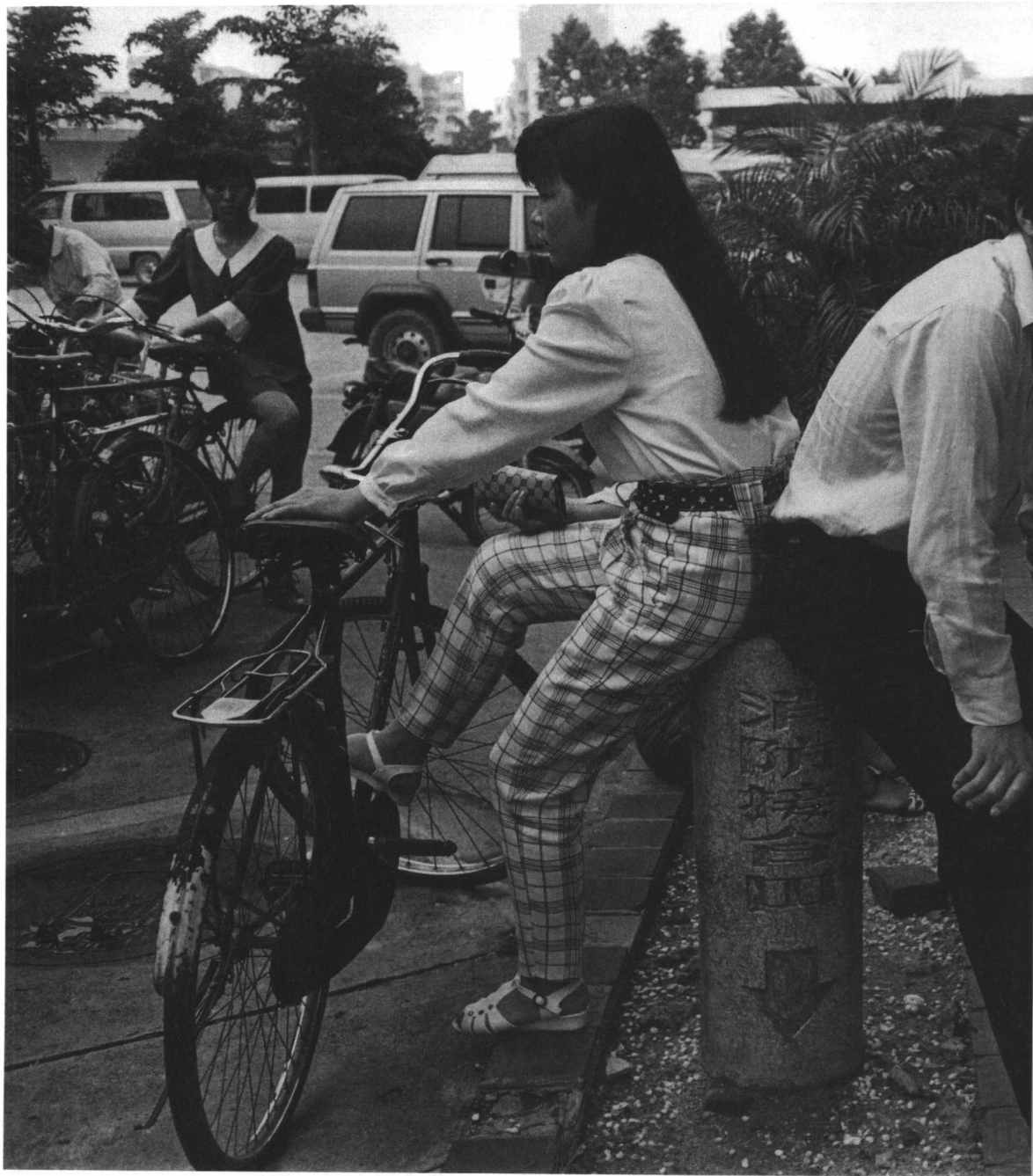


上下班汹涌的自行车潮 深圳 1990



失调 深圳 1992

外来工中的男女比例为3:7。



歇在路边 深圳 1990

两个人挤在消防石柱上，女孩子一手拿着时髦的钱包一手扶着单车，显然是累了。但这样岂不更累？到城市里谋生，衣食住行都跟乡下不一样。谋生不易，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更不易。



当你正兴致勃勃，抬起头，望着家家阳台上盛开的勒杜鹃或紫罗兰，阵阵香风沁人心脾，你差点想感叹的时候，我会突然把你拉到四海，让你去数那横七竖八挂在阳台、“阴”台上的工作服、花衣裤、塑料雨披、毛巾被；当你美滋滋地坐在碧榆路海滨棕榈树下，正看着从朦胧月光下飘然而来的贵男贵女，并被他们身上的法国香水味儿熏得有点晕乎乎的时候，我会把你拉到四海，让你帮那些穿着一套未必合体的廉价时装的打工妹们，去和卖处理香蕉的小贩一分一分地讨价还价；当你捧着一杯“阿华田”，坐在JBLLA的钢管皮背椅上，听着爵士乐鼓点，禁不住有点摇头晃脑的时候，我还想把你拉到四海，在你的屁股底下塞一个七寸高的塑料小板凳或一张旧报纸，让你仰着脖子看每周二、每周五免费的小银幕露天电影……

为什么？

因为蛇口有更多的“人类”居住在四海。



摆烟摊的客家女 深圳 1998

凭着在楼梯转角处搭起的一个小烟摊，这位客家女在我的目光里生活了10年，并拍拖、结婚、生子。



在碟海的包围中 广东顺德 1992



码头上的背夫 湖北巴东 1994



城里卖小狗的农民 四川德阳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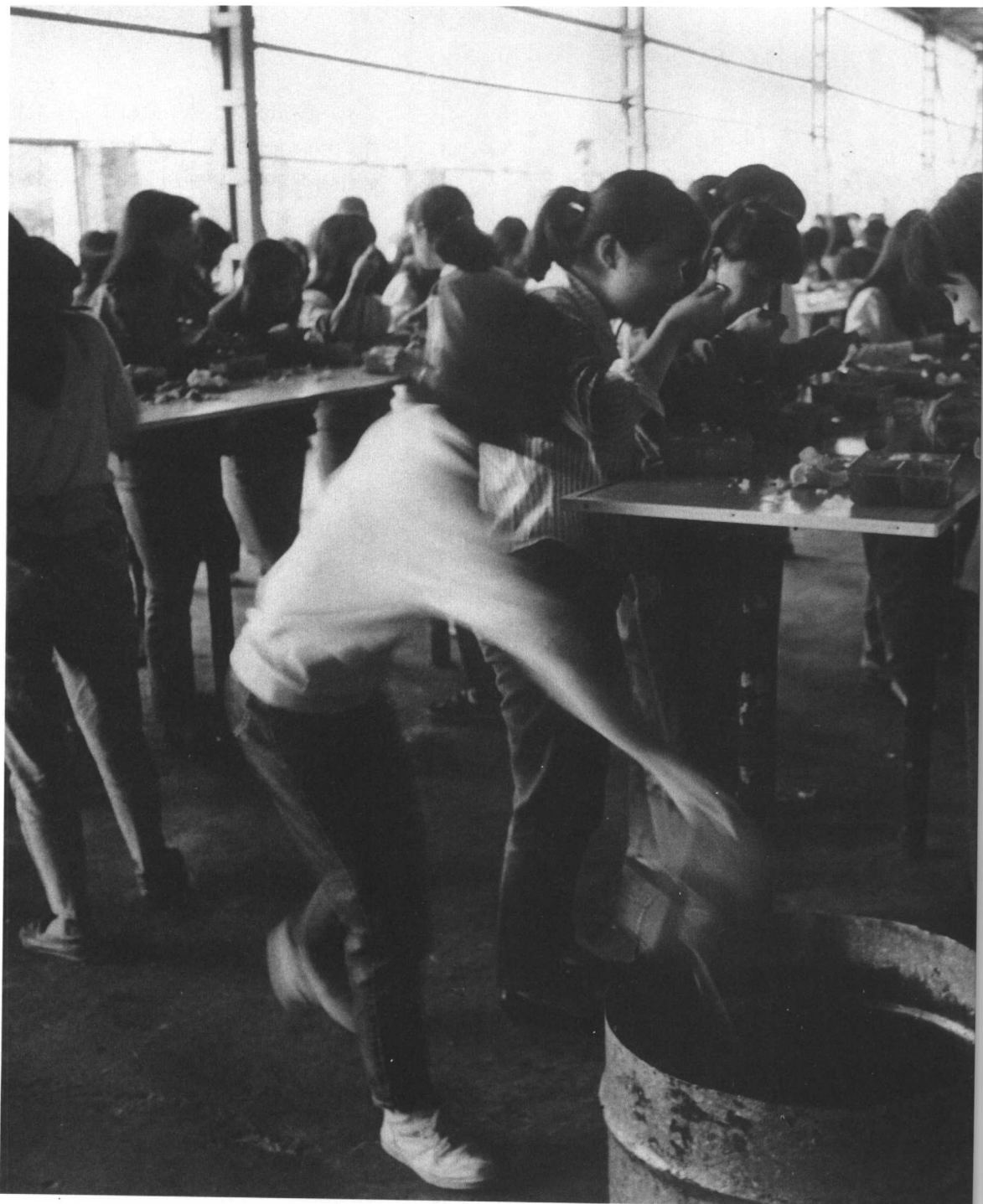
某工厂集体宿舍 深圳 1991

二十几个平方米，一般住6—8人，这样的条件算不错的。



四海宿舍区，位于蛇口工业区东北角。1988年的四海，66幢单身宿舍楼，居住着近200个企业的大约16000多名打工者。近的来自潮汕、惠州，远的来自江西、湖南，每人在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的水泥房间中，占据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空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2岁，女多男少。

如果你在任何一天清晨的六点钟，走进四海任何一幢楼的任何一间女工宿舍，你会看到——8张铁架子床上，以各种最解乏的姿势睡着8个打工妹。这时，其中的一位翻了个身，极不情愿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表，然后，撅着嘴喊了一声：“起床——上工！”没人理她，虽然大家都醒了，但谁也不动弹。于是，又有人喊了一声：“起来！要打卡啊！”一想到那六亲不认的打卡机，一想到卡打迟了要罚钱，忽拉一下，8个人全下床了。手脚快的抢占了宿舍里惟的一个洗脸池，动作慢的则一脚跨进厕所，把牙缸伸向离便池只有一尺八寸高的那个“卫生龙头”……半个多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哽咽在喉，人，却已经在流水线上操作了。



一港资工厂的饭堂 深圳 1991

上千人进餐，所有的人都站着吃，是为了节省时间。



2. 流水线

流水线不需要太高超的技艺，也不需要很深厚的文化，但是绝对需要年轻。17岁以上、25岁以下，这是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灿烂的岁月。

流水线几乎是永不停歇的，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这不是耸人听闻。1988年2月8日，蛇口当地的报纸就接到一群女工的投诉。

编辑同志：

我们是陆氏公司的女工。最近公司为我们生产线做了一项新规定，上午和下午的中间休息时间只允许各休息15分钟。休息时间一到，上百人同时冲进洗手间抢位，时间一过，就再也不准去了。女工有很多说不出的难处，难道我们的特殊情况不可以给予考虑吗？我们是工人，不是机器！厂长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吧？

陆氏一群女工

接到陆氏公司一群女工的投诉后，报社记者走访了陆氏公司的杨厂长。

杨厂长告诉记者，这种管理方法是最近开始试行的，而且只限于线路板生产车间。因为线路板生产线工序之间衔接紧密，只要有一个工人离开岗位，整个生产线就会受到影响。以前也曾安排过替补工人，但这些人不能适应整条流水线的工艺要求，往往容易出差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决定这样做的。

杨厂长又说，车间的洗手间只有18个位置，100多人在同一时间去洗手间，确实有些不便。特别是女工，还牵扯到一些其他因素。因此，这种管理方法是否合适，待试行一段时间后再定夺，工人的意见厂方一定考虑。

《蛇口通讯报》在发表这条投诉时加了按语：“女工不是机器！”试想，100多人，18个位置，15分钟时间，那是一个多么紧张而又艰难的局面！连厂方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不便”。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事实已经证明“确实有些不便”，为何还要“试行一段时间”？

看似轻松的流水线，其实很紧张很艰难，工序之间衔接十分紧密，任何一个环节都牵连全局，都直接影响老板的利润，不允许出差错，这就是现代化大生产。可能会有人说，出来打工嘛，上班紧张一点，很正常。但如果让你整天都这么紧张，整月都这么紧张，整年都这么紧张，你还能“正常”起来吗？

——除非你是机器。

在三洋录音机厂的厕所墙壁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涂鸦——

“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昏倒，七零八落，久持（九十）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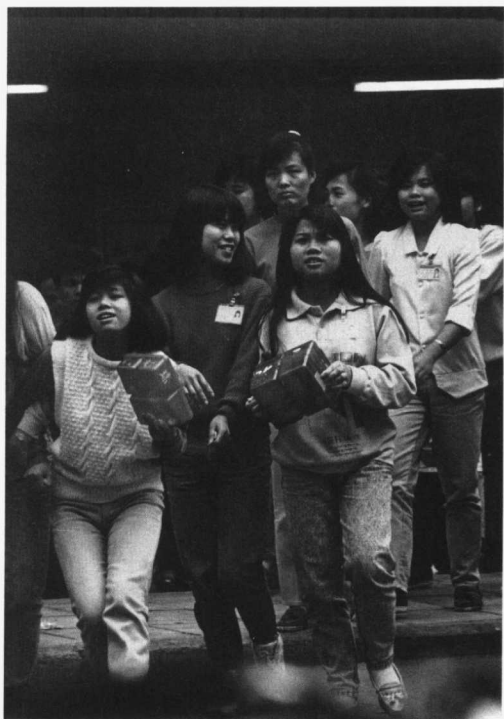
我在四海和他们做邻居，很少看到他们在干满8小时以后能按时下班。加班，是他们必须吞下的一只又苦又甜的果子。说甜，是因为可以多挣奖金——港币；说苦，是因为实在太苦太累了。“从早上一口气干到中午，紧紧张张吃顿饭，休息不了半小时，又得上工。下午吃罢饭，却下不了班，差不多天天要加班！”一群凯达公司的女工对我说。她们已来此地干了一年多，平均每天都要干12小时左右。她们都很年轻，甚至只是一群大孩子，姑娘们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漂亮的小圆镜。我去过几个女工宿舍，看见镜子上都是灰尘——每天在流水线上干十几个小时的人，有多少时间去顾影自怜？

“我最大的愿望是明天早上不要叫醒我！让我睡！睡到中午，睡到下午，睡到晚上……”



单车行 深圳 1991

去别的厂区串门看老乡，一辆单车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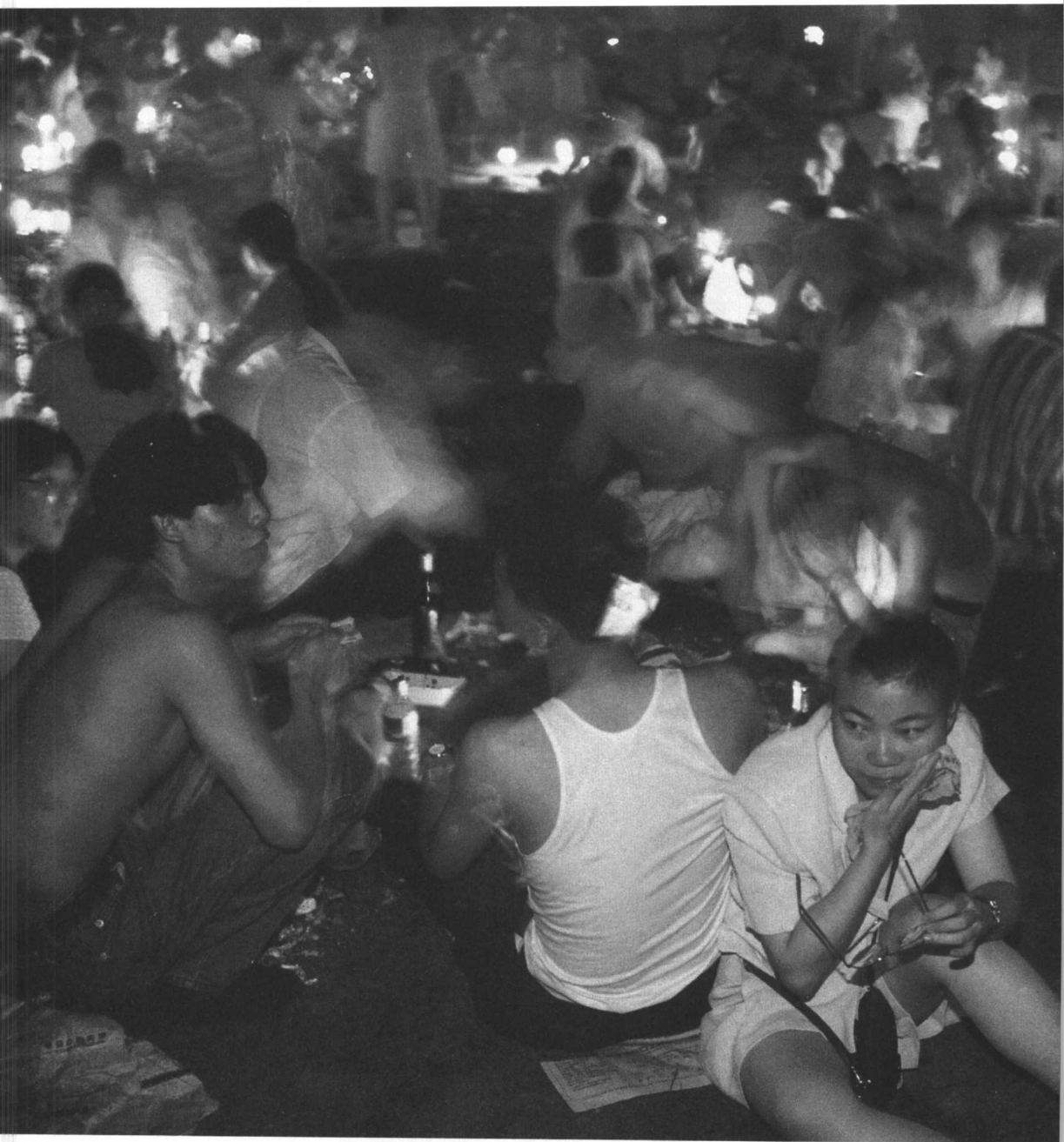


放工喽 深圳 1991



四海露天影剧场 深圳 1991

没有票的人双手把着围栏，透过墙缝“观看”演出。



中秋之夜的狂欢 深圳 1991



3. 还说四海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早一晚，荔园路上满满登登全是自行车流。在特定的时段满路保持一个流向，早晨流向工厂，晚上流向四海。

居住在四海，晚上没有加班的人中间，有1%的人会去参加各种培训班或讲座，希望自己一朝一日能挤进高一个层次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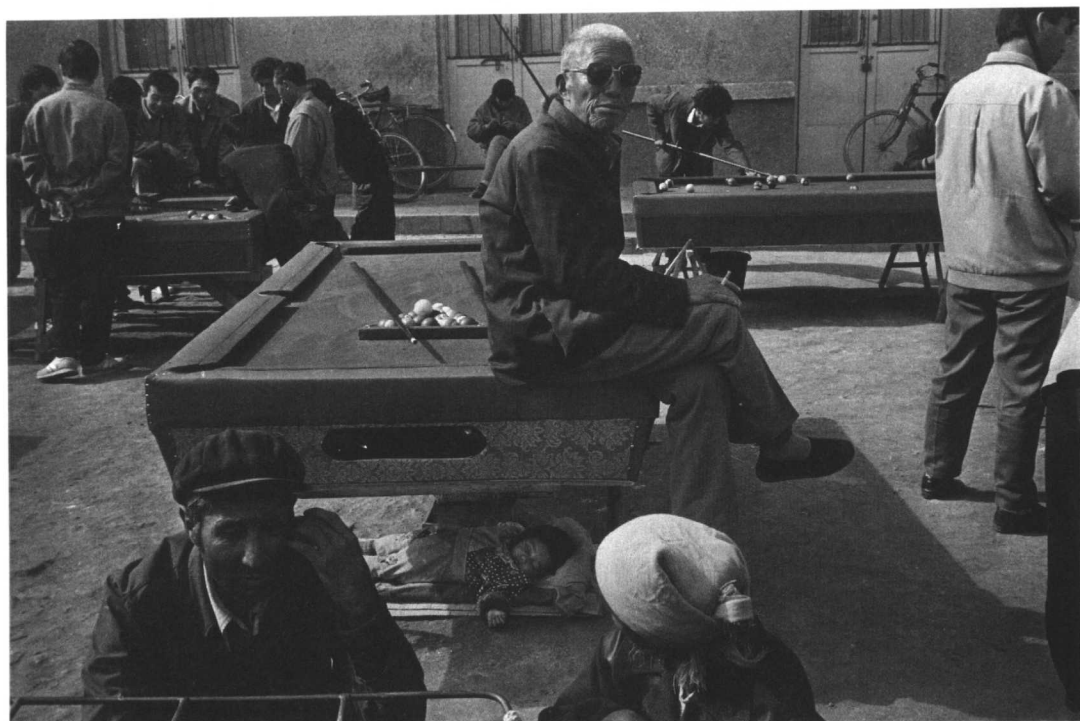
0.1%的人在生病，十分难受地躺在蚊帐里；

5%的人要么看露天电影去了，要么在路边的小店门口围着一台电视机，看别人的城市，看别人的故事；

50%的人在宿舍里洗澡、洗衣服、刷鞋或阅读一本过期的杂志；

其他的人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压马路，围着一幢幢黄色或杂色的楼房无任何目的地转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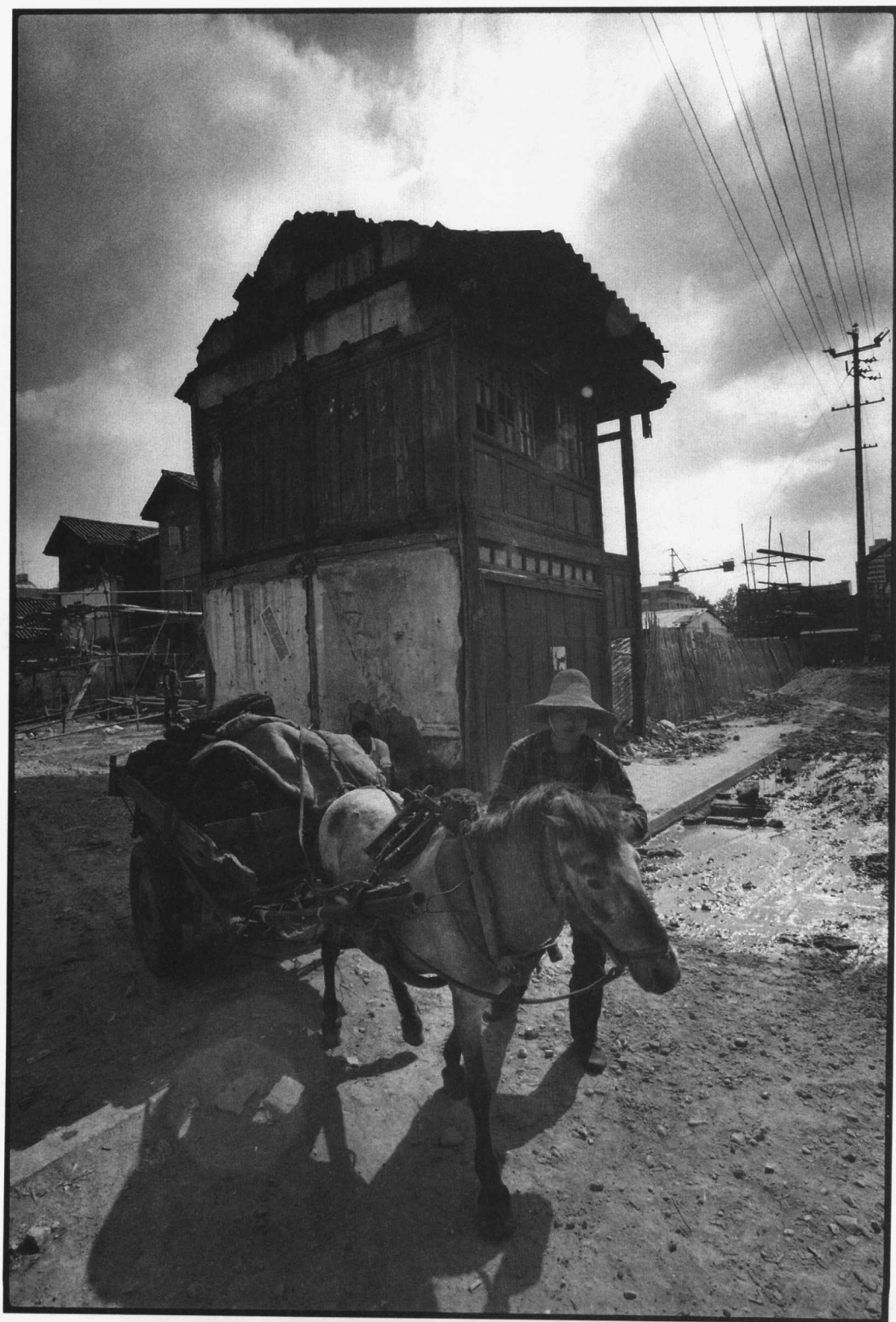
小伙子看到一群好看一点的姑娘，便在后面尾随。既不上前搭讪，也不大声咳嗽以吸引前行者的注意，更不会以轻侮的言行进行调戏（个别不良青年除外）。仅仅是这么跟着，以期待获得一丁点心理的满足。姑娘们一觉察有人跟踪，便立刻昂首挺胸，如模特儿般在舞台上行走，高贵，不屑一顾，但在转弯的时候会偷偷地回眸一望，以了解“观众”的反应。



台球桌下的小孩 新疆阿克苏 1990



接受城市目光的“洗礼” 广东顺德 1993



运煤 昆明 1994

也有一些姑娘喜欢逛商场。下了班之后，认真地打扮一番，换上一套珍藏的“时装”，沿着路边那些铺头、排档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看。老看，老不掏钱，老不买任何东西。终于，她们看烦了，便坐在草地上、水泥台阶上看星星，看行人骑车、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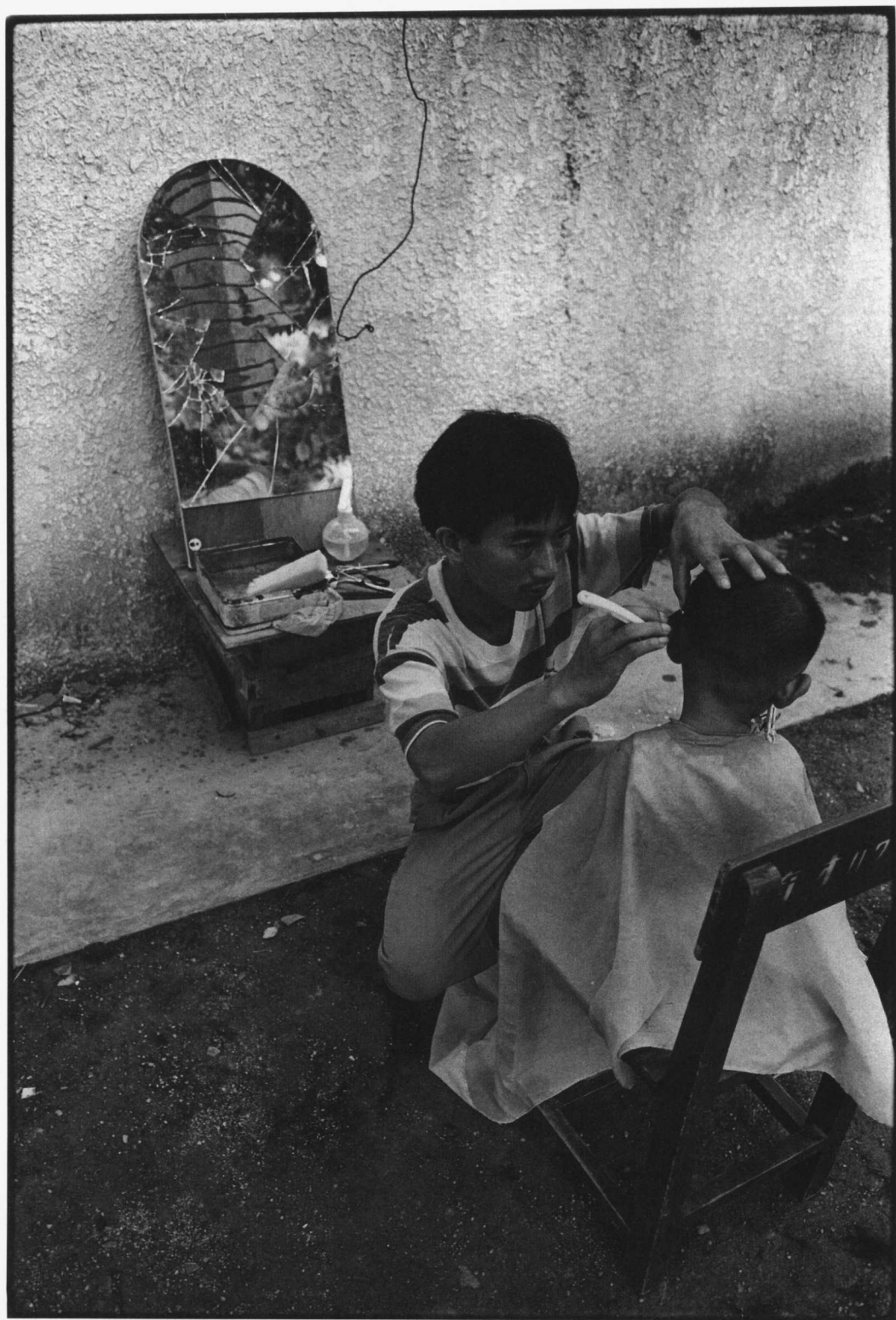


也有朝气蓬勃的时候

深圳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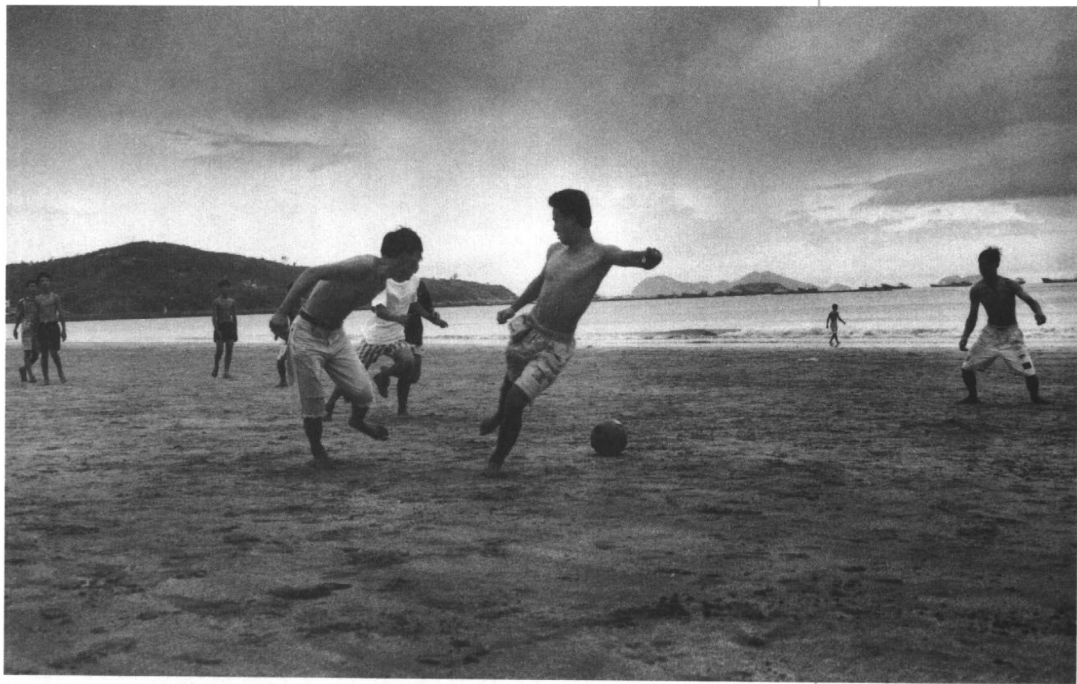
蛇口有四个比较固定的水果蔬菜市场——海上世界、水湾头、花果山和四海，其中数四海的这个最低级。花果山菜市场上一年四季有鲜虾卖，还可以看到18元一斤的美国菜花；可新建的四海市场能见到的最高档水产是皖鱼。我认识一个汕头籍的菜贩，已在蛇口摆摊数年，有时出现在水湾头，有时出现在四海。而这种“出现”是极有规律的。卖四毛五一斤的豆芽菜或两毛五一斤的冬瓜时，便就近出现在四海；而卖顶着黄花的鲜黄瓜时，即使刮台风下暴雨也要上水湾头。为什么？一斤好黄瓜一块好几，打工仔买得起吗？

下午五点以后，上早班或倒班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流向四海。你可以看到她们的单车尾架上，夹着三五棵水葱或几叶青



走街串巷的剃头匠 深圳 1998

菜。她们将此佐以一片“瓦楞面”在电炉上煮熟，偶尔配上一根香肠或一个咸蛋，便是劳累一天之后的晚餐了。我经常看见那些势利的小贩收敛起商业笑容，轻蔑地斥退趋前问价的“三洋妹”或“凯达姐”：“乱拣什么！你不就是买一毛钱葱吗！”多数时候，打工妹们是无勇气对以豪言的，她们捏着计划内于今日支出的几角菜金，怯弱地退走了。



那时候靠南油那边有家东滨商场，是离16 000名打工仔打工妹最近的一家豪华商场，但在那里也很少看到他们的影子。自尊而又没钱的他们，不肯为了参观几百港币一套的裙衫去领教营业员嘴角轻侮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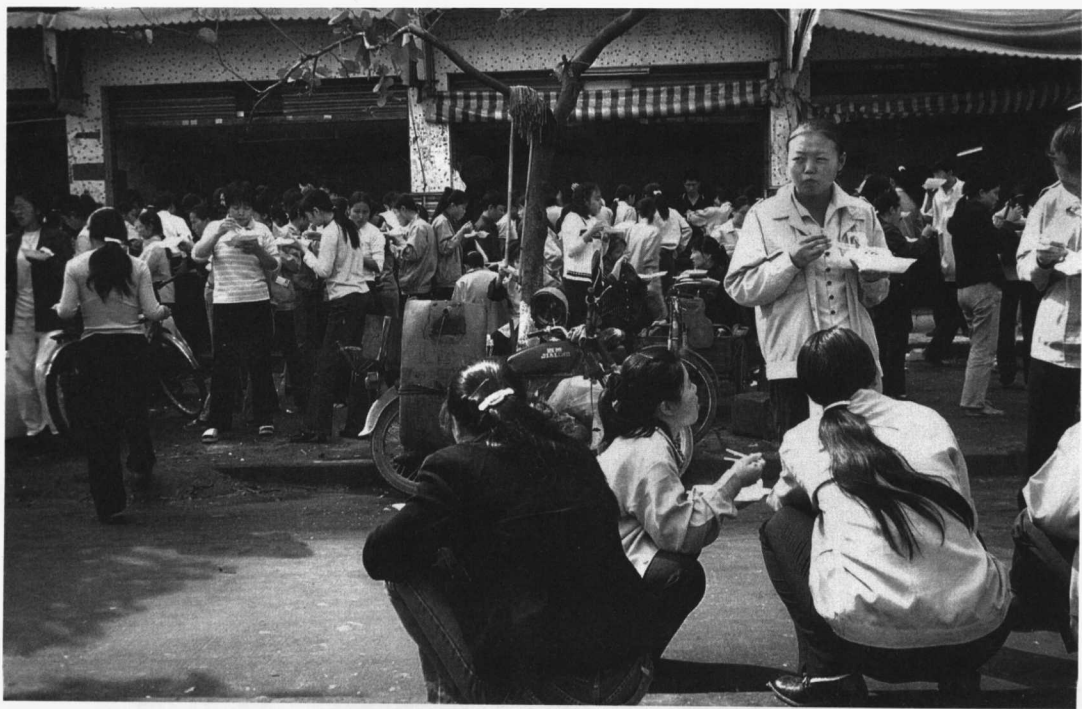
从四海骑单车到“兰桂坊”，顶多半个小时，可我觉得这一段路真是遥远，路的两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其实是没见识，是因为初来乍到。后来见得多了，尤其在深圳二线的铁丝网以外，在珠江三角洲众多三资企业的打工者聚居区，我看到了更大的落差。与之相比较，四海已经是人间天堂。

赛上一场

广东惠东港口镇 1991



困倦的小贩同他一起沉睡的烟摊 海口 1988



午饭天天吃盒饭 深圳 2000



另一种注目 广东清远 1994



(74页图) 拉“校车” 成都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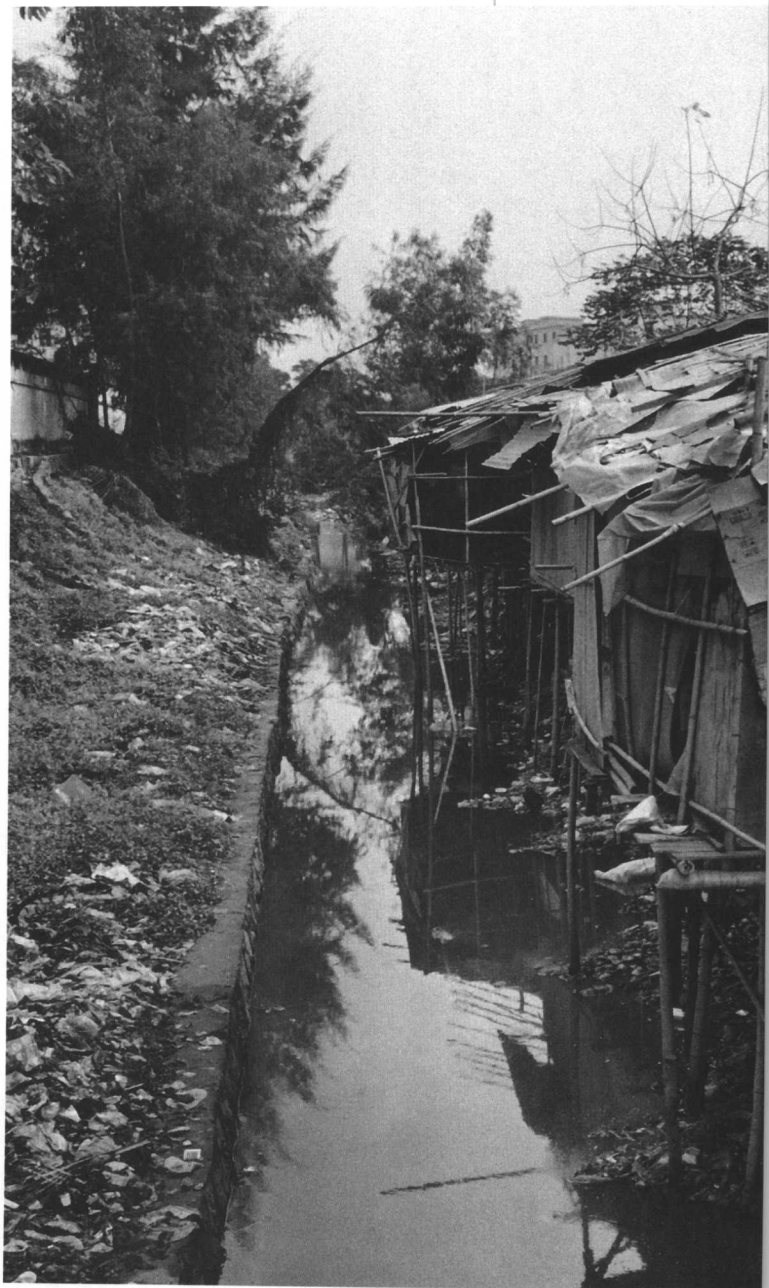




4. 九十三家房客

想起来自己也很难相信，1988年从广州到深圳，如果坐汽车，哪怕很顺利都得半天时间。107国道弯弯曲曲，穿行在蕉林、鱼塘和山丘之间，路很破，也很窄，一不小心就遇到修路、改道，乘客被赶下来步行绕过坑凹路段是常有的事情。车要过东江，还得在新塘等渡船。但是没过10年，珠江三角洲各种高规格公路和高速公路已经纵横交错。路的两边哗啦啦一下冒出大把厂房、商铺、商业住宅，镇与镇之间连成了一片，城与城之间也连成了一片，沿着公路，已经很难看到农田。

沙井镇在深圳西北角，107国道西侧，和东莞交界。沙井镇有个万丰村，和珠江三角洲其他乡村一样，有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这里投资设厂，同时也就有了很多打工者聚居区。1997年初，我和陈远忠重访107国道沿线，在万丰村采访了打工者居住的棚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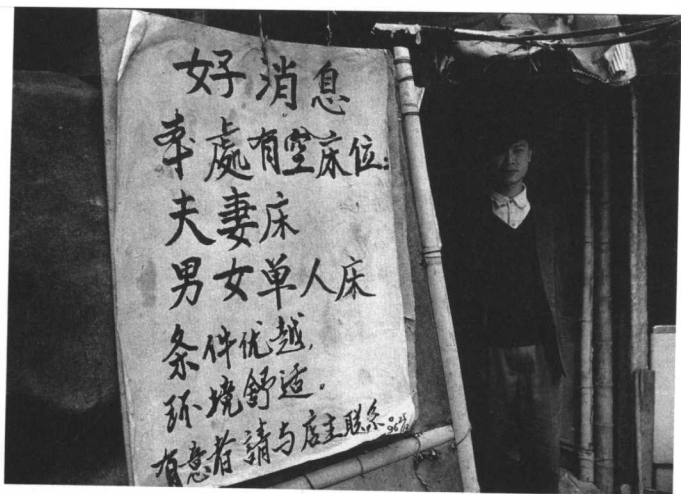
污水沟上的吊脚棚屋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房客们租住的棚屋沿着一条污水沟搭建，大多为吊脚楼。20来个男女房客长年在一间棚屋里共度春夏秋冬，这在现代居住史上或许罕见，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这种住法的棚户区并不少见。

出租广告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房主一般也是外来工，他们向当地交纳地皮费，然后投资搭建棚屋，对外出租。谢新全看见有人注意他的广告，迎了上来。他说他这两间屋投了7 000多元，地租1998年4月到期，今年看样子是要赔本了。



以下是当时写下的文字：

俗话讲“关起门来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的人，相互把对方看做自家人，不见外。深圳的“团结户”正是如此：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和衷共济，和睦相处，虽苦犹甜。

然而，赵云波何素芳夫妻的团结户“府上”，却拥有10家人——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密密匝匝靠墙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档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倘若20个人正好都同时下床来，棚屋所剩的地面是断然容不下40只脚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赵云波说，“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会同时都在屋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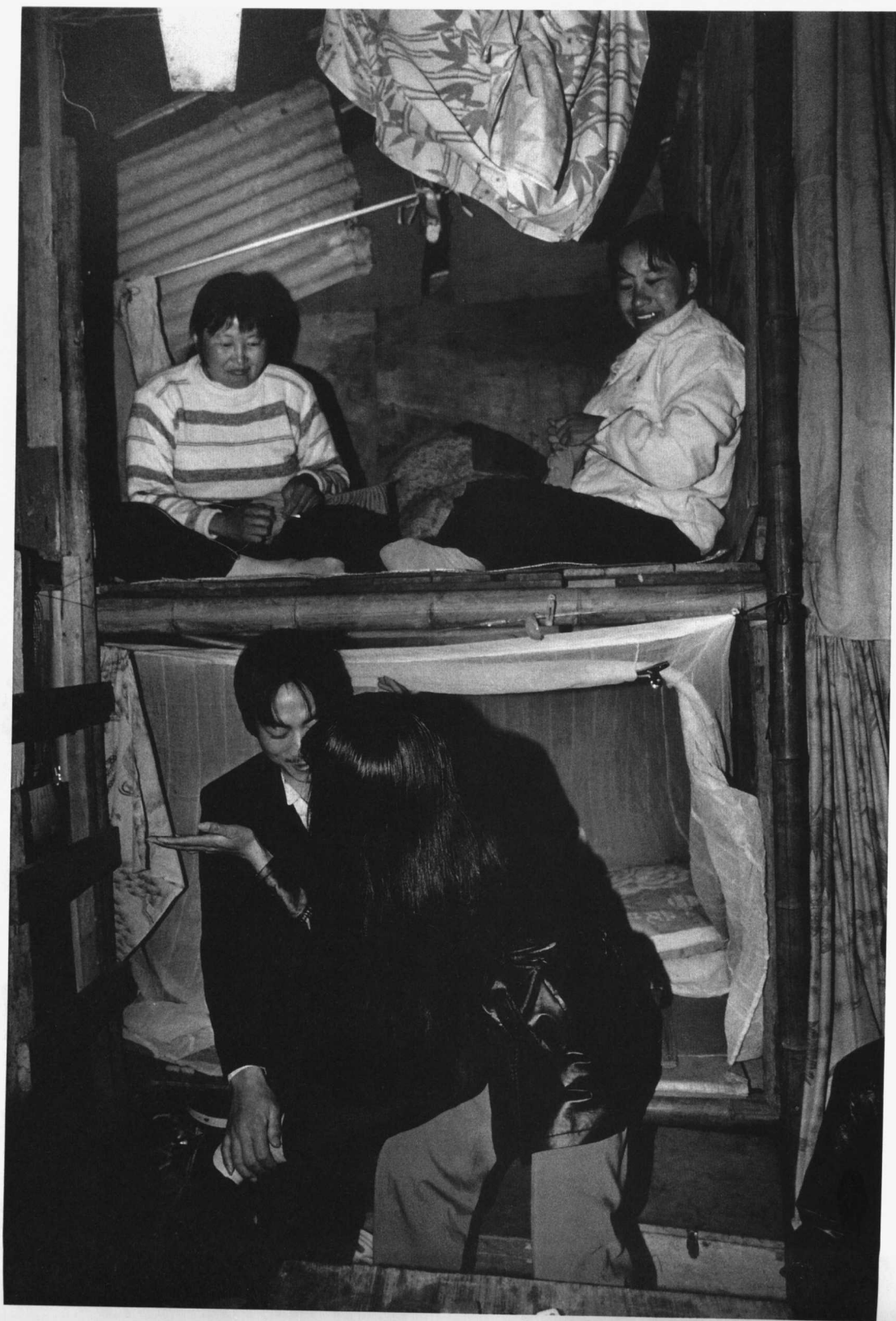
1997年2月，我们两次去棚屋区，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终没能把人等齐。进到左邻右舍探访，情形都差不多：每间屋少则五六张、多则十几张上下铺的木床，每铺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亲戚、朋友、熟人、老乡搭档共住的。

这个棚屋区在沙井镇万丰村边沿，顺着一条污水沟，一间又一间的棚屋连成了一条街。记者从头数到尾：93间。按平均每间20人计，这九十三家房客有大约1800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右页图) 小两口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夫妻、恋人、亲戚是棚户区的主要房客，小夫妻的亲昵经常让大姐们羡慕不已。



赵云波今年26岁，1992年从四川西充县来万丰，在好几家外资工厂里打过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说厂里有集体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乡也难住在一起，互相没个照应。还有，不准自己做饭，吃食堂，口味和价钱都不行，房费也太贵。

赵云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能挣400—500元。他俩的床费每月60元，水电费另计。小两口住棚屋，每月开支大概需要500—600元。如果不失业，一年下来，两口子能攒下5000元左右。赵云波说：“在家乡，人均不到半亩地，没有钱挣。”

棚屋里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过夫妻生活像做贼似的。没办法，大家都一样，见惯不惊。不过比住厂房好。住厂房你想过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罚款，弄不好，还炒鱿鱼。”

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虽然在隆冬季节走进棚屋，但我还是在竭力想像：20来位男女房客挤在这样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如何熬过南方漫长的酷暑？每间棚屋的对面，都有一个小岗亭形状的、仅能容下一人的小棚屋，大部分都上了锁，那是各家各户的冲凉房，也是厕所。赵云波说到了夏天，“经常要排队”。





还是要打扮一下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棚屋外的世界够精彩。即便生活艰辛，年轻妹仔出门前也要对着镜子打扮一番。

93间棚屋只是我们看到了的一个点。杜成东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市场下边就有一处。”

赵云波的连接杜成东和他床对床。去年，24岁的杜成东在南海市某公司干保安，工资收入和食宿条件都不错。因为妻子何素琼在万丰打工，春节前杜成东放弃了南海的工作来到妻子身边，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东从报刊上抄了一大本有关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他说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返回家乡。

但是绝大多数棚屋房客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选择，“打缩脚锤”会被人认为没出息。棚屋虽然挤，但是有亲情，有乡音。

城市要综合治理，棚屋迟早会拆除。我问棚屋房客到时候怎么办？赵云波想了想，说：

“天无绝人之路。”

以报道摄影的方式记录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当时各大媒体都很缺这样的稿件，但我一直不愿意发。倒不是担心被当成阴暗面，是担心见报之后，房客们连这样的棚屋也住不上了。稿子让《羊城晚报》拿去之后有些后悔。果然，5月份我再去万丰村的时候，棚屋已经被拆了，以后再也没找着那些房客，我的那些四川老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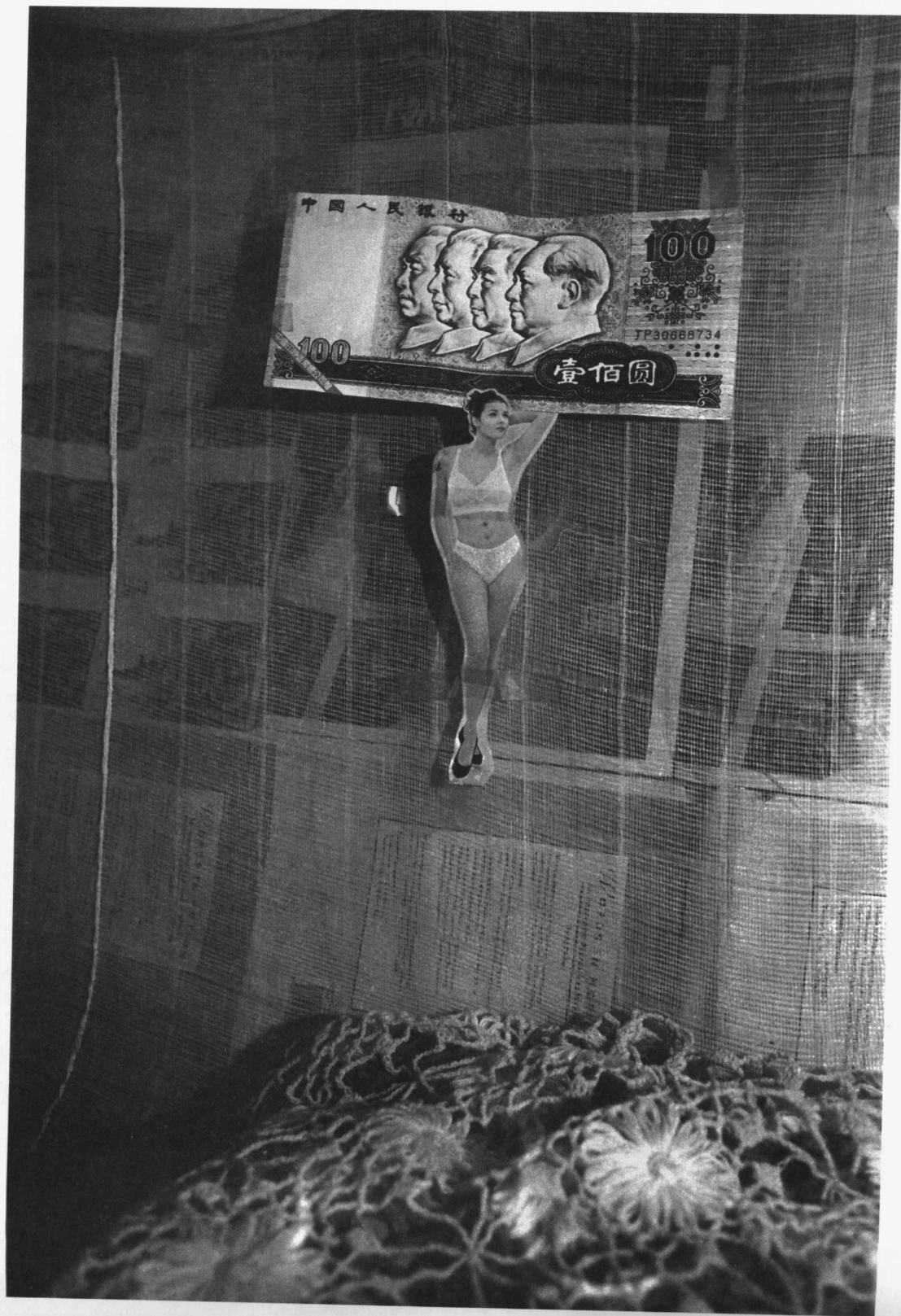
附《羊城晚报》编者按语：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右页图) 白日梦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放大的百元样钞和只穿内衣裤的女人画像并列在蚊帐里——拼命挣钱然后抱得美人归，这是棚屋房客们的梦想。这个梦很直接、很实际。即使在白天，梦境也能清晰可辨。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10个平方住10户人家；他们在认真地真正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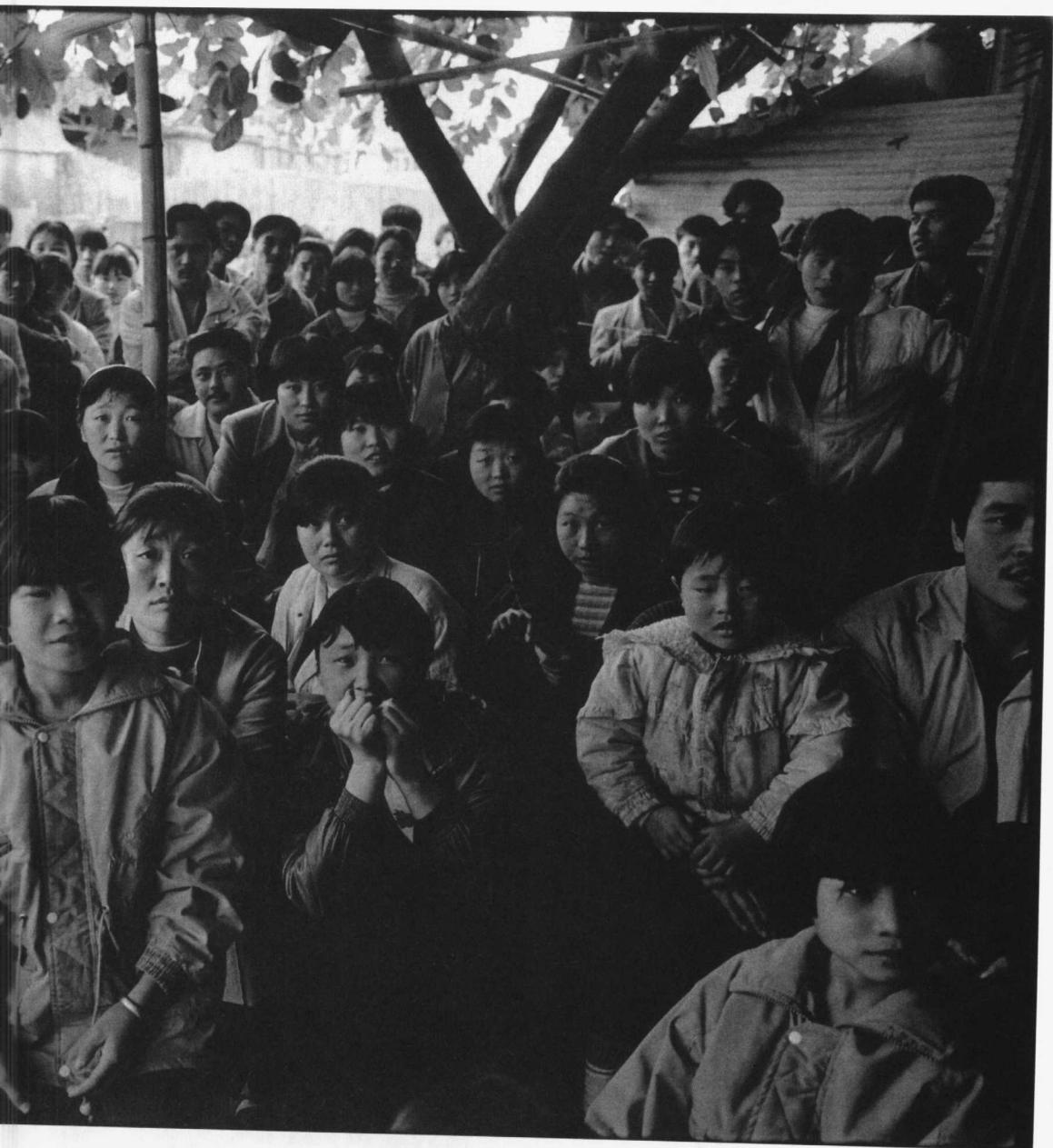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做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污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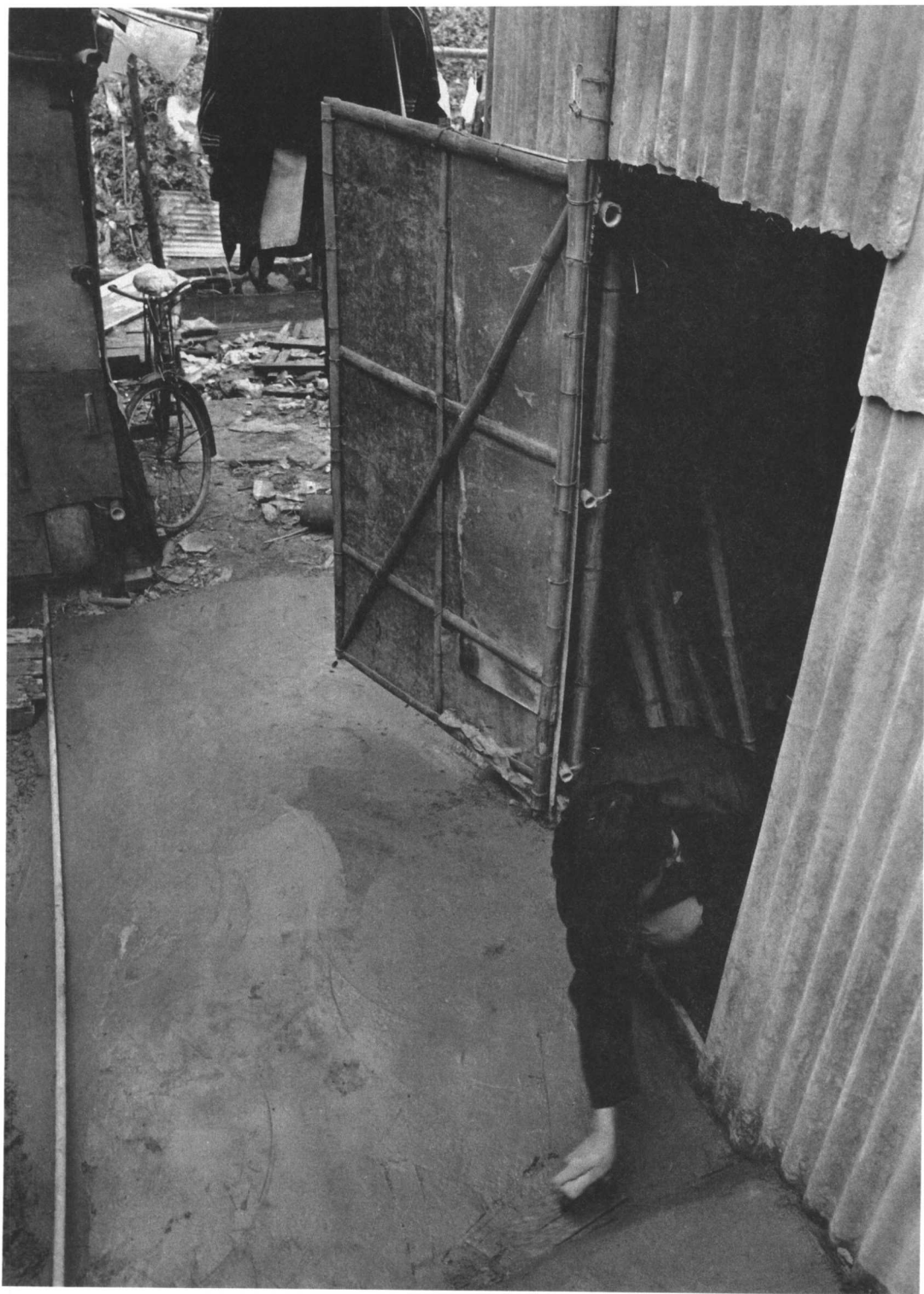
(撰文 / 颜长江)





脸 深圳 1997

正月，很多打工者没有回家乡过年，街上小杂货店的一台电视机前常常挤满了这样的观众。



正在搭建的新棚屋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虽然棚屋随时都有可能被拆除，但仍不断的有人投资搭建新的棚屋。



厨房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住棚屋，图的是能自己烧饭吃。巴掌大的“厨房”摆满了煤油炉子，一间棚屋有多少炉子就有多少家房客。



“家”门口 深圳 1996

一对小夫妻和他们的邻居站在“自家”门口。篱笆沿着巨大的水泥柱子分隔成小屋，门口晾满衣衫。民工们住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里，省钱、省事，方便他们修筑大楼。大楼竣工之时，就是这些建设者搬家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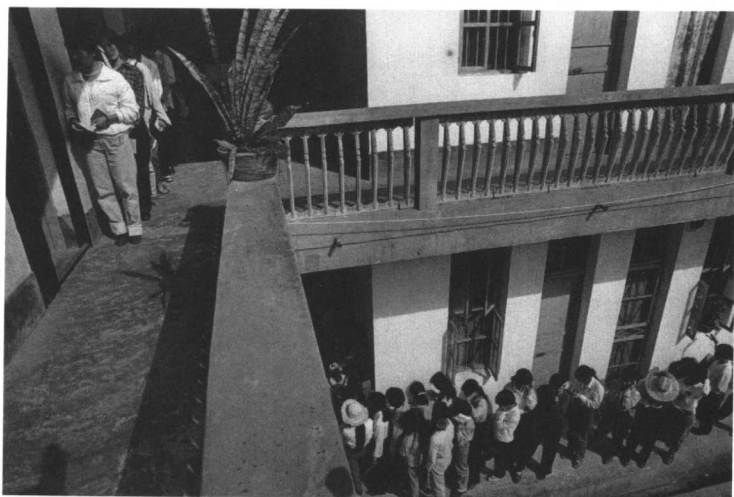
人力车夫 宁波 1996

城市“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叫“人才市场”，进进出出的都是城里人——城市里还有着数百万失业人口。城乡隔绝体制虽然已经动摇，但区别城乡居民不同身份的体制还存在。就业竞争被身份所分割，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一个有限度的、体制外的范围内存在。

第三章 进城

那时读书没出息，
出来下苦力。
——打工诗抄





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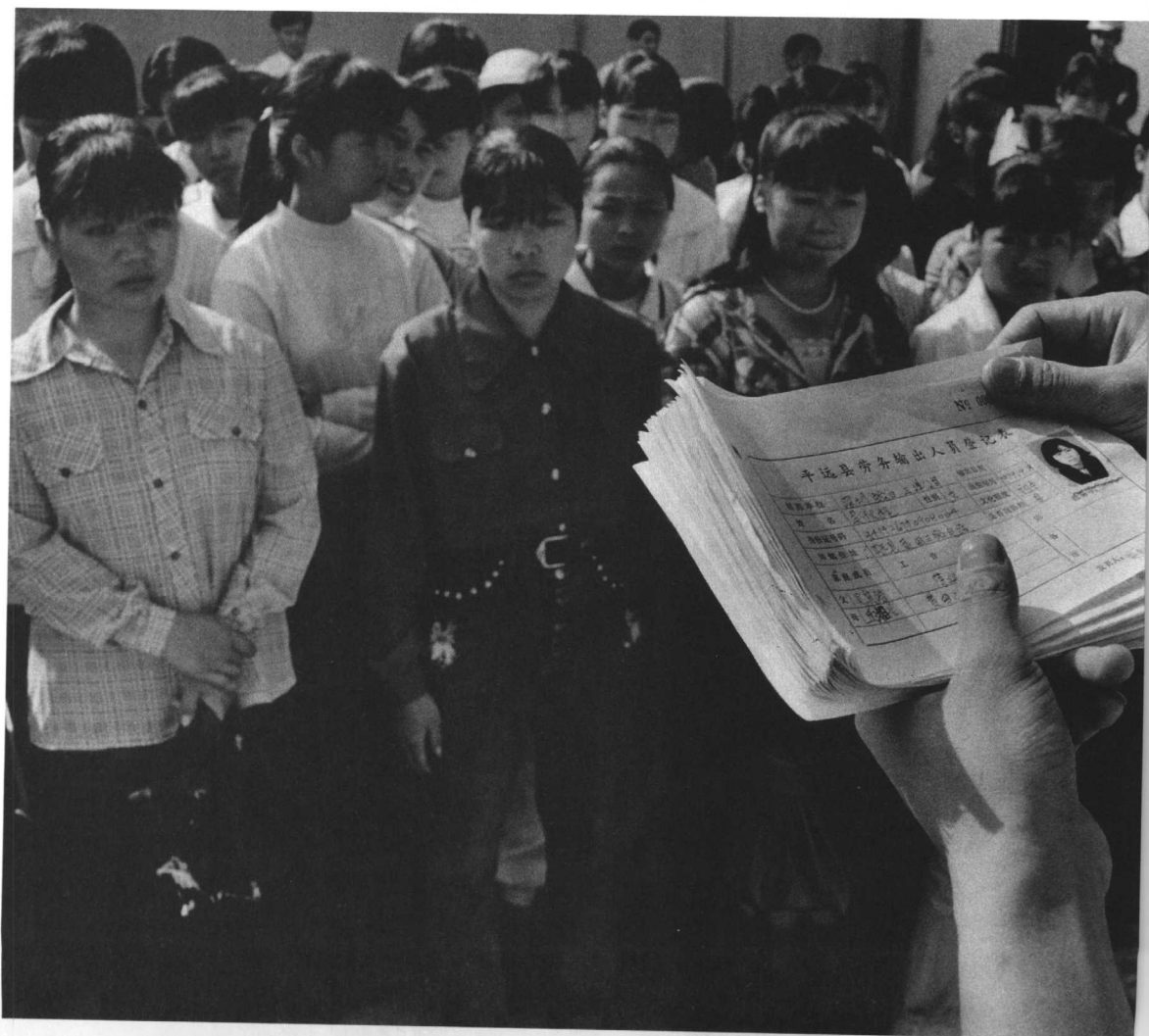
广东平远县劳动服务公司大院
1997

见工者从一楼排队排到二楼,然后一个一个进去接受面试。

面试之后的第一次筛选

广东平远县劳动服务公司 1997

有幸被念到名字者将进入下一轮笔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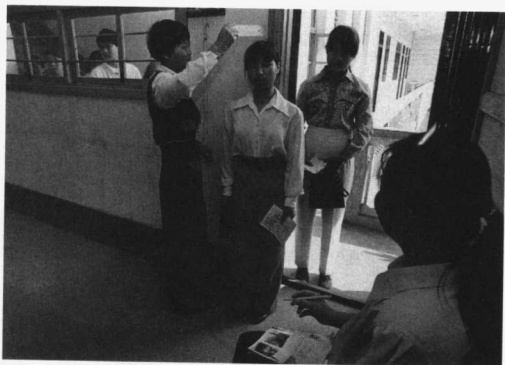


1. 招工

稚气未脱的张桂珍拧着衣角站在太阳底下，大气也不敢出，凝神搜捕着空气中传来的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这是“见工”（即招工面试）之后的第一次筛选，有幸被念到名字者，才能进入下一道程序——笔试。

1997年初夏，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第8次到广东东北部的平远县招收流水线女工。在101个报名者中，有84人参加了面试。现在，已经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宣布出列参加下一轮笔试，剩下的包括张桂珍在内的姑娘们焦急万分。她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可能落选，因为身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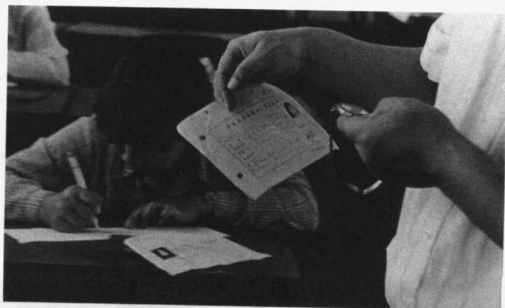
张桂珍身高1.52米，17岁，初中毕业，家住河头乡田心村。“见工”这天一大早，父亲赖开发就骑自行车驮着她，疾驶20公里，赶到县城劳动服务公司的大门口等待。在新一轮筛选的最后关头，终于听到了张桂珍的名字，父女俩当场高兴得跳了起来。



量身高

广东平远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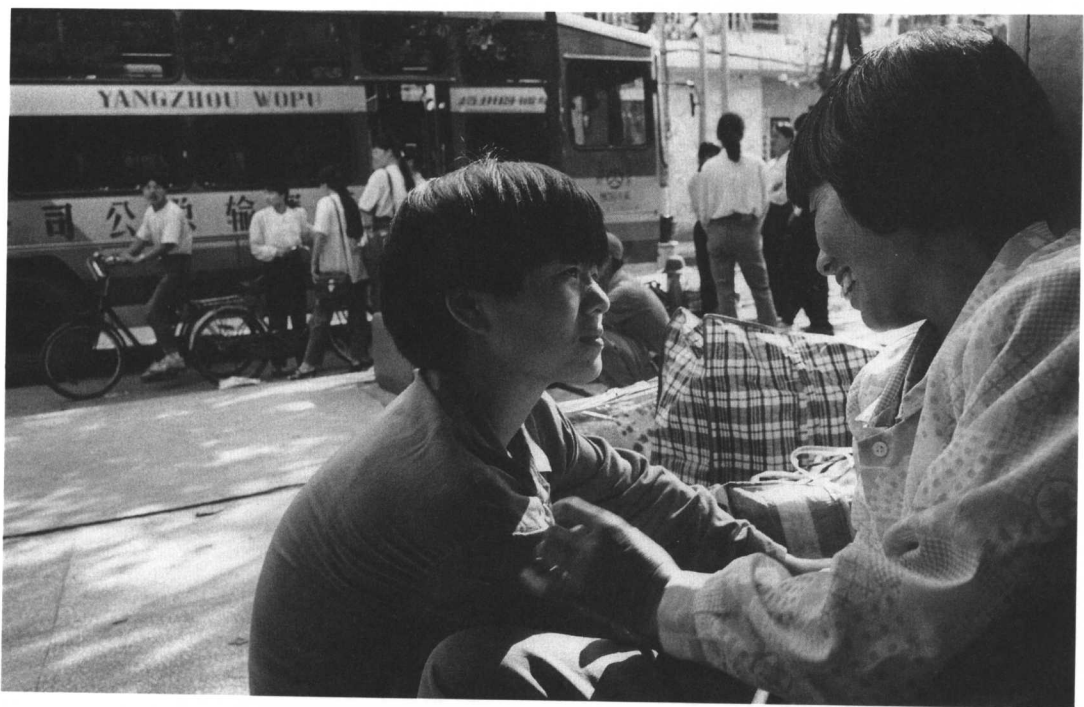
这是面试的第一关。



笔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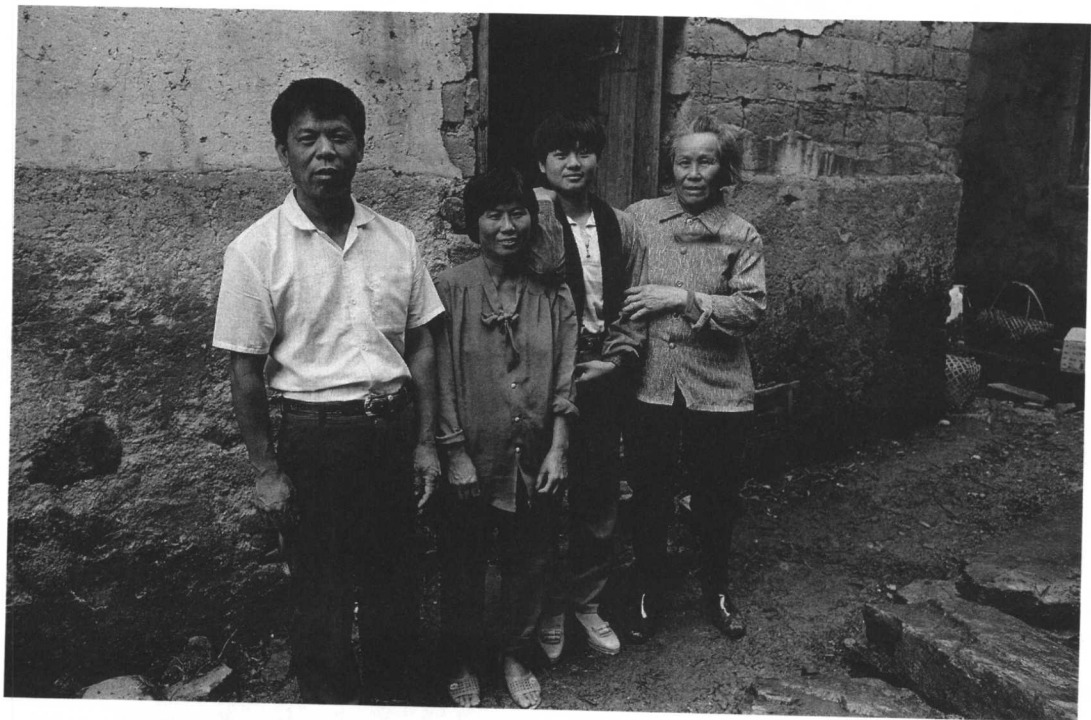
广东平远 1997

将来的流水线工作是以分秒计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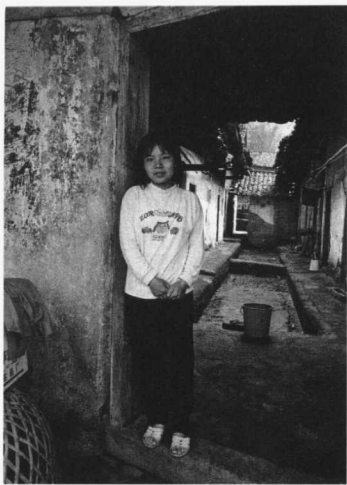
惜别 广东平远 1997

张桂珍通过了考试，即将远行深圳。母亲张莲凤和女儿话别。平远县距离深圳350公里。



合影 广东平远河头乡田心村 1997

张桂珍和父母、奶奶在家门口。



另一位报名者 广东平远 1997

个头和张桂珍差不多的陈预芳在第一轮筛选中被淘汰出局，她的报名表上这样批注：身高不够。尽管她是半月前第一个报名，见工当天早上第一个赶到县劳动服务公司的最虔诚的报名者，她还是只能回到乡村的老屋。



放弃者 广东平远 1997

说再见的时刻到了。有两位经过全程考核符合条件的姑娘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去深圳打工的机会，没有上车。



宿舍的阳台上 广东平远 1997

10天以后，穿上工作服的张桂珍和她的伙伴在宿舍阳台上合影。这里距离香港新界约3000米，从阳台上可以看见那边的山丘和高楼。

女儿去“见工”，赖开发比女儿还着急——家里4口人，3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年收成约4000斤稻谷，能卖2000元；旱地种西瓜、花生，年收成约1000多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全家人年均收入不到700元。这个人均收入在全国范围讲，不算低；但在广东，在平远，在田心村，张桂珍家确实算低收入。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的农业耕作已和过去大不一样。插秧不用了，采用抛秧；除草不用手脚薅秧了，用除草剂；手工打谷不用了，有电动脱粒。四五亩地，赖开发夫妇耕作已绰绰有余，农闲时赖开发还有空到镇里城里打零工。赖开发有个儿子，一年前已去深圳龙岗打工，虽然没往家寄钱，但至少减去了家里的一份开销。女儿长大了，赖开发说希望她也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不然，呆在家里干啥？

张桂珍顺利通过招工考试，一家人很高兴。但是，招工单位三洋公司人事部的汪洋心里却不安逸，甚至有点失落。他和县劳动服务公司驻深圳工作站的李显钦谈起了11年前，那是1986年3月，三洋公司第一次到平远招工，也是平远县第一次接待外资企业招工。三洋计划招80人，竟有1000多人报名，“真是随便挑啊”！那次县里还开欢送会，县长亲自为入选者披红戴花。打那以后，平远县劳动局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重点为沿海发达城市有组织地成批输送劳务工。11年来，共输出劳务工1万多人次，基本上缓解了平远县的劳动就业压力。劳动服务公司还在深圳设立了工作站，派专职干部常驻，处理平远劳工在深圳的各种问题。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深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像三洋公司这样有着三四千用工需求的、管理比较规范的大型外资企业，自然不会贪图省事在工厂周围临时招雇散工，而把招工目标直接对准像平远县这样的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地区，年复一年，顺水成渠。

平远县和江西、福建交界，全县总人口约23万。农民人均耕地一亩以上，不存在温饱问题。每年新产生的16—22岁的剩余劳动力只有4000多个，符合招工条件的所占比例有限。除去零散外出打工的，劳动服务公司每年只能有组织地输出约1000个劳动力。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曾曙光说，连年有组织地往外输送劳务工的结果，使得“见工”者之间的相互竞争趋于平缓。这次三洋招工，汪洋的底牌是希望招80人，但参加面试的才84人，挑选余地不大。老汪只好暗自打了5折，争取招40人，不足部分再去湖南怀化地区招。

结果不出老汪所料：面试筛下14人，笔试筛下12人，在县里初步体检又下去8人等等，最后登上长途大巴抵达深圳的只有48人。这48人在蛇口再次经过体检，最终穿上工衣坐在流水线上的只剩37人。这37位穿上工衣的平远姑娘还不能完全被看做三洋的员工，汪洋说：“还有3个月的试用期。”

张桂珍是最终穿上了工衣的姑娘之一。为了这一天，她父亲赖开发算了一笔帐：报名费、体检费、未婚证费、职业介绍费、往来车费、进厂第一个月的伙食费，加起来一共要花销600多元。赖开发东拼西凑也没能凑够这笔钱，最后把单车做抵押，借了邻居100元才够数。临行前，赖开发请小学教师代写了一张字条：“帮我给女儿安排个好点的工作。”

进厂10天之后，我去她们宿舍拍照，问张桂珍：“工作好吗？”张说：“好个鬼。”她被分配到电镀工厂，“臭死了，那个味道，一天下来，脑壳里头昏得要命”。

两年之后再见到张桂珍，剪了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初被招工时的影子了。她说她已经跳槽了，跳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做售货员。又过了半年，听人说，她已经回了平远县老家。

那次被招入三洋工厂的37名女工中，坚持在流水线上超过3年的，不到十分之一。

无奈 海口 1988

求职未遂的大学生们在街头摆摊。



现场求职

深圳某人才市场 1998

一个职位往往有数10人竞争。





两个和八个 乌鲁木齐一国营商场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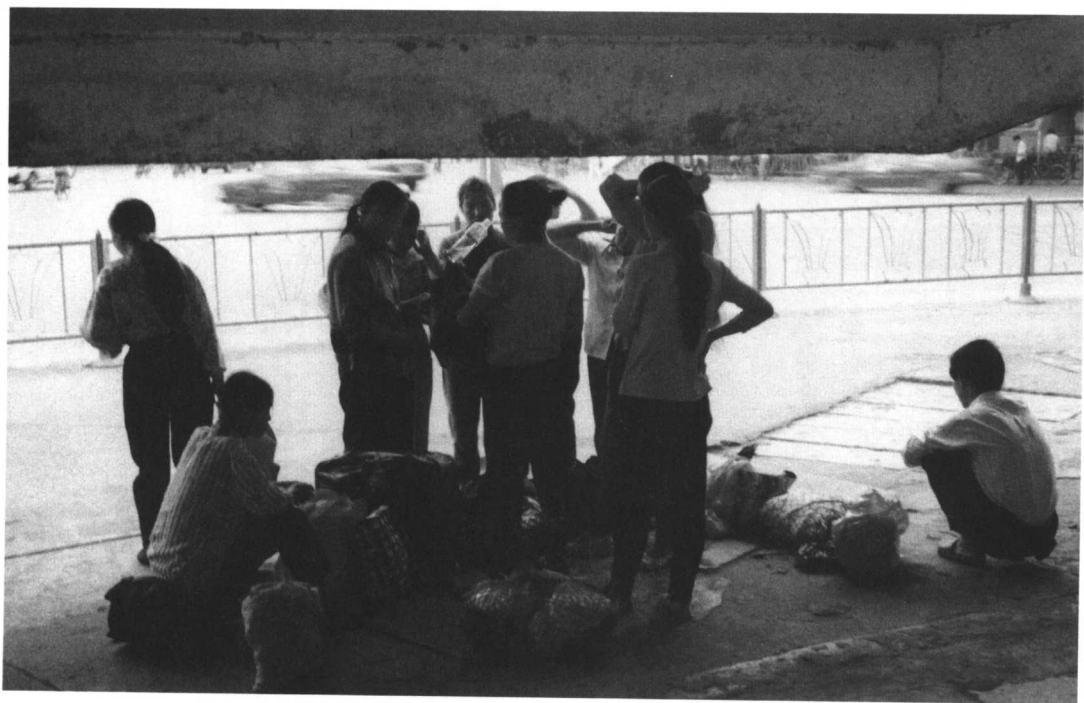
在这家国营商场，一个卖饮料的柜台竟有8个服务员。





照相 深圳 1996

临时拍张证件照以应求职之需。



终于到了 广州 1997

刚下火车，不知去哪里找活干的农村姑娘们。



不是办法的办法

海口 1988

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卖掉自己的吉他以解燃眉之急。



等候雇佣的“棒棒”们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 1995

凭一身力气、一根棒棒、一束麻绳为人做临时搬运工作的农民，1996年在重庆超过10万人，被称为“棒棒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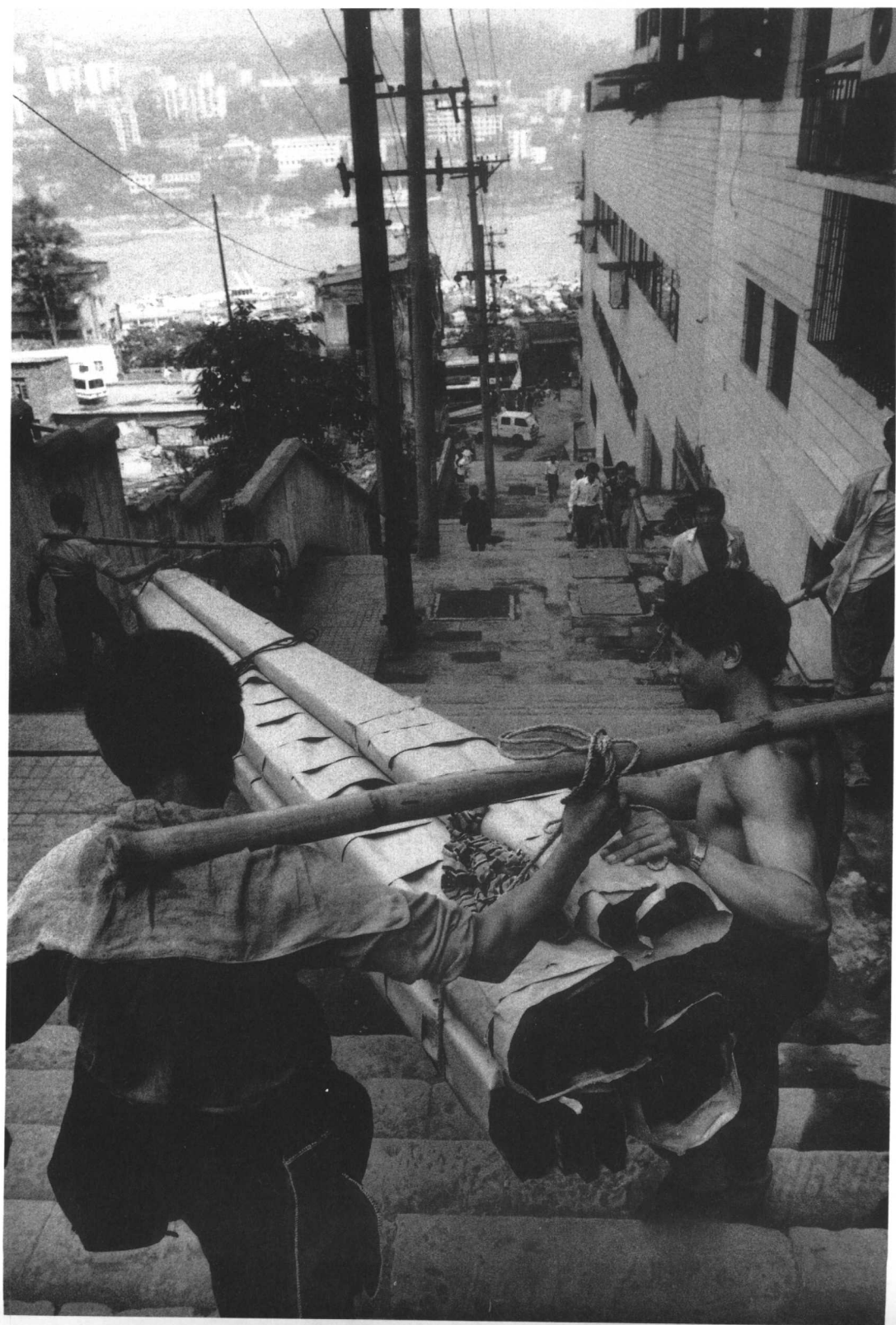


2.山城“棒棒军”

在重庆，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视线里永远有这么一群人——筋骨强健，撸袖挽裤，手持一根3尺棒棒，棒上挂一束麻绳。他们的目光充满期待：期待和人对视，以及对视之后的回应。你无论有什么重物——大至钢材、家具，小至行李、挎包，只需当街一声吆喝“棒棒儿——”，立马就会围来上一群，争先恐后要帮你拿、帮你抬、帮你背、帮你扛，不管是上高坡还是下陡坎，指哪儿到哪儿。

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军”。

称他们为“军”，一点不夸张。在重庆，凭一身筋骨一根棒棒一束麻绳吃饭的“棒棒儿”，1995年至少在10万人以上。他们主要来自重庆四周的郊县农村，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川东北偏远山区的县份，比如宣汉、渠县、广安。



1995年，菜园坝。潼南县檬子乡丁坝村的丁东平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让我看。其实这是一张复印件，原件是不敢随便揣在口袋里的，怕丢。丁东平32岁，1991年就来到重庆“下力”了。开始是走街串巷替人弹棉絮——将又老又旧又板的棉胎拆开，弹得又松又软，再编织成新的棉胎——这种几百年流传下来的节俭妙方过去为城里人省下了铜板，但近几年不灵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舍旧买新而不再想翻新补旧。弹棉絮这行当，在大一点的城市里挣不了钱了，用一根棒棒卖力气却有了大市场。重庆由于其独特的山地环境，很多地方车子去不了，尤其是短距离搬运，上坡下坎穿街走巷几乎全靠人力。早些年，经济不活跃，“棒棒”市场没有规模。近几年，做生意的多了，物也流动，人也流动，需要“棒棒”干的搬运活一下子遍及山城的每一个角落，为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新开了一方天地。“棒棒”成了军，成为山城重庆的一大景观。

丁东平和他的6个潼南老乡租赁了菜园坝火车站靠长江

边的一间窝棚，月租每人30元。“棒棒”们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出门寻活，晚上10点以后回来睡上一觉，第二天再继续。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在窝棚里喝“烧刀子”（一种廉价白酒），一起端着斗碗吃干饭。我问：

“那你们白天出去，吃饭哪个办？”

“看‘业务’喽。‘业务’多，就在路边吃盒饭；‘业务’少，回来自己烧饭吃。节约点，每天5块钱就能饱肚子。如果要吃肉，得6块以上。”

“一天能挣好多钱喃？”

“看运气。运气好，二三十块；运气不好，就得吃本钱。”



“棒棒”们的前辈——穿街走巷的弹棉花人

广安县 1995

（左页图）悠着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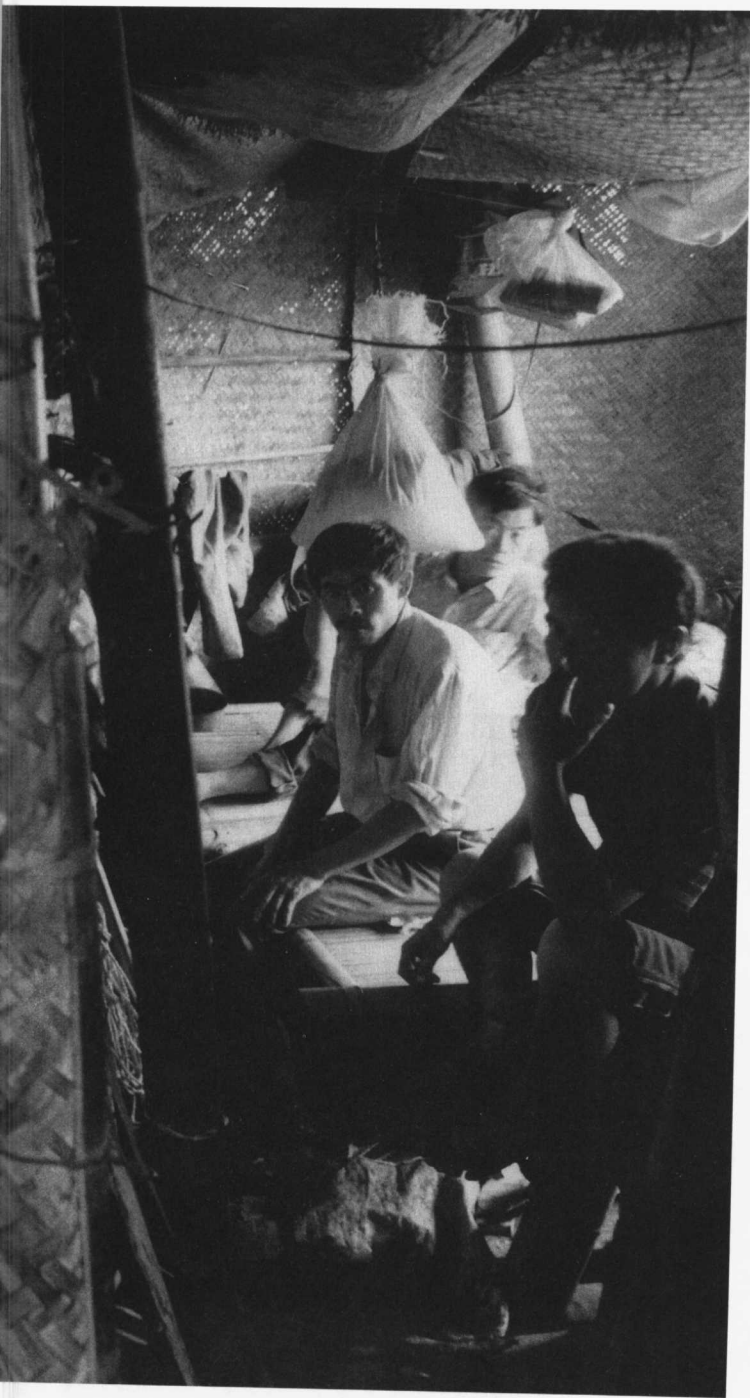
重庆望龙门码头 1995

4位“棒棒”抬着10米长的槽钢下着陡坎。远处是长江。



简陋的寄居场所 菜园坝 1995

“棒棒”们居住的棚屋。通铺，头上吊着米，地下放着锅，吃住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绝大多数“棒棒”并非一年到头都在城里干。大春小春农忙时节，他们都要回家种田的。在城里当“棒棒儿”，干最重的活过最俭省的日子，为的就是回家的时候能攒下几百元钱。

“攒钱修房子？”

“哪里的话！在这儿挣的钱，只够屋里头油盐酱醋，和缴那些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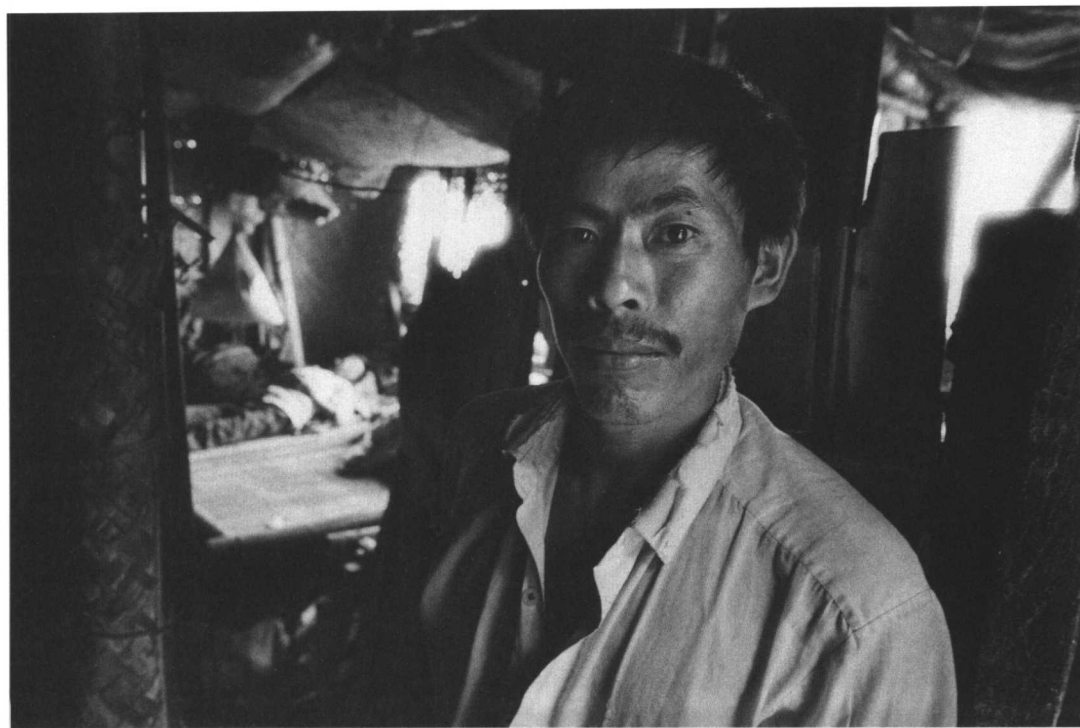
在窝棚、路边、车站、码头，和“棒棒”们混在一堆，他们会说：“你哪个想起拍这些嘛。干‘棒棒’，很苦，也没出息，别人瞧不起，但是做生意，我们没得本钱；做其他的，我们又没得技术。我们有的，就是力气。山区嘿穷，祖祖辈辈种田，也没种出个富裕来。现今政策活点儿了，可以进城找钱了，但是除了干‘棒棒’卖力气，我们还能干啥喃？”

丁东平说：“比起广东的那些打工仔，我们还占一点儿起首，就是自由——不舒服了就歇，实在不想干了，就回家。反正离家莫得好远，不像那些去广东的，出去一趟回来一趟，都嘿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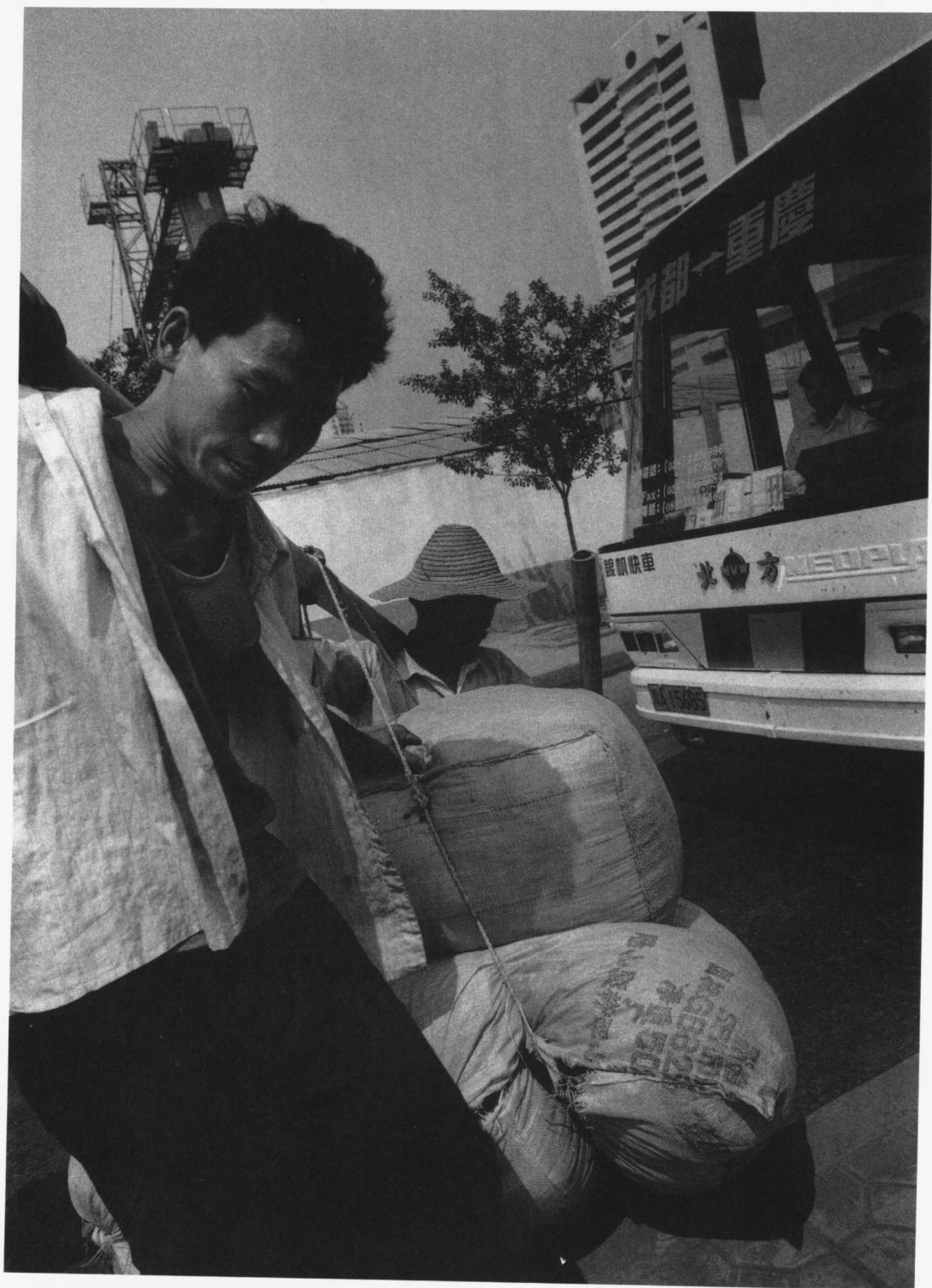


可以歇口气了 重庆 1995

一位“棒棒”把货送到朝天门之后，再赶公交车返回菜园坝。



丁东平在他的窝棚里 菜园坝 1995



“棒棒”言论 汽车站 1995

“棒棒”们说：“谁说我们是盲流？我们干的是物流！”



荡悠在高楼之间的洗墙工们

深圳 1997

3. 荡悠在高楼之间

深圳高楼林立，人所共知；深圳的高楼一幢比一幢漂亮，也是人所共知。但是，这些摩天大楼需要定期洗脸擦面，才能保持光鲜亮丽这档子事，知者不多；那些被称做“蜘蛛人”的洗墙工，荡悠在摩天高楼之间的滋味，更是鲜为人知。

登山，脚踩在山体上，山再高，心里多少也还踏实。给摩天高楼洗脸，却是四肢悬空，一百多斤身家性命全部拴在一根“春都”火腿肠粗细的麻绳上。不要说使用刷子、刮刀、清洁剂、钢丝网洗刷玻璃幕墙了，光是从几十层高的楼顶上往下溜一遭，一百条汉子也难找到两三个应声者来。据说有不信邪的，上去了，也下来了，裤裆却湿了一大片。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干过起重工，受过高空作业训练。1997年重阳节过后，拍摄洗墙工，在地面上总没找到感觉。后来和他们一样，也一根麻绳系在腰间往下溜。他们荡悠着洗墙，我荡悠着拍照，从26层拍到地面，他们觉得有点意外。过后在大厦的天台上，有个叫钟家财的洗墙工问我：“你怎么不怕？”我说：“你怎么不怕？”这位来自湖南桑植县芙蓉桥乡的小伙子说：“头一天凭着一股劲上去还没想到害怕。第二天怕了，怕得很，不想干了。”为啥又干下来了呢？“找不到别的事情干啊。另外呢，虽然是在别人的城市洗墙，但是能找到家乡那份感觉。因为一起上高空洗墙的伙伴大多是桑植人，老乡在一起，好像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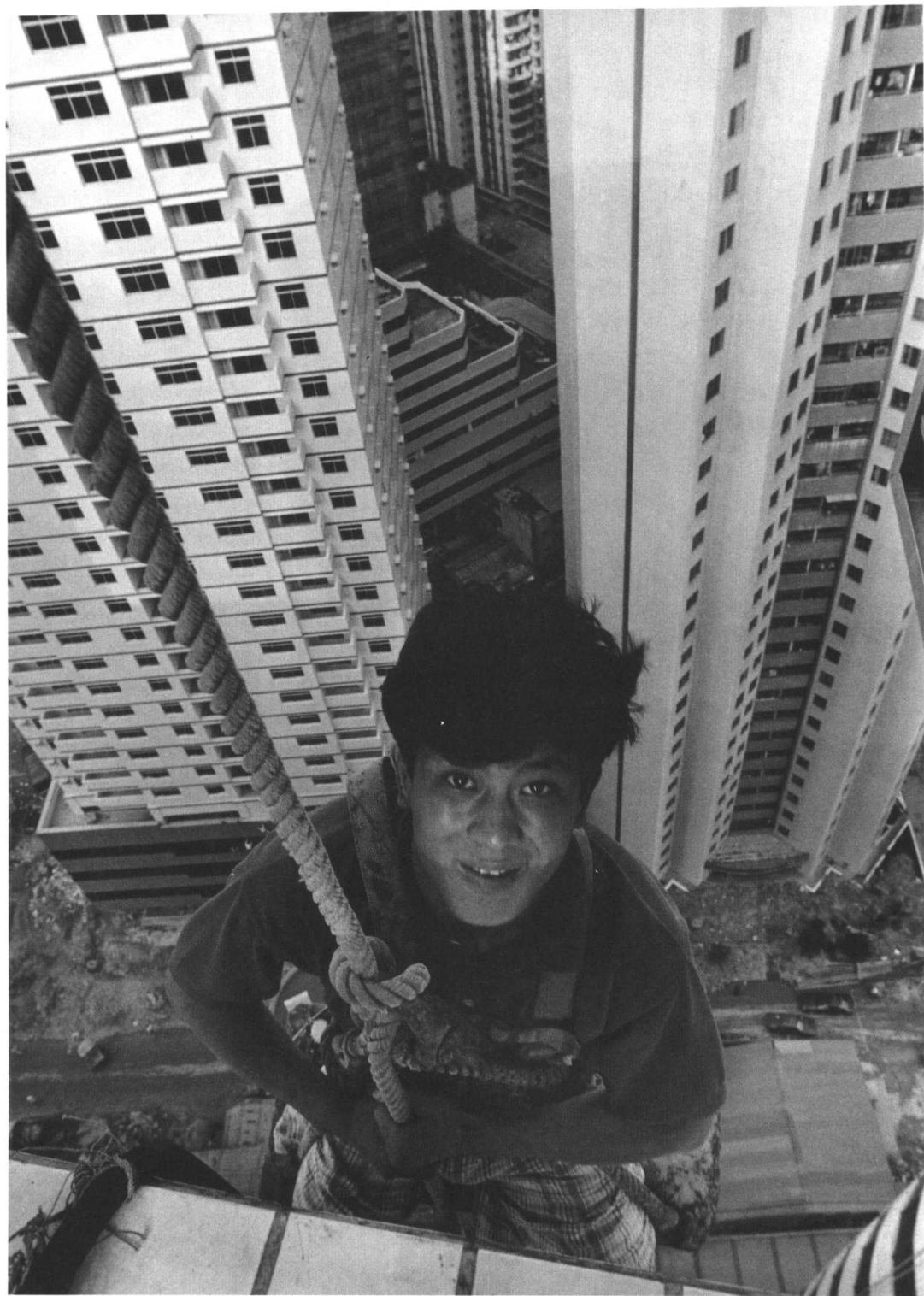
初中毕业的钟家财22岁，18岁那年闯深圳。做过手饰盒厂的工人，干过装修，当过保安，但是每次都干不长又被迫换单位。“他们解雇你不说明什么原因的，”阿钟伤感地说。漂泊无定，才真正使阿钟感到不安全。他两度返回家乡种田，但始终摆脱不了深圳的诱惑。1997年5月再来深圳，加入了爱地王清洁公司的洗墙队伍，十几个高空伙伴中，湖南老乡占一大半。



“全靠它了”

深圳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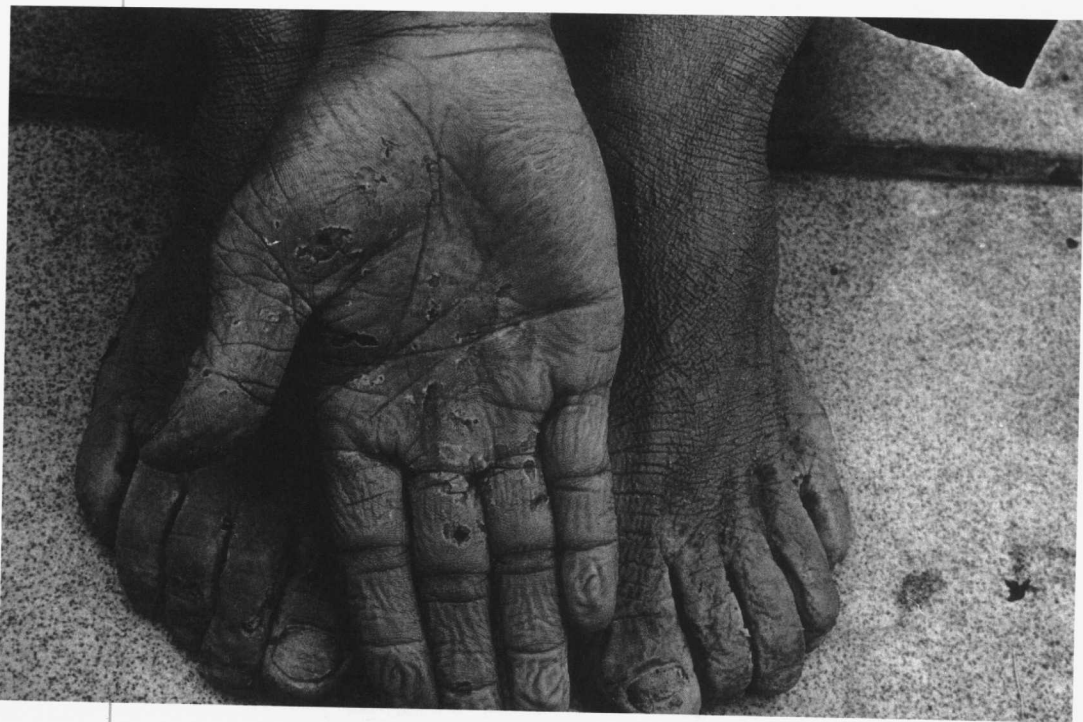
身家性命全系在这根“春都”火腿肠粗细的麻绳上。



溜下去 深圳 1997

洗墙工钟家财从楼顶下到墙面作业。

深圳注册的各类清洁公司有一百多家，能够搞高楼外墙清洗的公司大约20多家。阿钟所在的爱地王清洁公司，洗过赫赫有名的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玻璃幕墙，在同业中颇有些名气。公司技术员阿龙告诉我，一般来说，装有大面积玻璃幕墙的高层新建筑在投入使用之前，都要清洗幕墙；一些著名摩天楼和酒店，每年还要定期清洗。清洗高楼幕墙这一行业，从无到有，再到竞争激烈，发展很快。



钟家财的手和脚 深圳 1997

钟家财来自湖南桑植，18岁闯深圳，做过流水线、保安员，饱尝找不到工作之苦。22岁那年干上了洗楼工。

阿钟入行4个月，已经干过6幢大厦的外墙清洗，最高的34层。由于清洗时间的限定，每接下一幢新楼，洗墙工都如同上战场，吃住都在楼顶，分秒必争。阿钟说，情况正常的话，每天平均1人能洗300平方米的玻璃幕墙，不过得干10个小时。

钟家财和他的高空伙子们14人合住三房一厅，房租平摊下来每月每人100多元。阿钟说，如果不闲着，他每个月的洗墙收入大约在1500到2000元之间。收入虽然不高，但过去那种经常失业的恐惧却少了许多，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往挂在摩天高楼墙壁上的绳索上挤。阿钟很庆幸自己被“逼”上绳索，并且已经如履平地。



在天台上吃盒饭 深圳 1997



睡在楼顶的过道上 深圳 1997



脚踏实地 深圳 1997

双脚落地，才知道“踏实”的滋味有多好。

4. “我们打工挣钱，供儿子念书”

认识谢碧英的时候，她48岁。11年前从福建仙游农村来三洋公司打工时，她的女儿谢玉苹才9岁，留在仙游老家没带出来。1996年，女儿也进了三洋，做丝印工，和母亲同住一个6人集体宿舍。上下铺，女儿睡上铺，母亲睡下铺。

下班的时候，我到四海宿舍找了谢碧英两次，都不在。同宿舍的女工说，阿姨以厂为家，几乎每天加班，要想在宿舍找她，只能在晚上八点以后。

谢碧英在三洋的塑胶厂做清洁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要比别的工种早到岗晚歇息？辛苦吗？谢碧英淡淡一笑：“再辛苦，也没做农辛苦。”

做农多年，给了谢碧英硬朗的身板。“来三洋十多年，我从没休过一天病假。”

清洁工谢碧英，1992年度曾被评为三洋公司一级优秀员工。

谢碧英的丈夫南昌交通学校毕业，1979年蛇口刚开发就随供职单位交通部四航局来了蛇口，名副其实的“拓荒牛”了。但是谢碧英夫妇在蛇口没户口，也谈不上买房。

谢碧英说：“我们打工挣钱，供儿子念书。”

谢碧英有两个大学生儿子。老大毕业于福建农学院，现在南屏林学院执教；老二1994年同济大学毕业，当时正在上海交大读研究生。

辛劳的母亲，养育了争气的儿子。对于女儿，谢碧英说：“人各有志，我让她来深圳，是希望她见世面，受锻炼。”

女儿谢玉苹刚来三洋半年，对这个崭新的世界还不甚了解。但很显然，她比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姐妹们要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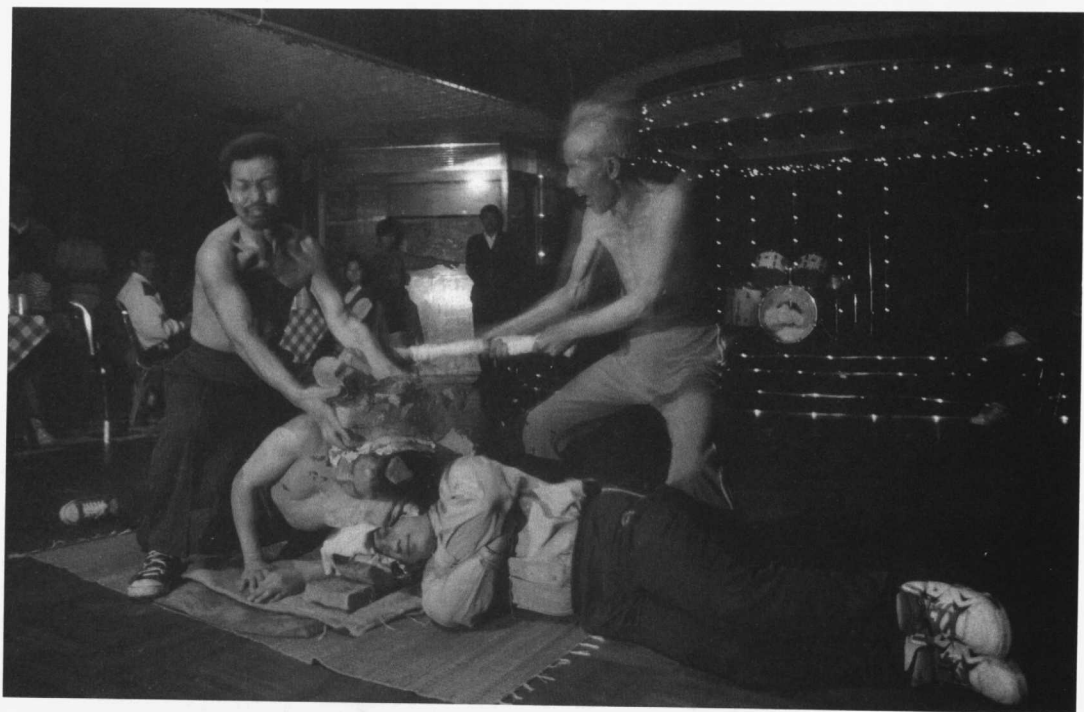


谢碧英、谢玉苹母女 深圳 1996



孪生打工姐妹 东莞长安镇 1997

1997年3月，河南方城县柳河乡的一对孪生姐妹裴学婕、裴学好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这对9月份才满17岁的双胞胎最初在东莞长安镇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还得再加2个半小时的班，没有星期天，每月只放一天假。第一个月，她们每人领到290元工资。第二个月360元。第三个月，也只领到520元。每天工作14小时实在让她们无法忍受，只好向在深圳工作的姨夫求救，求姨夫想办法给她们另外找份工作。



“砸下去！” 深圳 1990

来自湖北的乡村气功师在歌舞厅里串场。



街头的刷墙工 成都 1995



涌入海口的寻梦者们 海口 1988

(118页图) 沉睡 成都 1994

(119页图) 一张石凳就是一张床 深圳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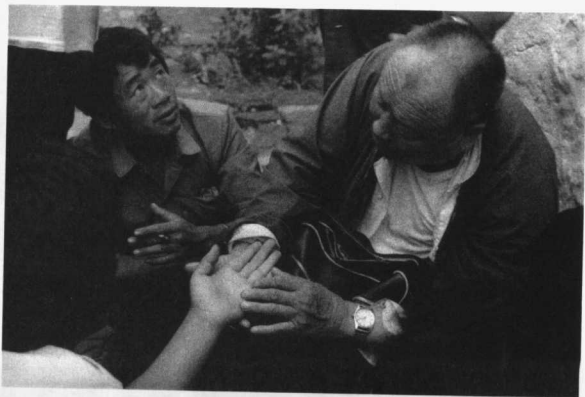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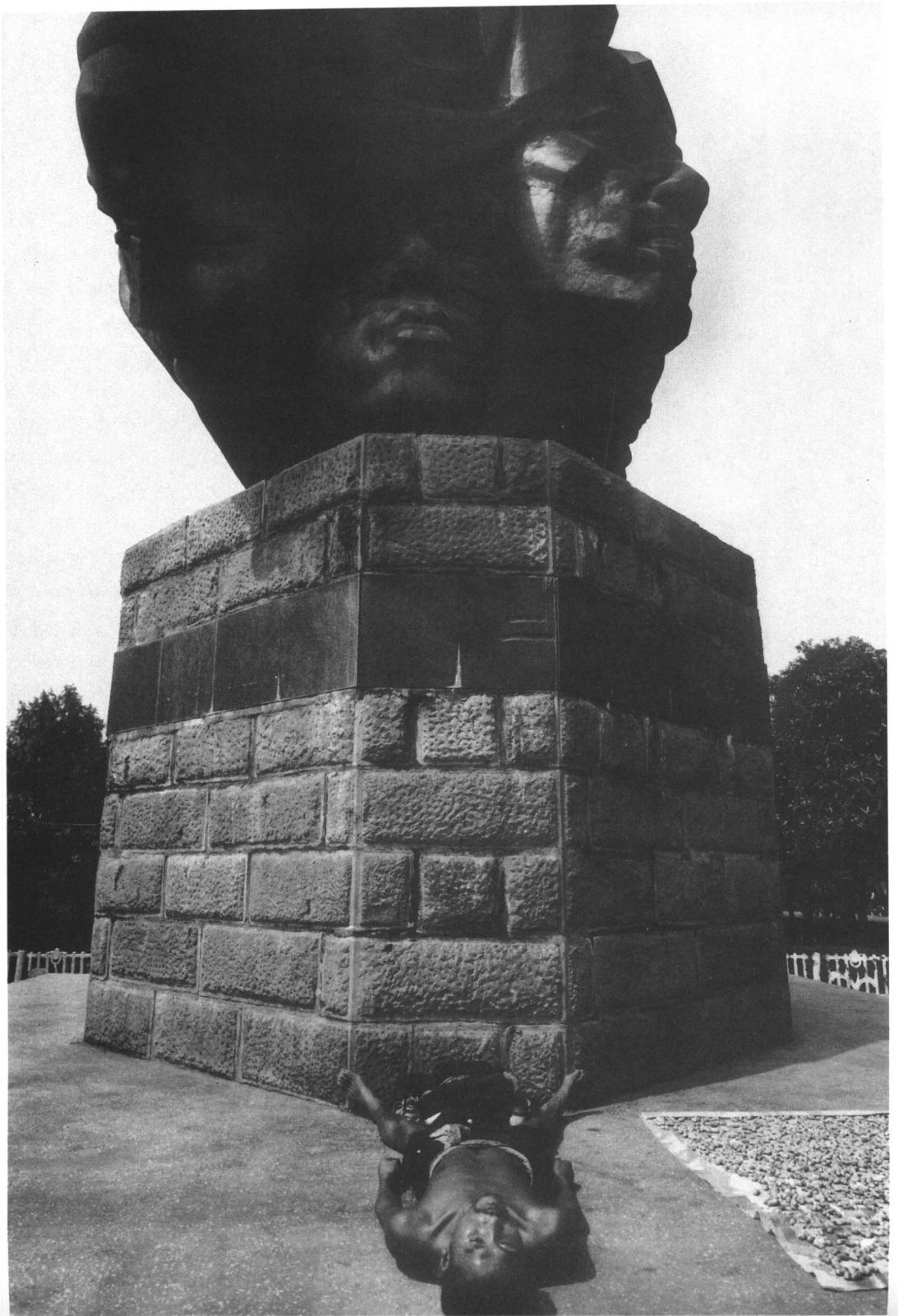
算一卦 深圳 1991
民工是街头算命先生的主要财源。

插入资料：事件与信件

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1名打工妹在大火中罹难，40余人受伤。

劫难过后，有调查单位在废墟中找到一部分遇难者的信件。109封信件中有10封提到寄钱的事。其中4封信是受两姐妹资助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1年，从1992年5月1日至1993年6月29日。调查者根据信件推测，这两位罹难的姐妹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父母50多岁了，在家种着5个人的田，还养猪。二老都不识字。1989年哥哥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和借债支付他的学费开支。到1991年，两姐妹出来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一人每月寄回150元，一半给哥哥，一半给父母用来还债。哥哥很体谅妹妹的钱来之不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100元就够了，只是实习的一个月需要300元”。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经分配到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我自己了”，“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哥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能忘掉这一切呢？”哥哥分配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惨烈的大火就永远结束了两个妹妹的打工生涯。









第四章 何处是家园



上去再说 江西 1997

春节过后，南下的农民工大量外出，即使是小火车站也很拥挤。

1. 家在何方

199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要回家团年,如果再买不到火车票,就回不去了。

但是,大量的打工者最后还是没有买到火车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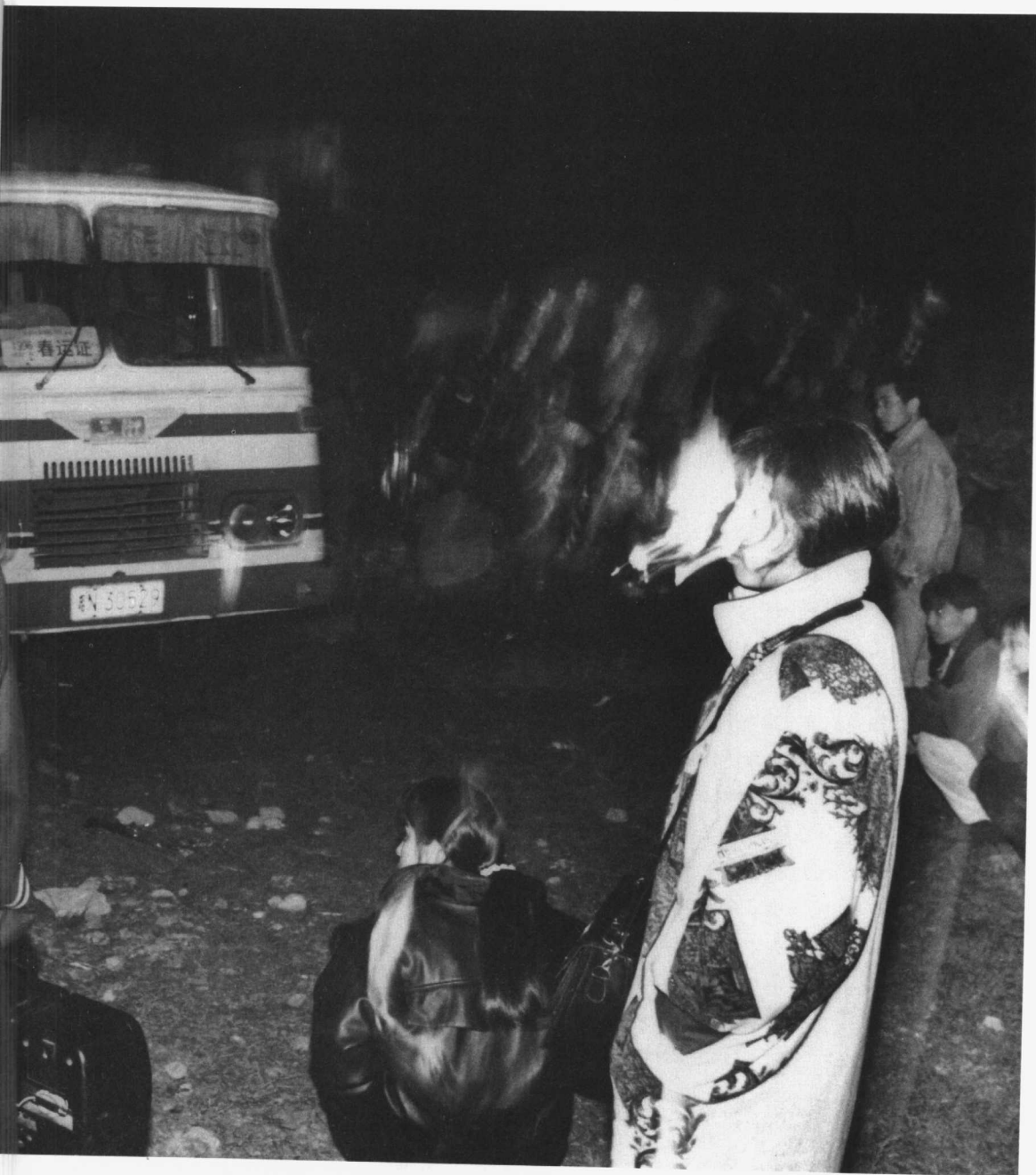
只好坐大巴。

早在前几年,湖南的一些汽车运输公司就看到了火车运力不足带来的商机。1995年春节,湖南怀化汽车运输公司组织了18辆大巴来蛇口,接送返乡过年的湘籍打工者近千人。

1996年2月10日,四海宿舍区的马路上停了8辆湘运公司的大巴,晚上九点启程,线路是蛇口—广州—桂林—三江—怀化。2月12日下午两点抵达怀化,340余名打工妹和60多名打工仔将在车上度过两个夜晚和将近两个白天,历时41小时。途中除了上厕所,仅有3次停车吃饭。

我是从驾驶室的门挤进车厢的。座位早就没有了,过道的加座也没有了。隆冬季节,要在车上过夜,都穿得厚。还有行李。大件的码在车顶,已经码得很高;小件的全塞在车厢里面,全车满满登登。我盘腿圈在发动机盖子上,和副驾驶员一起挤着对付。当然也一样买全价票,280元一张。





寒风中的等待 广西与湖南的交界 1996

半夜，车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山上抛锚。在寒风中等待了近一个多小时后，大巴终于排除了故障，乘客得以重新上路。

车门口堆满了行李。有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也没有座位，就一直站在那里，两手把着隔栏。天快亮了，我发现她还这么站着，就招呼她过来，要让她坐。但是她不肯换我来站，天很冷，只好一起挤。这样，发动机盖子上就挤了3个人。这姑娘姓向，叫向利群。她说，她本来没打算回家过年，想一个人静静呆在宿舍读点书。但是当看到姐妹们都在收拾行装时，思乡之情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临到开车前，终于还是挤上了大巴。向利群的家在黔阳县翻坡村。我一听地名，感觉那是个山区，就说：“去你们家过年，可以吗？”她说她家离怀化还有一个多钟头的汽车路，要过河，还要走十几里不通汽车的山路，你敢吗？我说这次跟着你们采访，想走的正是山路。

车抵怀化，90%的乘客都要换车继续赶路才能到家，短则几公里几十公里，长则一两百公里。向利群说，幸亏我要去她家采访，不然，她得一个人再赶汽车才能到黔阳县。3年前她从翻坡村出来的时候刚满21岁，在外面特别想家。她不停地安慰我，说那段不通车的山路其实没多远，她上小学每天要走的山路都比这远，上中学每天走得更远。高中毕业之后，亲戚帮她在洪江县城里找了一家小商店做会计。如果一直在山村种田，或许就不会遇上三洋招工。大概因为是高中生，长得也漂亮，在流水线上干了一年多之后，被提升到进出口部做报关员。和海关打过一年多交道的翻坡村妹子，看上去已经是城里的白领丽人。

翻坡村，和通汽车的黔阳县城隔一条大江好几座山坡，不通电话，消息只能靠人捎口信。从深圳到怀化的这趟大巴是春运“临担车”，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为了不错过班车，她父亲竟提早了20个钟头赶到县汽车站门口等着接她，从白天晚上等到第二天下午。然后，把女儿的行李和我的行李全部挑在肩上，等渡船渡过沅江，再翻山越岭，健步如飞。

48岁的向声安膝下有3个女儿，老二在家务农，老三还在念书。向声安很为自己的大女儿在深圳干得不错而自豪，不然公司怎么会把她从流水线调去做报关员呢？向家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堂屋里屯了大半屋柑桔。晚饭后，我发现堂屋里多了个大木盆，柑桔堆旁边还多了一木桶热水。老向出去把两头厢房门拉上，说：“乡下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你就在这里对付吧。”晚上和老向合挤在一张窄木床上听他拉家常。他说去年卖柑桔、养猪、种水稻合起来收入也差不多有10000元，但是买种籽、化肥、农药也花去他6000多元。他家在翻坡村，算不上富也算不上穷，中等，因为“家里都是女仔，没有壮劳力”。我知道，老向实际上在抱怨女儿没给家里带回一个好女婿。





吊在农用车后赶路 湖南怀化 1996

从怀化到黔阳县还要赶车，山区的路颠簸不平。看见同龄的姐妹吊在农用车后面，向利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和老爸一起贴春联 黔阳县翻坡村 1996



满24上25的妹子，在城里属于年轻，在乡里已经是大龄。

当初和向利群一起到三洋，去年辞工回到了家乡的段承梅说：“出去打工，年龄小还行，年龄大了怎么办？女孩子总是要结婚的呀，在工厂，可能吗？”

据资料显示，1996年在深圳的外来打工者有140万，男女比例为2:10。这次400多的大巴乘客中，只有60多名男性，其余340多人全是清一色的湘妹子。三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使她们除了车间饭堂宿舍之外，很难有别的空间。向利群说：“我周围有三分之一的打工姐妹都到了这年龄，以后怎么办？连想也不敢多想。”

段承梅回乡后被一所民办中学聘为教师，已经有了男朋友。我向利群：“你还能回到这里来吗？”她说：“我不想回来。这两天你也看见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已经是个客人。千里迢迢回来几天，是因为过节，特别想家，想亲人。在深圳，我没有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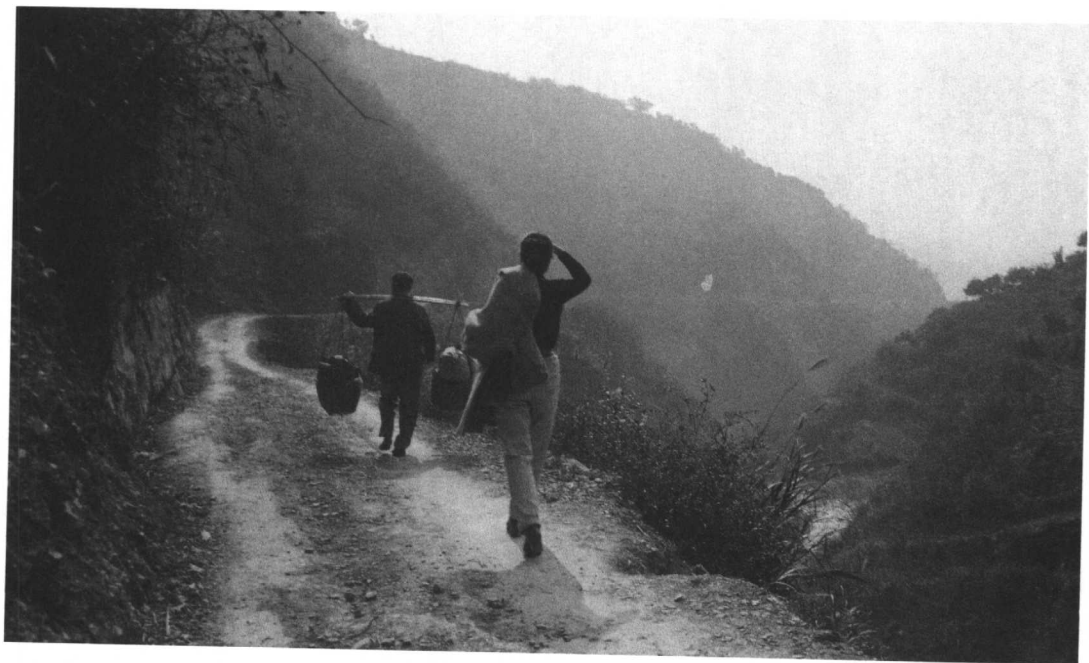
已经跳出流水线的向利群，比起其他打工妹，是多了一线希望。她希望有一天在深圳能有自己的小家，所以才想“静下来读点书度过春节”。但是在那一年的春节，她没能让自己静下来。3年以后我在培训中心的电梯口碰见她，以为她在读夜大，她说没有，想跳槽，来这里打听会计培训班的事。

5年以后碰到向利群，她已经29岁，跳了几次槽，婚姻还没有着落。



一家五口的团年饭 黔阳县翻坡村 1996

在深圳，向利群盼的就是这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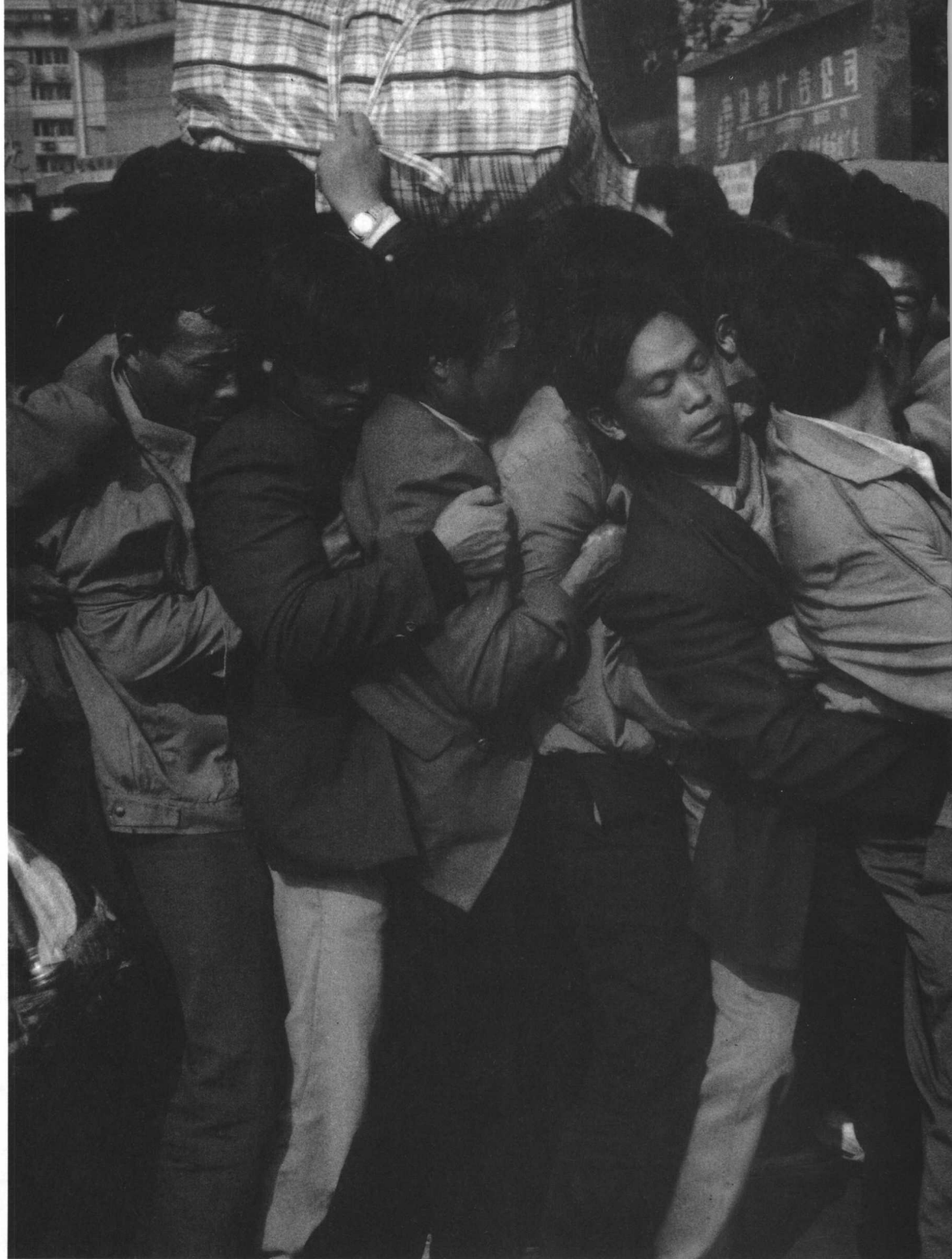


走出山乡 黔阳县翻坡村 1996

向利群的父亲为女儿挑着行李，再一次把女儿送出山乡。

(右页图) 吊在车门外也要走
江西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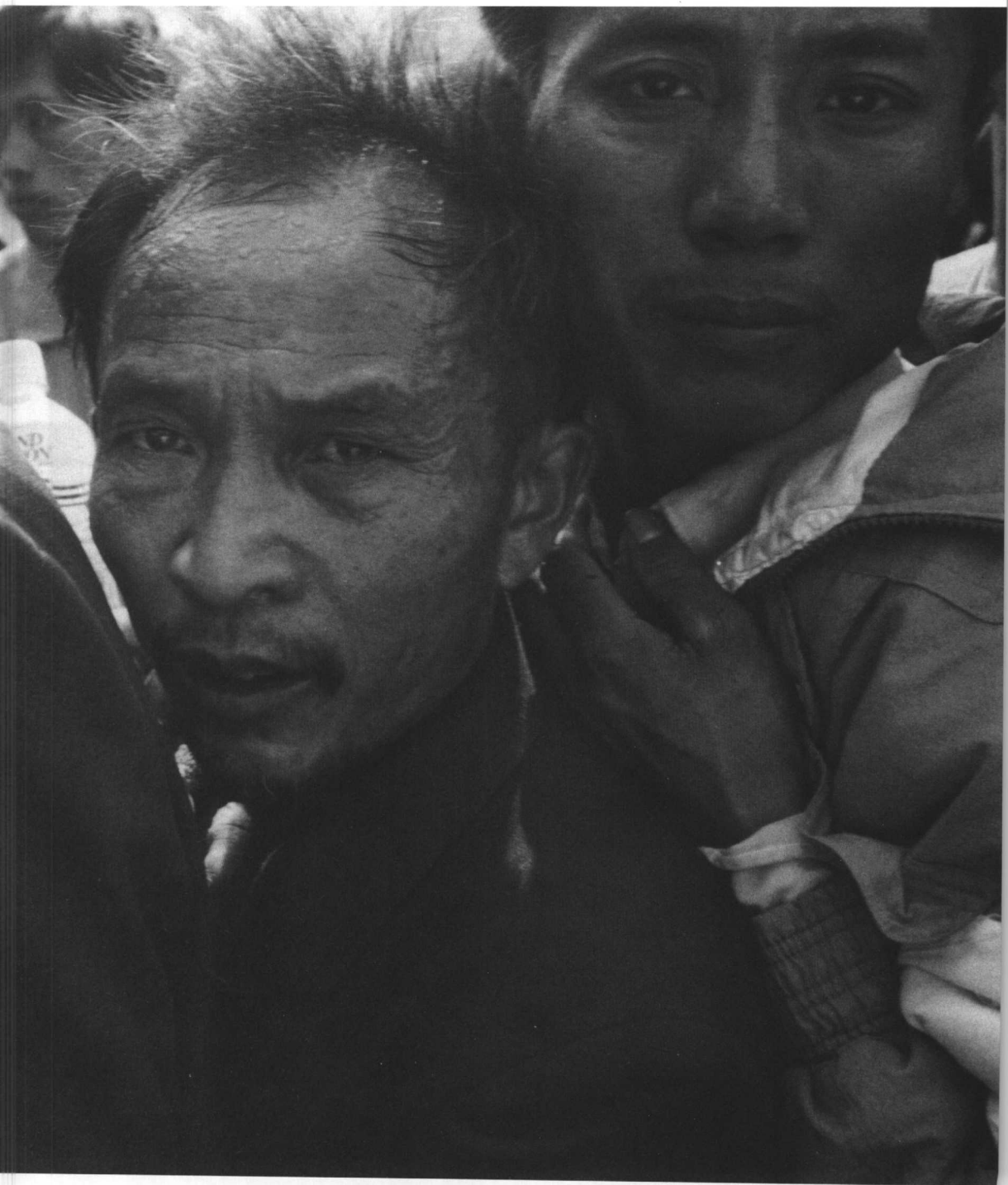




“搂抱” 广州火车站 1996

农民外出打工，和城里人相比，出门、返家大多在春节前后。农民工买票、乘车都更为艰难。





脸挨脸，背接胸 广州火车站 1995



来也不易，去也不易 广州火车站广场 1980
等车的打工妹脸上刻满了无奈。



破车也行 湖南 1996
只要能坐上车，哪管它车窗破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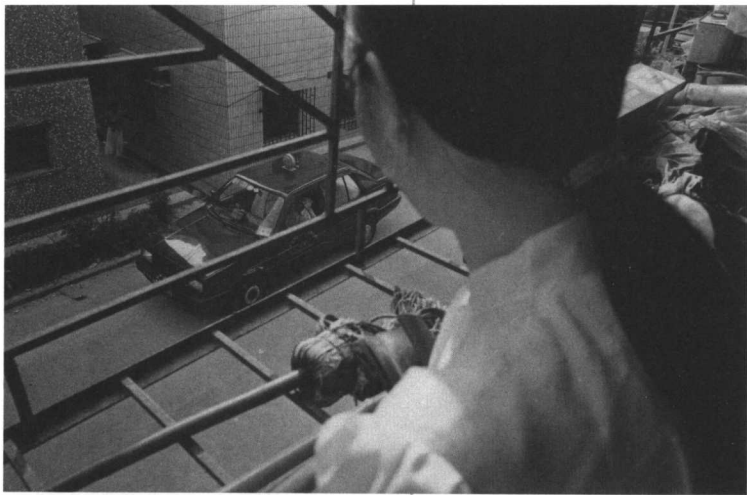
2. 的士佬朱国干

1995年初，朱国干32岁，这位在湘运公司开“东风”卡车的湖南汉子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决定：到深圳开的士。

当时，深圳在册的出租车（的士）已经有6000多辆，竞争激烈但前景看好，很多客运公司都在加大投资扩充营运。在同乡的推荐下，朱国干加入了深圳老牌客运公司“安达”的行列。朱国干有好多同乡在深圳开车，“光每年参加县车辆监理所在深圳年审的攸县籍司机，包括大中巴、货车、的士司机，就有5000多人”。朱国干说：“我住的这个石厦新村，95%以上的住户是的士佬，都是湖南老乡。”

石厦新村靠近深圳河入海口，远离市区。1995以前，还没有专线中巴，交通很不方便。开出租车的怕交通不便，只怕房租贵。石厦新村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房租相对便宜，自然成为的士佬租房的首选，石厦新村于是成了“的士村”。朱国干家同另外两位开的士的老乡，合租了一套68平方米的三房一厅，月租1500元，由三家的士佬按寝室面积分摊。

深圳的出租车行业实行承包制，的士司机除了人品可靠技术合格之外，首期要交纳相当数额的风险金和车租。朱国干开的这辆“捷达”，签的是5年合同，首期交了10万元。此外，每月得正常交车租、养路费、保险费，加起来合计10200元。这意味着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刮台风下暴雨，无论车轱辘转不转动，每天每位的士司机必须为公司创造340元以上的价值，多出部分才是自己所得。



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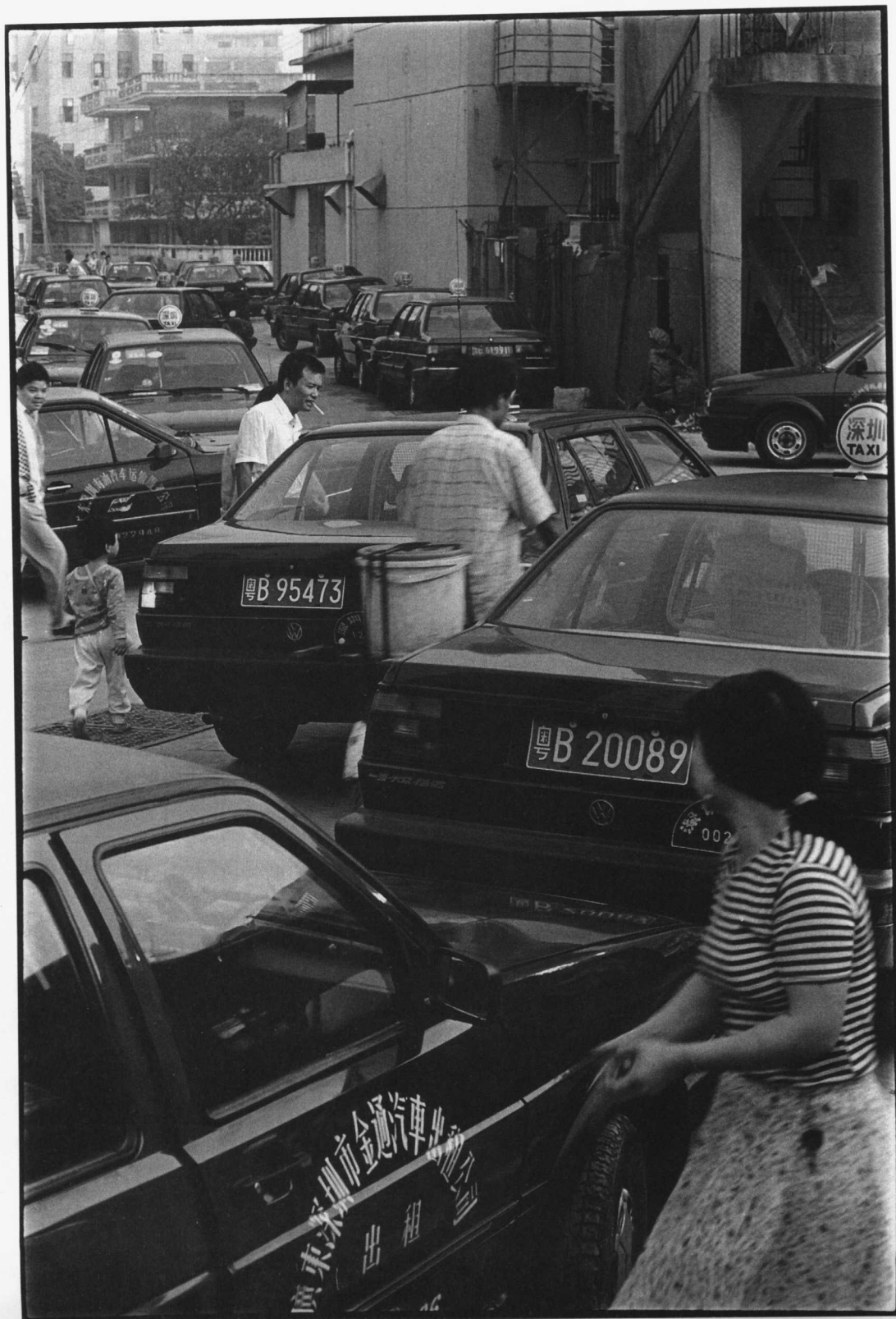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出租屋阳台——的嫂们的“望夫台”。

（右页图）例行的繁忙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早晨七点左右，是晚、白班交接时间，的嫂们趁这个时候清洁出租车。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是“的士村”最热闹的时刻。跑夜班的车回来了，的嫂们忙着擦车洗车，好让白班车干干净净出门，容易拉到客人。经济压力使得的士24小时闲不着，白班夜班各跑12小时是的士司机最普遍的作息。朱国干的夜班搭档是他哥哥，一间15平方米的寝室放两张床，兄弟俩轮番歇息。两年下来，朱国干刚刚还完那笔首期交纳的借款。

在城里跑车，任何事故和违章都意味着经济上的付出，的士佬们大多爱车如命。1995年7月的一个黑夜，三名歹徒在横岗镇郊野持枪抢劫朱国干的“捷达”。他不顾生死，奋起与歹徒搏斗，头部中弹仍然大声呼喊，引起了过路公安巡逻车的注意，歹徒落荒而逃。朱国干一对仨，居然保住了汽车。事情过去一年多，媒体不知道。后来我去采访朱国干，是缘于他载客口碑好，多次捡到乘客的现金、贵重物品完璧归赵。1996年10月，在石厦新村他租住的那间合住屋里，朱国干拿出医院留给他的X光片，给我看他额头上被子弹打穿的洞，我才觉得这个来自湖南的乡下人确实了得。在“的士村”拍了两天照片，这位的士佬觉得这样费劲地拍照，是传媒想好好表扬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表扬不表扬都无所谓，其实我心里最想的，是上面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个户口？”当时我没法回答，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笑了，说：“在深圳开车，没户口心里不塌实。这事本来不该问你的，但是我又更不好意思去问别人。不过，开车嘛，就是替人服务，服务当然要真心诚意才好。”1996年，深圳的士已快超过1万辆，朱国干和他老婆已经两个春节没回湖南老家。他的“捷达”凭着真诚的服务，在长河般的车流中赢得了越来越好的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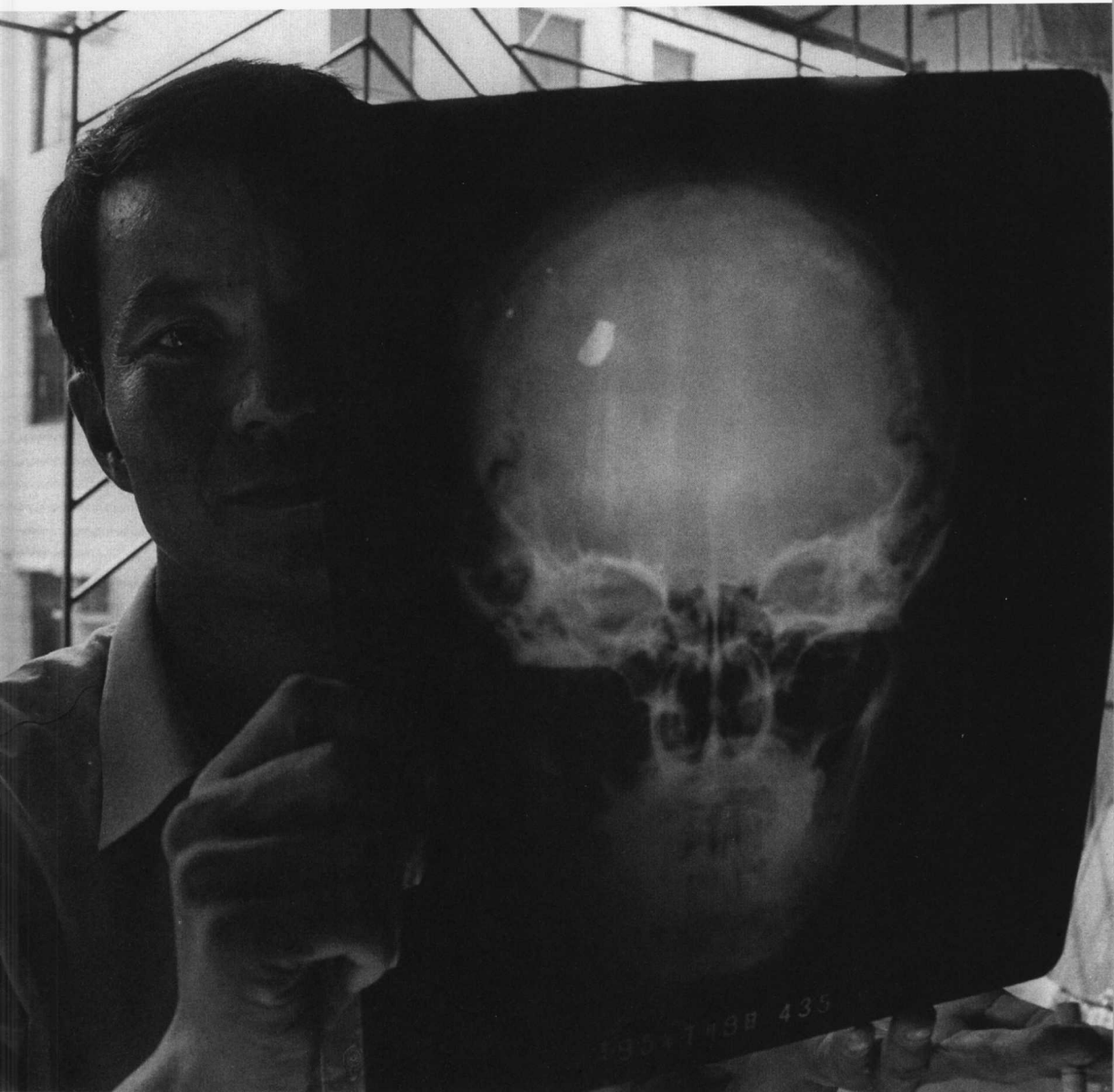
1996年，朱国干被评为深圳市十佳的士司机。他驾驶的“捷达”被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

1997年，朱国干的户口解决了。

2000年，朱国干当上了全国劳模。

2003年，安达公司新上了一批红旗轿车。我问朱国干：“你还开捷达？”他说：“我没开车了，调到了办公室，做管理。”





朱国干展示留有弹孔的X光片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1995年7月9日晚，朱国干为保护汽车，被歹徒开枪击中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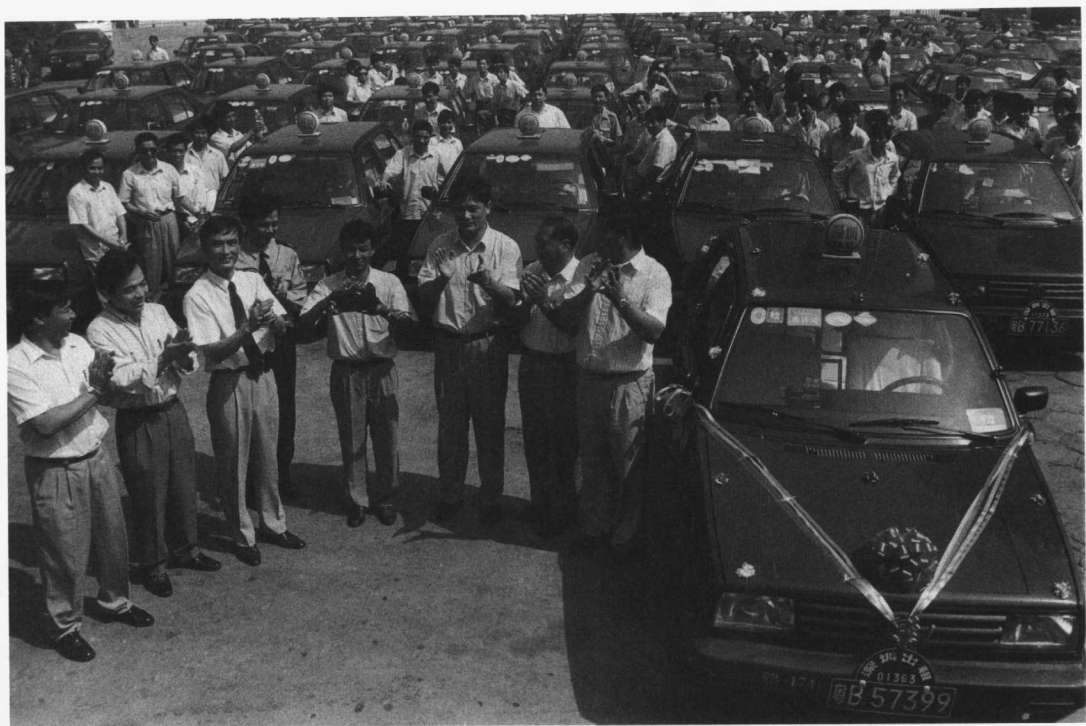
合租者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朱国千夫妇和另外两家出租车司机合租一套68平方米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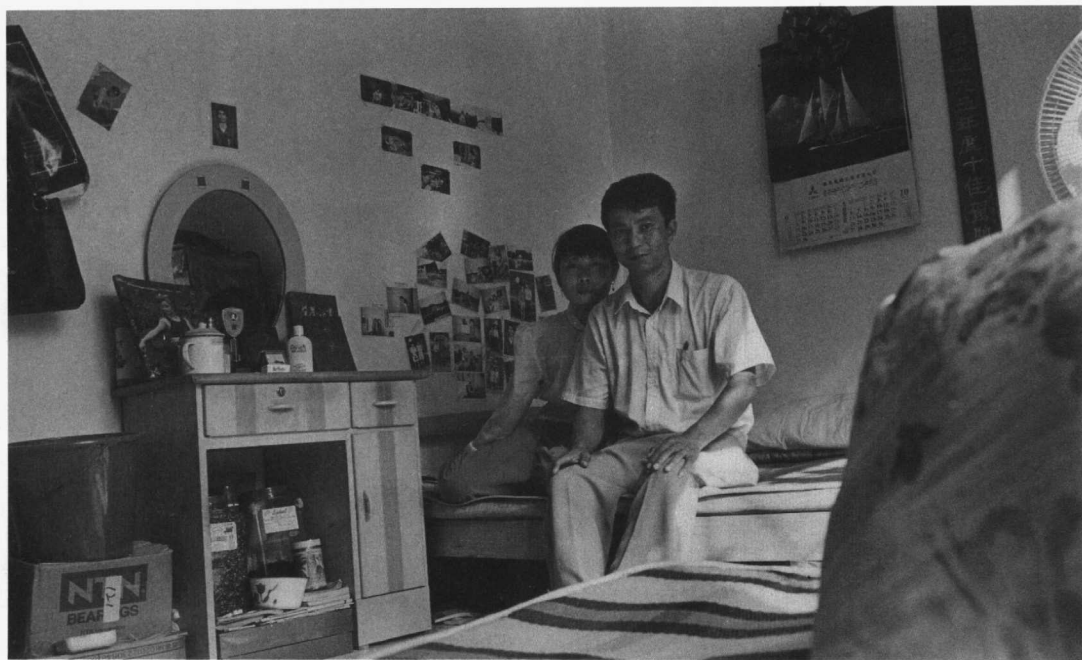
三家人的厨房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一间厨房三套炉具，做饭碰在一起，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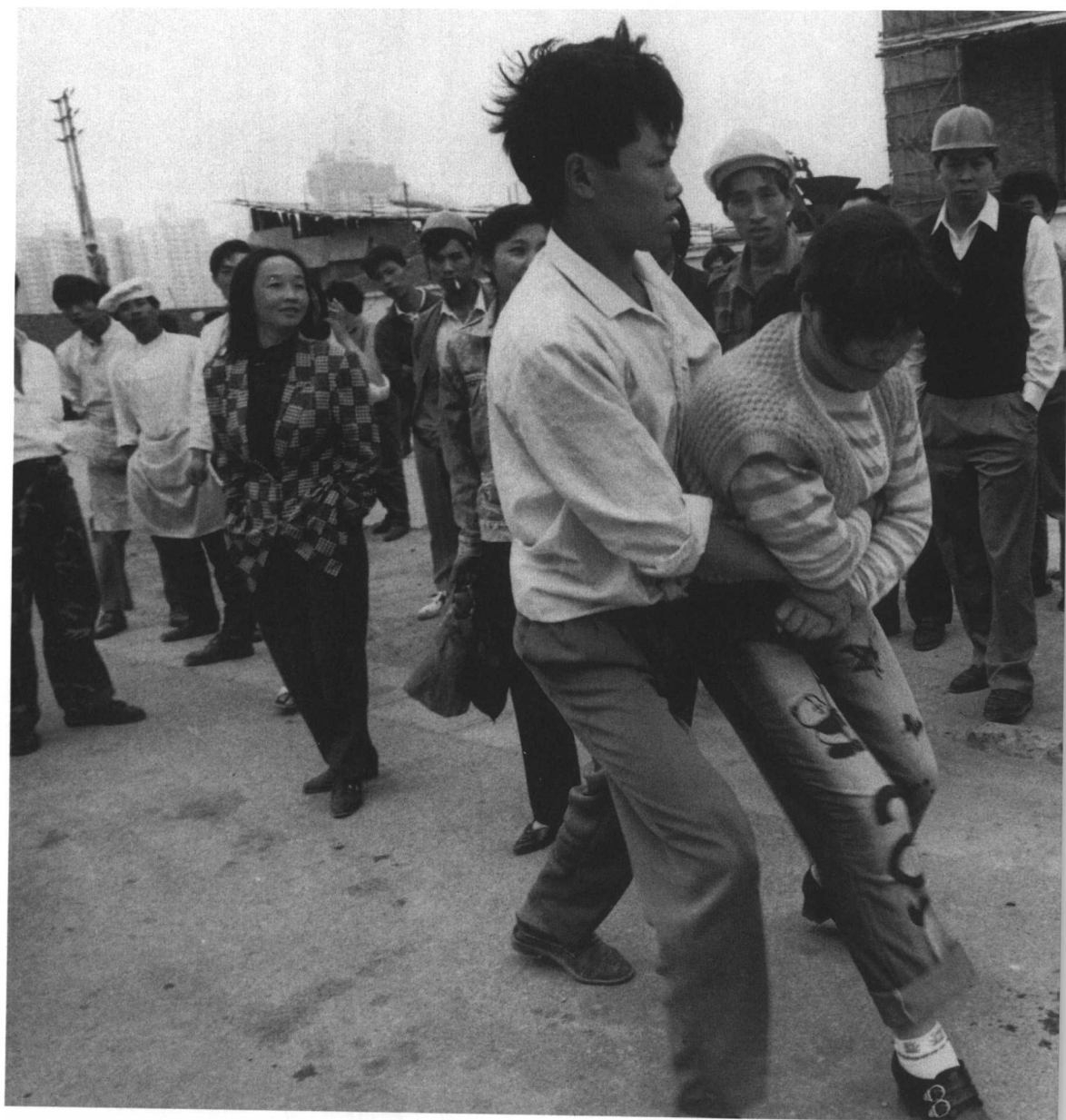
颁奖现场 深圳 1996

朱国干驾驶的粤B57399号出租车，1996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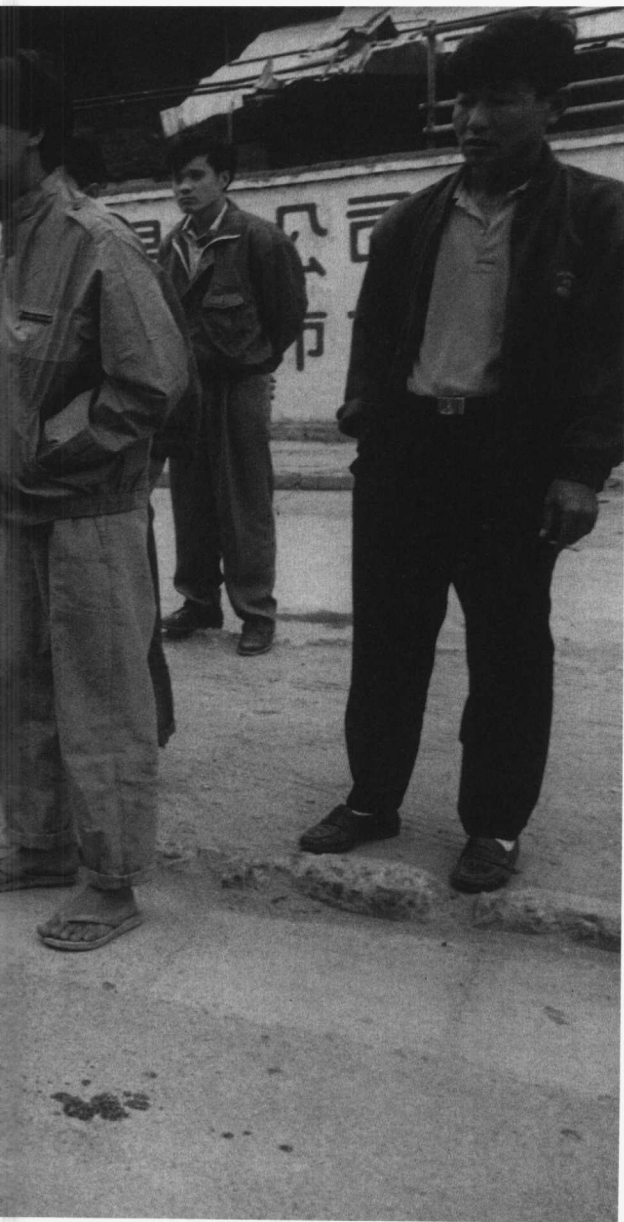
我们的家 深圳石厦新村 1996

屋里有两张床，近处是朱国干哥哥的床垫。哥哥跑夜班，住在一起并不矛盾。朱国干夫妇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个深圳户口，好让孩子来深圳上学。这个愿望在一年之后实现了。



纠缠 深圳岗厦村 1995

在一个工地边上，一位男子不顾众人围观，死死抱住一女子不放。



3. 伤心家事

行走在深圳，会碰上各式各样的外乡人，会看到、听到他们的故事。有些故事，会触动你，让你禁不住想要刨根问底，弄清楚来龙去脉；但是，有些故事，却让你不忍心去问，因为那故事太伤心、太惨，哪怕你只看见了一些片段。

有一卷底片就属于这种片段，拍下那一串撕裂人心的镜头，是因为职业惯性，但心里并不好受。画面乍一看去会被认为是街头经常发生的治安故事，但我知道，这是一桩外乡人家里的故事，是伤心家事。在深圳，数以百万计的外乡人，为自己，也为深圳这座城市，付出了太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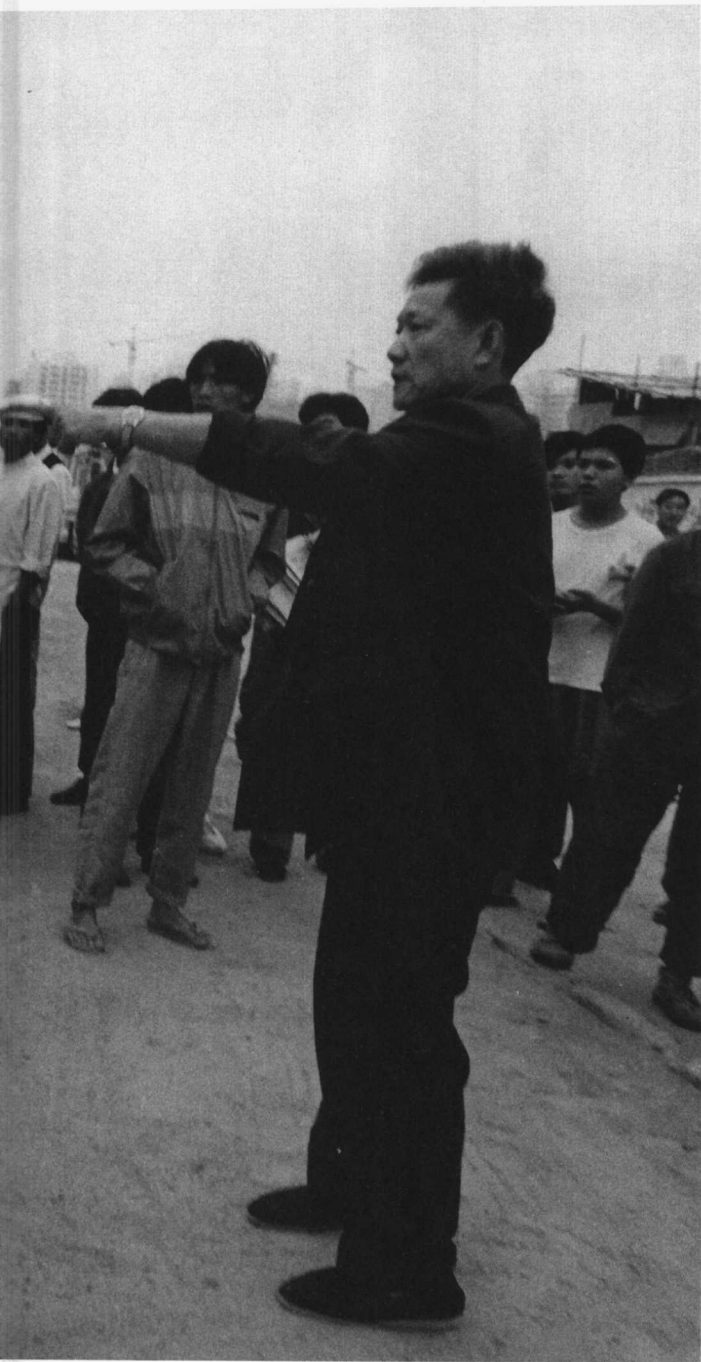
那是1995年11月初的一天，当时岗厦村还处于深圳市区的边缘，有很多建筑工地。在一个工地边上，一位男子不顾众人围观，死死抱住一女子不放，而女子泪流满面。旁边一位中年妇女给我讲，他们是两口子，在四川老家有一个3岁的小孩，因娘家看管不慎不幸触电死亡。这位丈夫就把怨气发泄在老婆身上，曾经狠狠地打她。我碰上的场面，正是孩子的母亲买好机票要赶回四川，丈夫死活不让她走的当口。

“你放不放？不放我就叫保安把你铐起来！”一位穿西服的长者大声呵斥那男子，这长者是那男子单位的头儿。



“放不放？” 深圳岗厦村 1995

一位穿西服的长者大声呵斥那男子。



随后丈夫被保安扭住，妻子得以脱身，急急忙忙上了一辆人货车，车上装着她的行李。

被铐住的男子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他妻子回来。妻子没有回头。朝着飞驰远去的车影，丈夫痛不欲生。

整个过程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苦楚，一切都刻在这对夫妻的脸上。要想获得一张具有视觉张力的“好照片”，只要走上前去就有可能得到，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是远远地、偷偷地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幕。

走在大街上，太阳鲜亮。大街上涌动着来自异乡的人潮。他们为自己的出路而来，更多的人是为自己后代的出路而来。这对夫妻出来了，却没办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在家里托亲戚照管。死了，是个意外。但那丈夫的呼号却久久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出来，究竟是为了啥啊！”

有一些农民是带着孩子出来的，但到了一定年龄的孩子需要上学。

他们去哪里上学？



“分开他们！” 深圳岗厦村 1995

众人扯开扭在一起的小夫妻。



“快跑！” 深圳岗厦村 1995

丈夫被保安扭住，妻子得以脱身。



钻入货车 深圳岗厦村 1995

妻子急急忙忙上了一辆人货车，没有回头。



“回来——” 深圳岗厦村 1995

被铐住的男子嚎啕大哭，声嘶力竭
喊他妻子回来。



心都碎了 深圳岗厦村 1995
朝着飞驰远去的车影，丈夫痛不欲生。





第五章 同一片蓝天



上课了

武汉蔡家田 1995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冲向课桌。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子女要想在城市学校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民办学校开始出现，但是，仍然有大量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进不了学校。



教室外的孩子 武汉蔡家田 1995

8岁的闵觅站在教室门口，她还没上一年级。闵觅的哥哥上学了，闵觅也早过了学前年龄，但是家里一时拿不出两个孩子的学费，闵觅只好在教室外面玩。她说家里答应明年让她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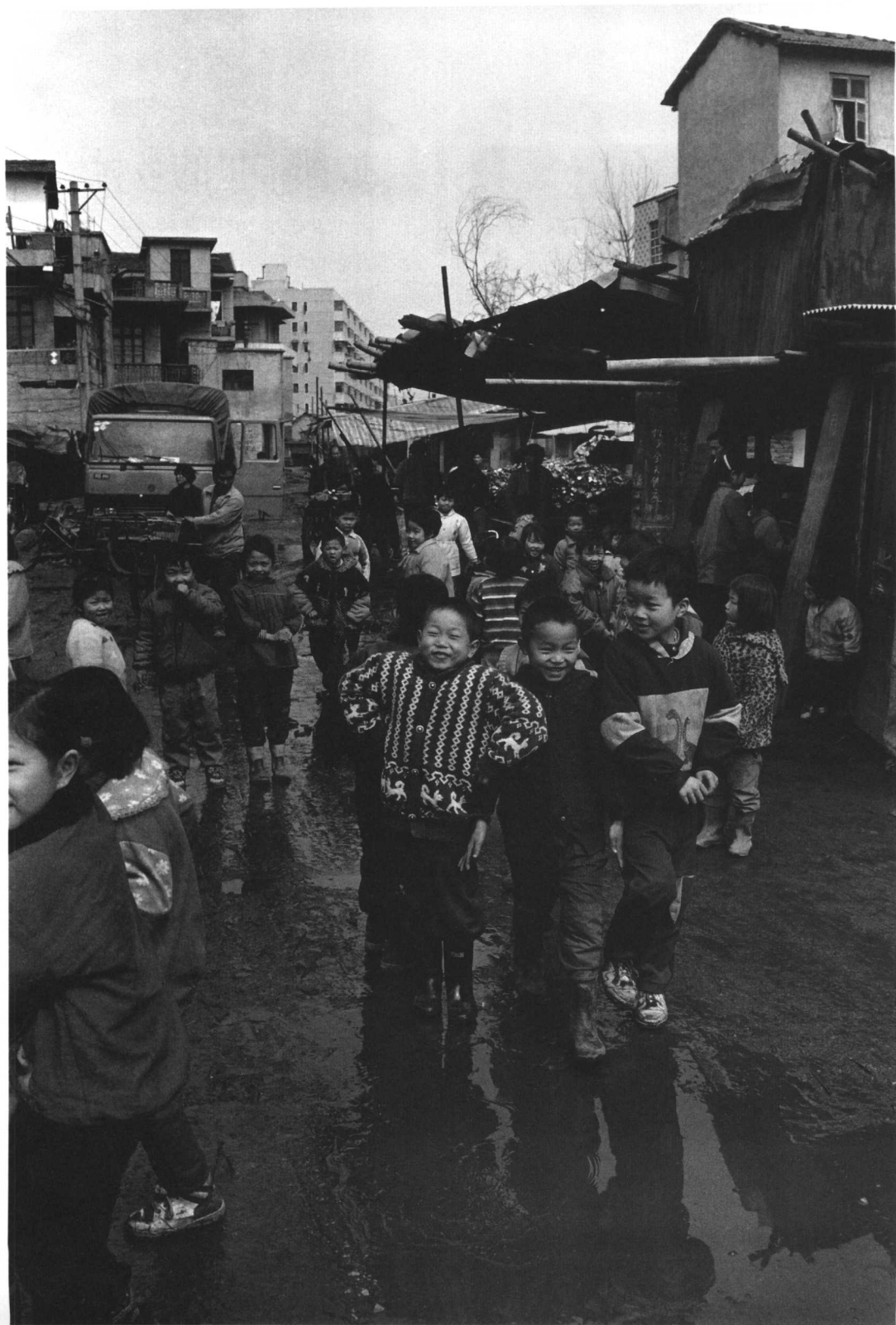
1. 都市里的乡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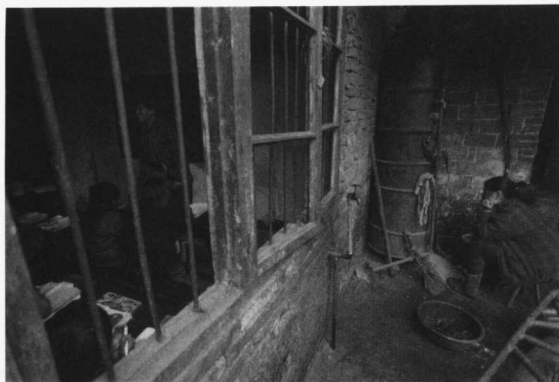
1995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名叫闵觅的女孩，孤零零地站在蔡家田一间教室门外向里张望。8岁的闵觅，去年就该上1年级了，但是家里钱不够，只能让她哥哥先上学。她没地方去，每天便来这里看她哥哥念书。不过她说，下学期她就能上学了。

闵觅的父母是江西省南昌县麻丘乡人。麻丘乡全乡总人口有32000多，有10000多人在外务工经商，其中8000多人集中在武汉三镇。和一般农民工不同的是，麻丘人通常是携家带口进城，长期租住民房，跑生意做买卖。在武汉市，麻丘人大多居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上牯牛洲和蔡家田，这一带当时是城市的边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牯牛洲和蔡家田就住进了跑买卖的麻丘乡民，同时他们的孩子也来到了这里。白天，大人出门之后，孩子们便在街面和小巷里游荡，一年比一年多。这些孩子的父母收入微薄，户口也不在城市，他们读不上书。

在这些孩子的老家麻丘乡，乡中心小学广安分校的校长孙大蝉心里很着急：乡校学生越来越少，少到了一年级居然招不够新生。

孩子跟家长离乡了，上学怎么办？孙大蝉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清楚，乡下孩子要想在城里上学，难如上青天。如果再不想办法，这些孩子将成为新一代文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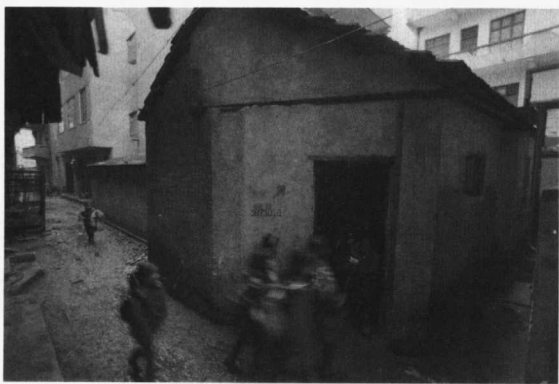


蔡家田的一年级教室 武汉 1995



奔波 武汉 1995

教师来回奔忙于上牯牛洲和蔡家田之间,风雨无阻。



校长的寝室 武汉 1995

上牯牛洲的一间教室。校长孙大蝉住在这间教室的偏屋里。

孙大蝉想：能不能跟踪到武汉办班？

恰逢此时，19岁就闯武汉的麻丘乡民孙春旺也在跟乡里建议：把学校办到武汉来。1992年是孙春旺在武汉的第11个年头，已经当老板了，但是财大气不粗。他只念过小学，知道没文化是个什么滋味。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没文化。

跟踪办学的设想得到了麻丘乡民的支持，也得到南昌市教委的支持。

1993年暑假，孙大蝉带领3位乡村教师来到武汉，奔走于江汉和江岸两区的有关部门，进出于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的同乡门槛。1993年9月，麻丘乡中心小学驻武汉教学班开学了，39个麻丘乡民的孩子走进了简陋的一年级教室。到1995年，这所都市里的乡村小学已经有了3个年级8个教学班，296名学生，分散在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的8间民房里上课。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相距3公里，9位来自麻丘乡中心小学的教师（包括孙校长）穿梭于两地之间，或步行或骑单车，风雨无阻。

办学需要钱，但又不能太多增加学生家庭的负担。麻丘乡的农民子女在这所学校上学，每个学生每学期全部费用为250元，主要用于学杂费和教室租金，以及少量的教师生活补贴。教师工资由麻丘乡中心小学发放，试卷、考核也由麻丘乡学校统一安排。每学期，南昌市的

(左页图)民工聚居区的孩子们 武汉上牯牛洲 1995



敲钟人 武汉 1995

一截废钢管代替了上课铃，校长孙大蝉已经敲了两年的钢管。

(154页图) 棚屋学校 云南福贡县 1994

马吉乡不腊村布施小学在怒江边上，全校21名学生，一间棚屋，一位老师。甚至比这条件更差的学校叫“茅屋学校”，在怒江全州共有188所。据了解，改造一所茅屋学校只需要2万元。



教委两次派人来武汉核查，以保证教学质量。但对于添置教具和改善教学环境，麻丘乡则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孙大蝉说，无论怎样艰难，他也要把这种跟踪办学办到5年级。5年级以后，学生的生活可以自理，应该可以回麻丘上初中了。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麻丘乡人闯荡武汉已经十几二十年，在武汉生儿育女尝试立足扎根，但他们非常清楚，至少在他们这一代，是很难真正进入城市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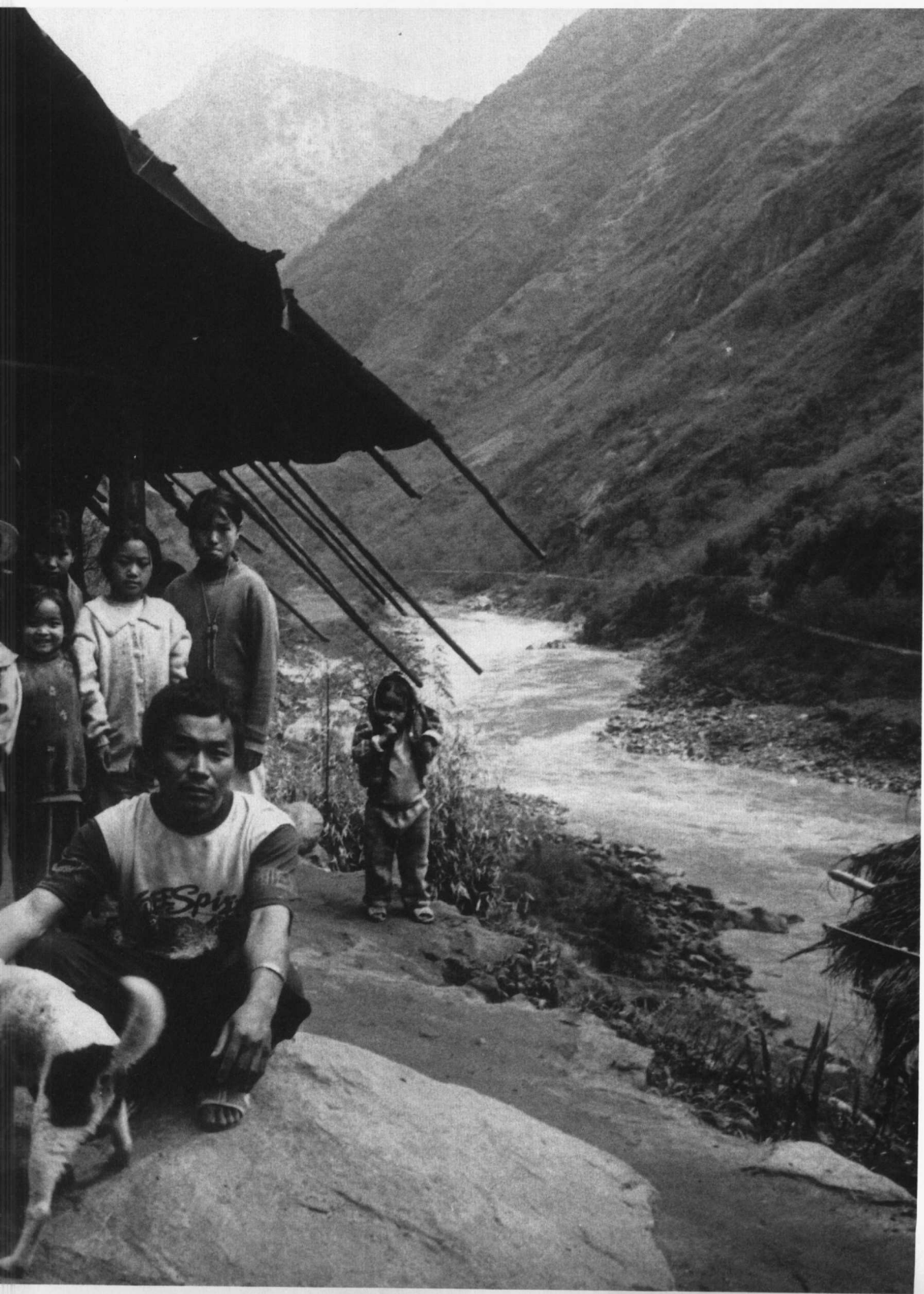
闵觅和其他跟随父母到武汉谋生的孩子一样，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今后能否回到乡下，很难预料。但是起码有指望读上书了，尽管8岁以后才上一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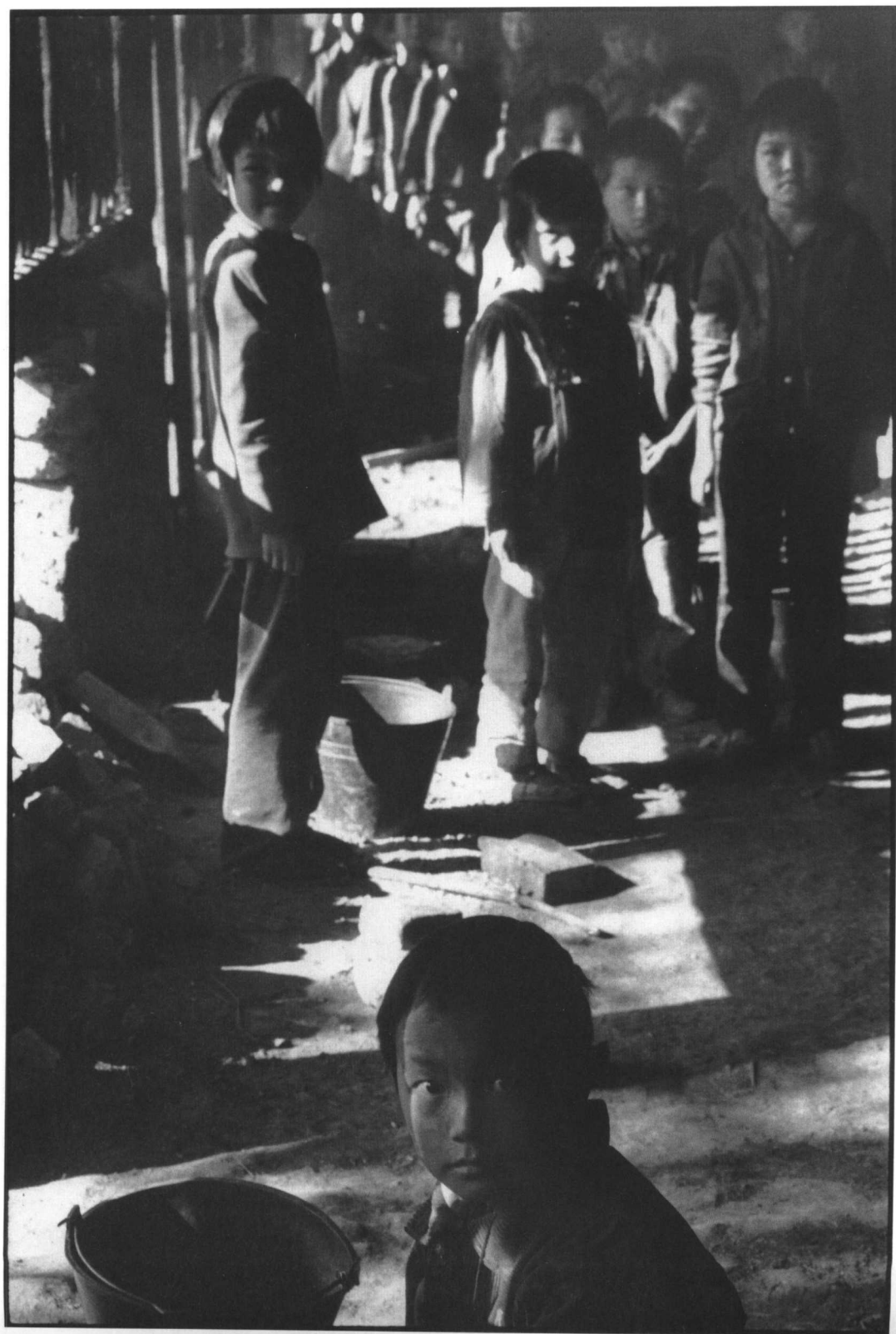


打工者及他的后代 武汉 1995

对于23岁的闵中强来说，1995年是一个转折——他的妻子李万凤在他们安顿在武汉的新家产下了一个男婴，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家长”这个字眼的分量。闵中强17岁时因为英语不好没考上高中，18岁便闯荡武汉三镇。







2. 同一片蓝天下

据统计，1994年，中国有近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文盲总量仅次于印度。最近10年，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每年至少有100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教室破窗后的脸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左页图) “食堂”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学校有一角廊房，里面全是土砖垒的小火塘，学生自己带米在这里做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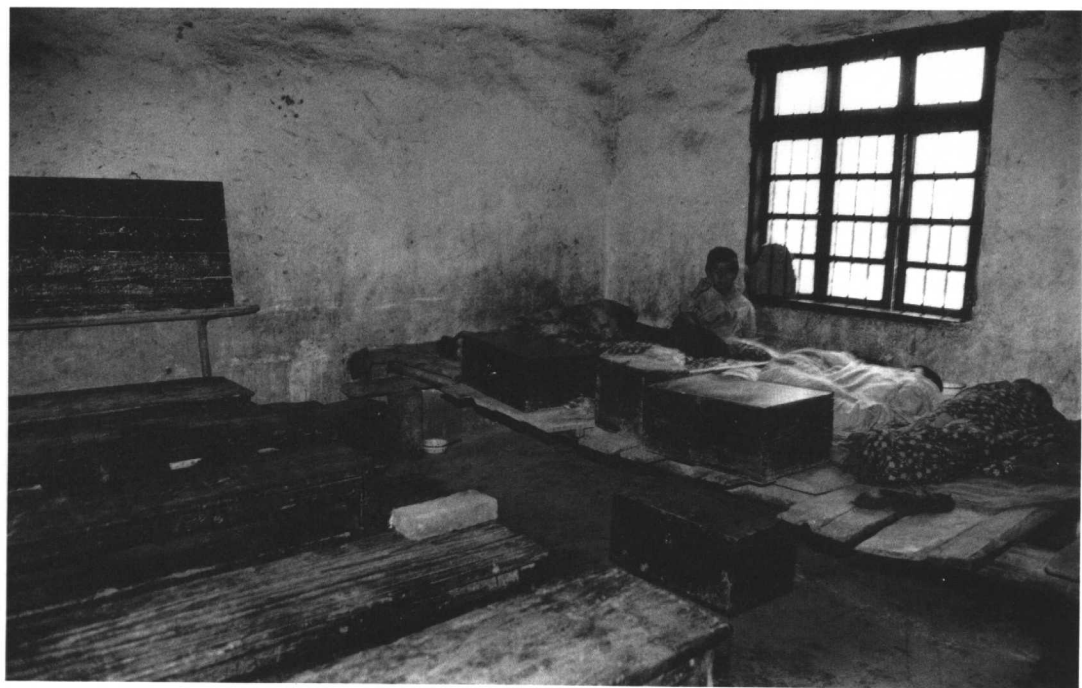
当一些时髦的贵族学校敞开大门，以数万乃至十多万巨额储蓄金接收一名学生的时候，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却因为缴不起每学期30元的书本费而被拒之于知识殿堂的大门外。

当除夕之夜，沿海发达城市的一名孩子怀揣着数千元压岁钱轻轻飘入到剑桥、哈佛留学的灿烂梦境中的时候，山区的一名同龄孩子却在清点着明天要背到集市上去卖的一筐山货，那筐里装着他的希望和梦想。



少年代发光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力丫小学四年级22班学生代发光站在校门口，上衣口袋露出了他的铅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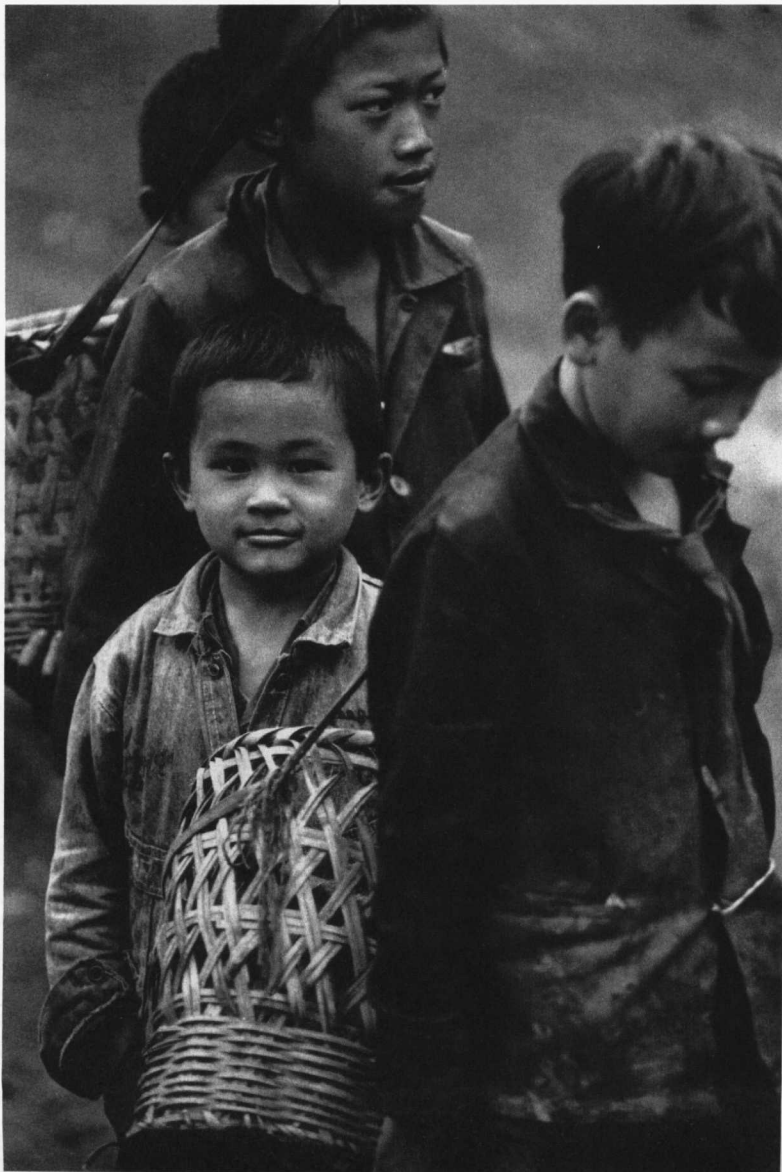
睡在教室里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男生睡在教室里，几块木板搭成连铺。力丫山乡没有电，课桌上的砖头是用来放蜡烛的。

背米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周六下午，孩子们翻山越岭返回家中。第二天下午，背上下周要吃的米，再返回学校。



……这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发生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551个贫困县，有8500万人年平均收入不到268元人民币，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缺少的不是灵巧和聪明，而是每年60元人民币的书本费和一间可以安放课桌的普通教室。

我上班的单位旁边有一所育才学校。在深圳，育才学校算

是条件优裕的学校，省重点。1994年4月，学校几位青年教师发起“1+1助学行动”募捐倡议，很快得到学校和社区的支持。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蛇口这个面积仅为10.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5万的小小社区，便募集到人民币30余万元、港币3万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捐款出自这个社区里的外资、合资企业和港、台商人。

力丫小学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艾尼山乡一所最边缘、最贫困的村公所完小。力丫村公所下辖39个自然村，方圆20多公里内的适龄儿童都集中在力丫小学就读，最远的学生离学校13公里。力丫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



渴望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代发光们已经明白，读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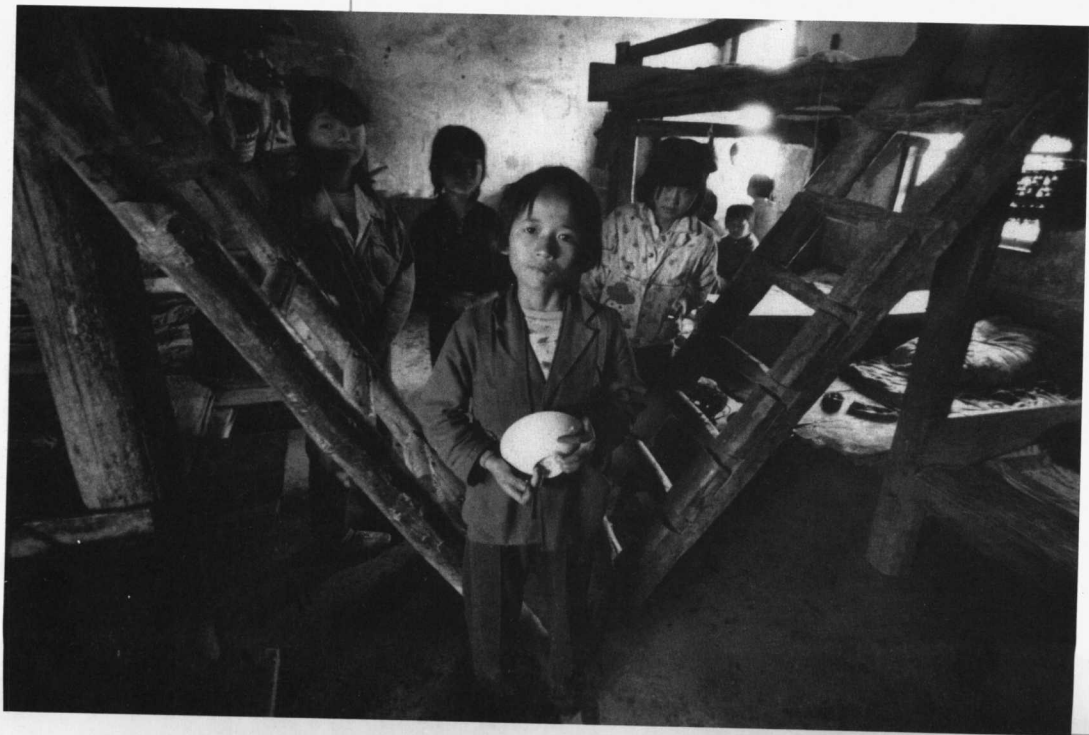
经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牵线,育才学校和力丫小学结成了“姻缘”。募捐组委会将募得的30余万元人民币和33750元港币全部捐赠给力丫小学,帮助这所山乡小学改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并资助双柏县境内的失学儿童。1994年5月26日,组委会将力丫小学的校长和两名学生代表接到深圳,参加育才师生为希望工程义演的募捐活动。在深圳的几天里,力丫山乡的这两个孩子觉得“就像在做梦”。他们做梦也想像不到,在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时代、同样年龄的孩子之间,生活会有如此悬殊。临到要离开时,那位叫小菊的女同学大哭着扑在育才老校长乔树德的怀里:“我不回去,我不想回去——”

小菊回去了,拼命读书,1998年读完了初中。1996年我再次去艾尼山乡时看见她,她说,如果没有深圳这一趟,她连小学都不可能读完。但是她最终没能考上高中。1999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的一位热心大姐资助她到昆明读职业培训班,以后在昆明的一家餐馆做了服务员。

女生宿舍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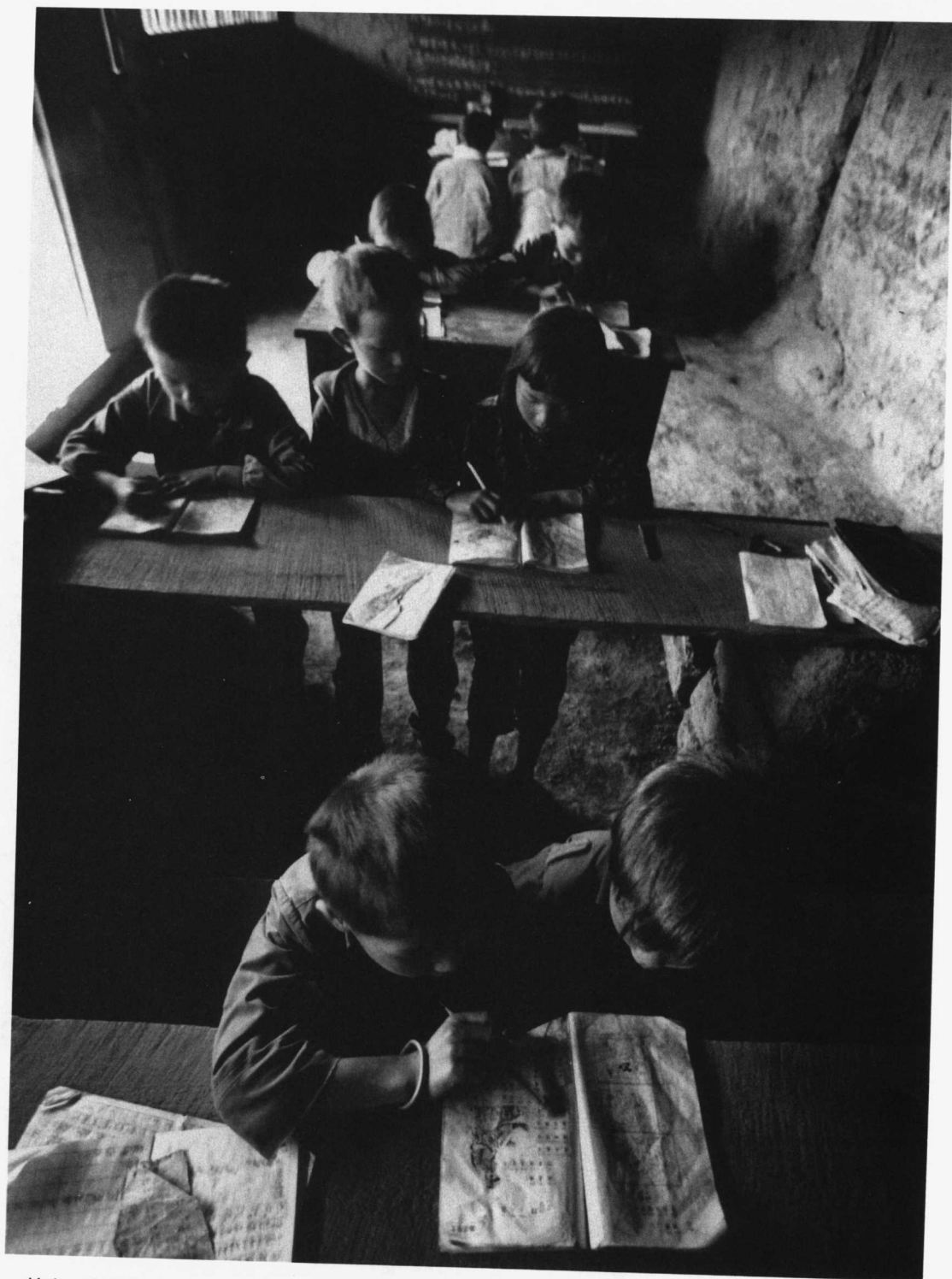
二年级24班黄席琼和她的同学刚刚吃过饭。





水池 云南双柏县力丫小学 1994

艾尼山乡全年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水，师生日常用水要到3公里以外的山沟去挑。学校这个2米宽、1米半深的蓄水池也经常只有贴底的一点水。



挤在一间教室里 双柏县艾尼乡 1994

双柏县还有很多条件非常差的学校需要捐款。这是艾尼乡的一所小学。一间教室里两块黑板，不同年级的学生共用这间教室同时上两门课。

3. 振兴小学

衣食无忧、又有深圳常住户口的蛇口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次次把目光投向全国偏远地区，用民间募捐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建起了十多所希望小学，善莫大焉。然而，就在蛇口，却有不少学龄儿童徘徊在校门之外，他们大多是流动人口的子女。

紧挨着育才学校有一个消防队。消防队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个篮球架，路过那里，可以看见消防队员们在篮球架下投篮，或者训练。但是谁也没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小院的消防队后门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振兴小学。”

蛇口的“鬼佬”公司最早注意到了这所向穷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学校。

2000年4月12日，柏灵顿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美方首席代表卡尔·夏夫和中方首席代表刘光国等一行四人来到振兴小学，向振兴小学捐赠了6台电脑。

原来，刘光国有晨练的习惯，每天去体育场，都要路过消防中队。他看见了进出于小院的孩子们，并知道了这是一所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民办学校。学校很小，租赁了消防中队办公楼的二、四、五楼用做教室，操场就是那个小院子。教职员总共才14个人，学校有7个班级，210名学生在这里就读。刘光国被感动了。



标语 江西宁都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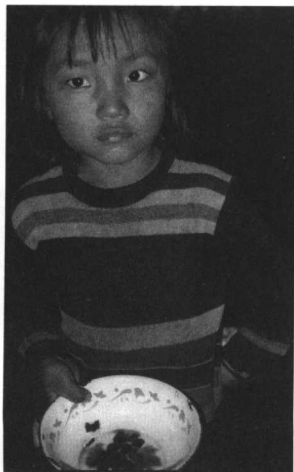
卖纸巾 深圳 1994



“任何一个国家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希望，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卡尔·夏夫在捐赠仪式上讲话没有讲稿，但很动感情，“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不会有今天。”

比起其他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简陋的振兴小学已经很幸运。在深圳，有过很多棚屋学校，因为不具备办学资质和校舍安全，大多中途夭折。振兴小学的创办者说，她们倾家办学，纯属偶然。

振兴小学的两任女校长，一位姓谷，一位姓潘。老师们不称她们校长，而叫她们潘大姐谷大姐。潘大姐早年毕业于北师大艺术教育系，丈夫是军人，1982年随丈夫调来深圳，驻莲塘。1998年，潘大姐在部队驻地办过一所面向流动人口子女的“八一”小学。因为当时部队有很多家属在内地当过老师，办学校的初衷是想解决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没想到竟有几百个孩子前来报名。“八一”小学红火了一阵子，但因为办学场所不符合有关规定，解散了。可是假期一到，潘大姐家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电话来自那些被分散到附近公立学校读书的原“八一”小学孩子的家长们。他们告诉潘大姐，因为缴不起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孩子再度失学。潘大姐再一次下了决心：这学校，还得办下去！



“给一点儿吧……”

珠海 1996



在饭店帮工 番禺 1991



潘大姐几乎跑遍了深圳，从莲塘到罗湖，从罗湖到南山，寻找合适的办学场所，最后找到了蛇口。2000年初，潘大姐动员几位朋友，凑了几十万元，租房子、买桌椅、聘老师，在蛇口撑起了振兴小学。可是一年下来，振兴小学亏得一塌糊涂。当初的几位合伙投资人宣布退出，振兴小学顿时陷入财务危机。正在这时，谷大姐参与进来了。出于对老朋友的支持，谷大姐倾囊而出。刚开始只是作为一个投资者，偶尔到学校看看，后来见潘校长终日忙得团团转，她也跟着豁出去了。谷大姐早年毕业于华西医大，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就把对外联络、校医、财务、政教处主任一肩挑了起来，还兼上思想品德和生理卫生课。

谷校长住在福田，潘校长家在莲塘，赶公交车，每天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她们每天赶早班车来，又差不多赶最后一班车回家。

“看见那些该读书的孩子帮父母守水果摊，我心里就疼，哪个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多读几天书啊！”潘校长说她这辈子最想做成的就是这一件事，“希望能让每一个公立学校不能接收的孩子都在我们这儿读书。不管他们有钱没钱，成绩好坏或是残疾智障，受没受过教育。”

在振兴小学上学的孩子，家境一般都很差，根本就缴不起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建校费。有的家庭连生计都成问题，家长在报名的时候，说着说着直掉眼泪。一年级二班有个小孩，期末考试前几天突然不来了，原来他家的铺子属违章建筑被拆除，一家人断了生计。还有一个学生，父母失业，仅靠哥哥摆地摊维持生活，学校留他读了两个学期，没收他一分钱。最后他哥哥的地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六一”前夕，全家离开了深圳。振兴小学教务处梁主任说：“离开学校那天，这学生哭啊，哭得很伤心。”



“不买花，就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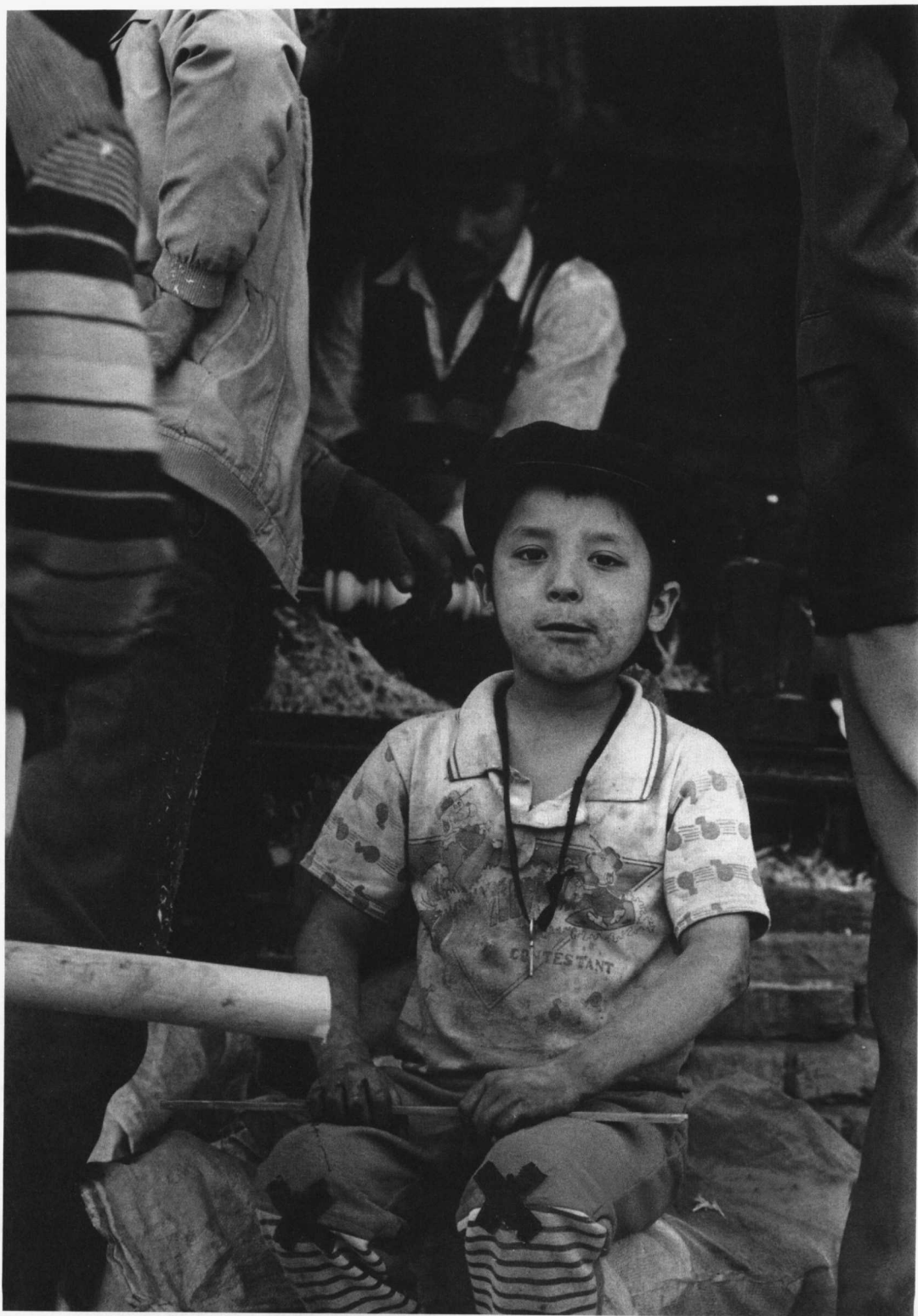
深圳 1996



棚户区失学的孩子 深圳 1997



布店小工 喀什 1990



车木棒的下手 喀什 1990

第六章 人间『喜剧』



股票发售现场 深圳 1992

全市 300 个股票发售点，每个发售点都是一片人潮。





升了？还是跌了？ 深圳 1992



1. 深圳股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久违了的股票开始制造新一代富翁。老百姓对股票的认识从陌生到疯狂只花了短短两三年时间。“原始股”让人一夜暴富的迷幻，引领了更多的人去做一个同样的梦：买股票，发大财！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股。



讲解 深圳 1988

早期的股市，上市股票屈指可数，行情都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股民们围着柜台瞪大眼睛看牌，听业务员讲解。



争先恐后 深圳 1988

20世纪80年代末，证券交易场所很少，早上一开门，人就往里冲。

(178页图) **雨来了** 深圳 1992

暴雨来了，屁股下的席子自然就顶到了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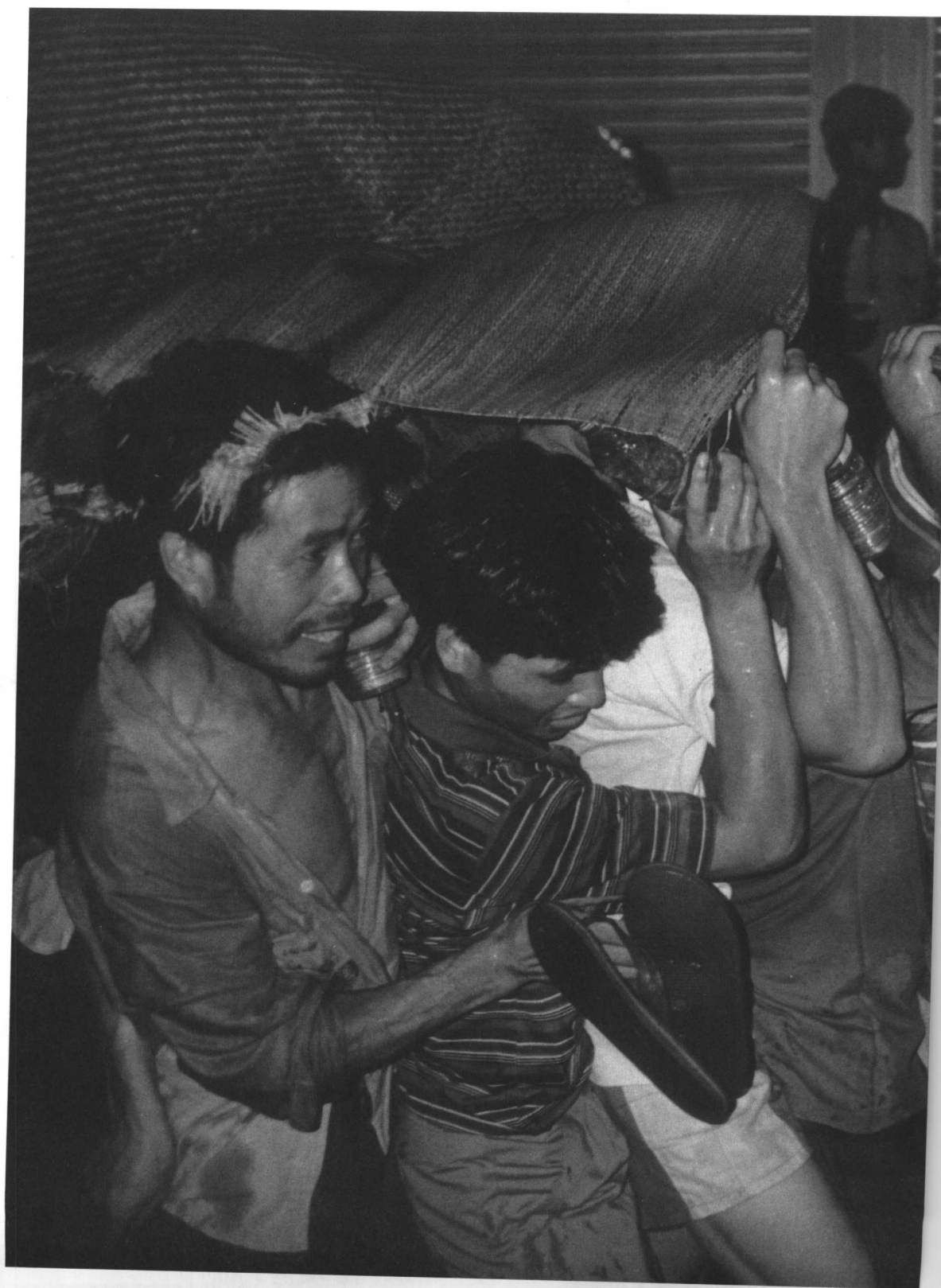


在这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暗中开始了身份证搜集大战。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大塞车，占线的都是内地长途。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多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开始有人占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寻梦者急奔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就买不到了。来往于两地间的大小巴士，票价比平时猛涨几倍，也丝毫未能阻止蜂拥而至的人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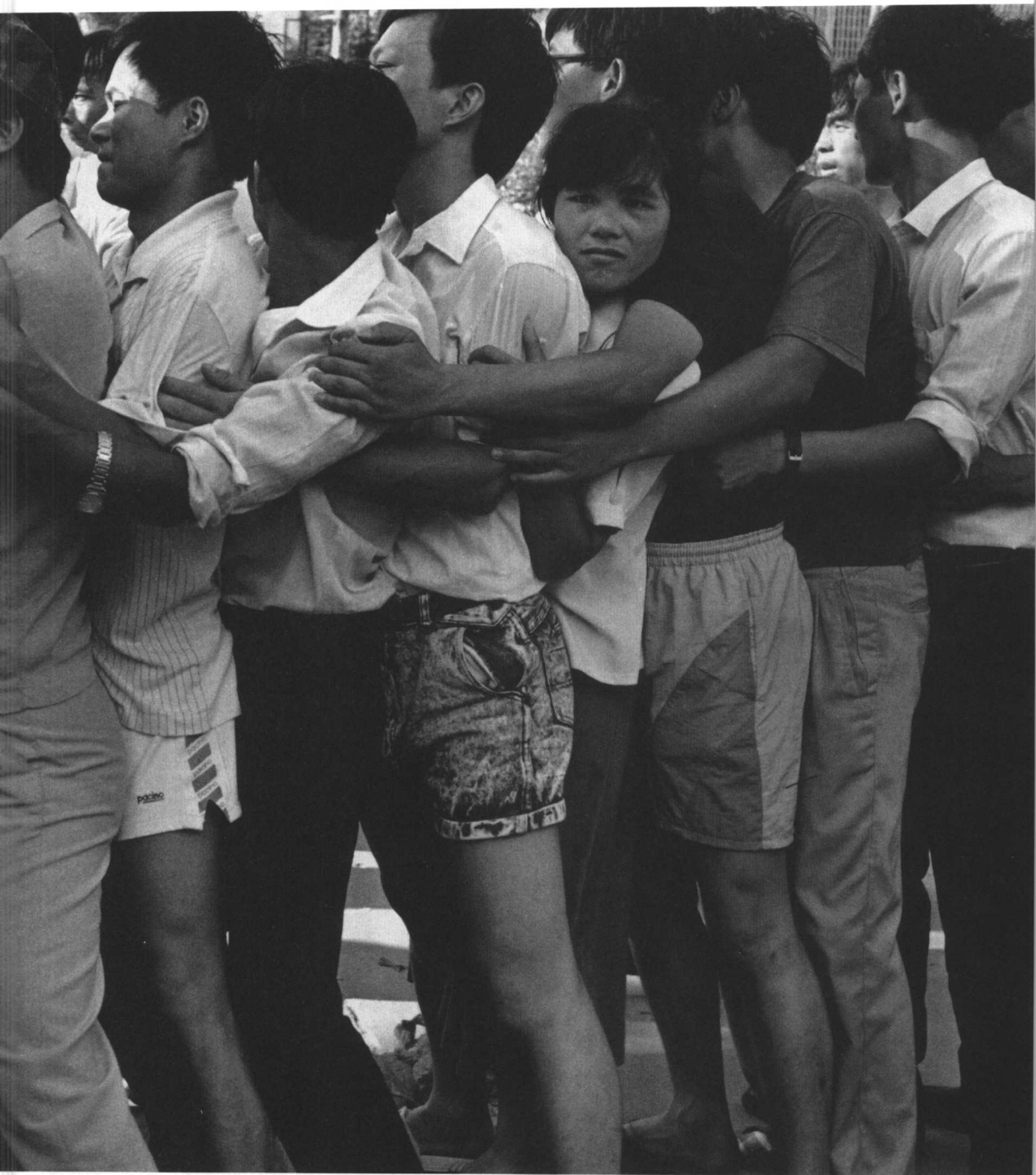


占住再说 深圳 1992

1992年8月7日，销售新股认购抽签表的公告一发布，深圳的各个发售点就出现了凳子椅子的长龙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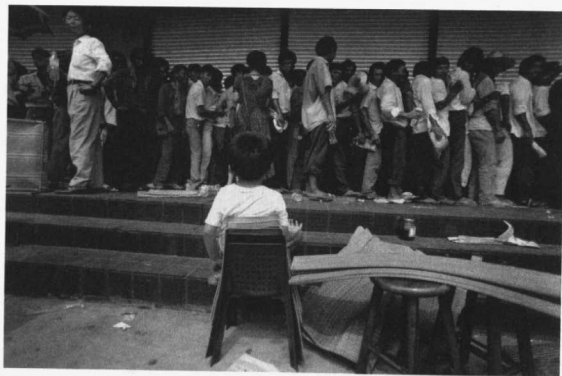






抱紧了，别松手 深圳 1992

为了不被挤出队列，男男女女前胸后背紧贴着、死接着。



全民出动 深圳 1992

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吃住都在队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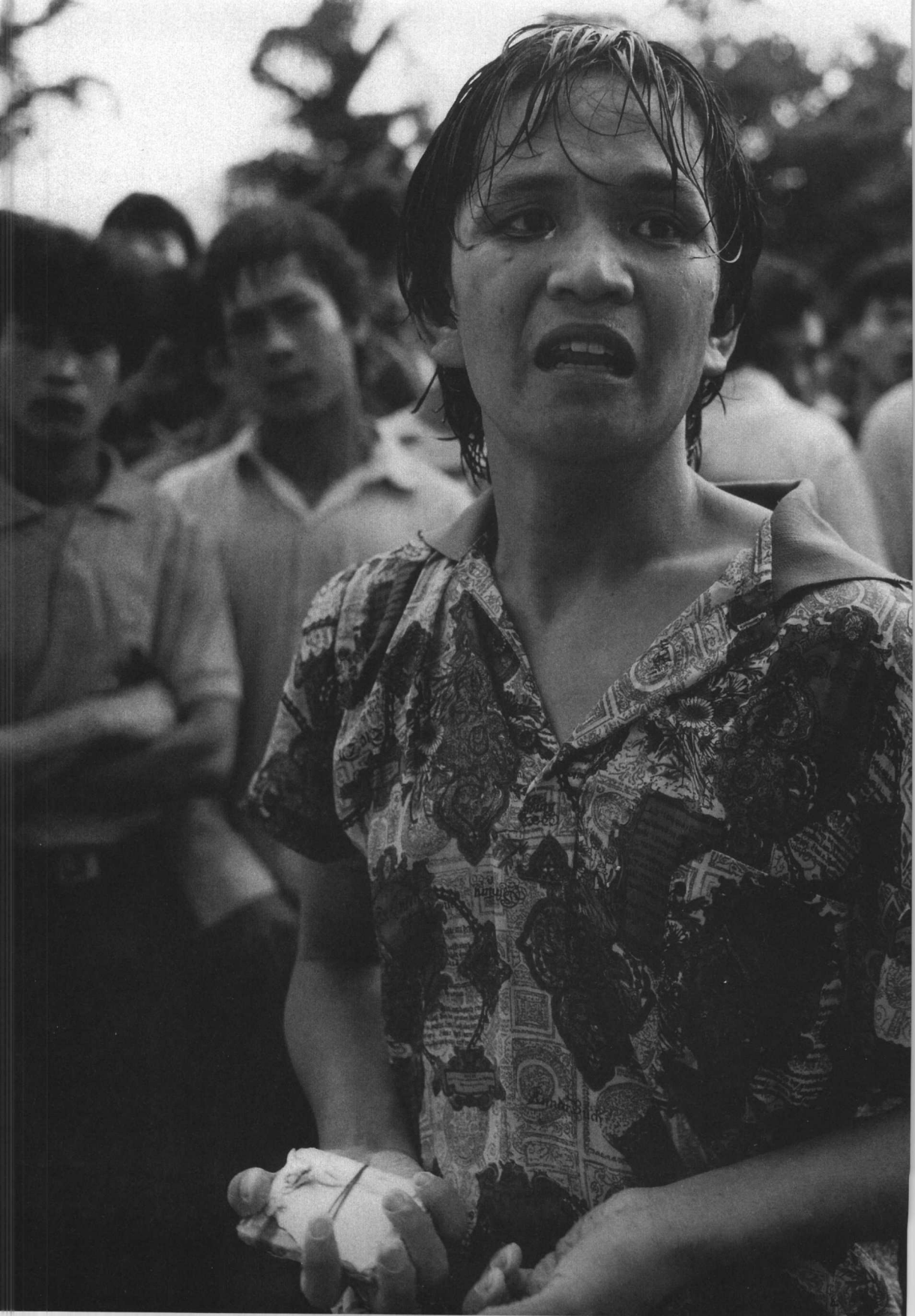
“你，别挤！” 深圳 1992

公安警力不够，武警协助维持秩序。

公告预告8月10日上午开始发售抽签表。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的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虽然蚊虫肆虐，但熬夜排队的人们却斗志昂扬。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潮。人们手里都攥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都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经过整日曝晒，人潮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傍晚雷雨淋头，湿气蒸腾，阵地依然固若金汤。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潮超过了100万。

深圳警方倾巢出动，在人山人海维持秩序。因警力不足，边检部队、武警部队出动增援，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少数执法人员和工商、证券从业人员利欲熏心，在一些发售点公然徇私舞弊，刚开始发售不到半小时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苦日夜排队的民众美梦成空，导致了8月10日傍晚，一些人在深南大道游行请愿要求见市长，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查获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新一轮熊市降临了。





很少有外来农民工进入早期的股市，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股票。但在那次疯狂抢购的人潮中，却处处都能看到外来农民工的身影。他们有的是被老板用汽车直接从工地上拉来排队的，有的是受雇佣为城里人排队的，有的是帮着亲戚朋友排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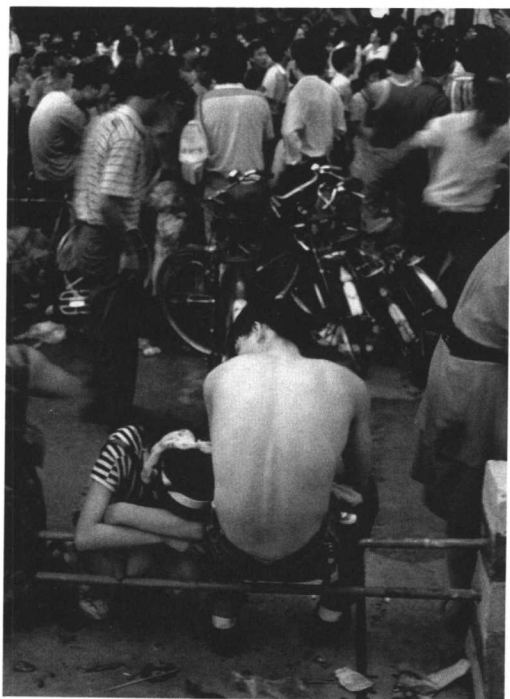
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四海宿舍，楼下有一对夫妻，年纪都在三十开外，膝下有一子一女。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那妻子上班，原因大概是又大了肚子，在家做全职主妇，既照顾着两个现成的孩子，也照顾着一大群鸡，因为他们住一楼。丈夫上班之后，妻子就拿出直径达一米的大脚盆洗衣服。一洗一大盆，洗完之后，房前几棵小树之间便挂满了万国旗。然后，疲惫地捶打着自己的腰，再在脚盆里面放一块菜板，开始剁鸡食。

1992年股灾前的几天，他家来了几十个民工老乡。起初，妻子用洗衣服的大脚盆装饭，用一只同样大小的新脚盆装菜，请民工在屋外面吃饭，树阴下蹲满了人。据妻子讲，她家准备了500个身份证来认购新股。临近8月10日，气氛越来越紧张，民工们再也不回四海吃饭了，而是由丈夫开一辆无牌的人货车，把妻子做好的饭菜用大脚盆装上，运到各新股抽签表发售点去。

10日那天晚上，深圳又是一场暴雨。几十个民工满身疲惫地回到四海，蹲在树阴下，又吃了一顿饭，散去了。至于是否买到股票抽签表，买到多少张，我没有去打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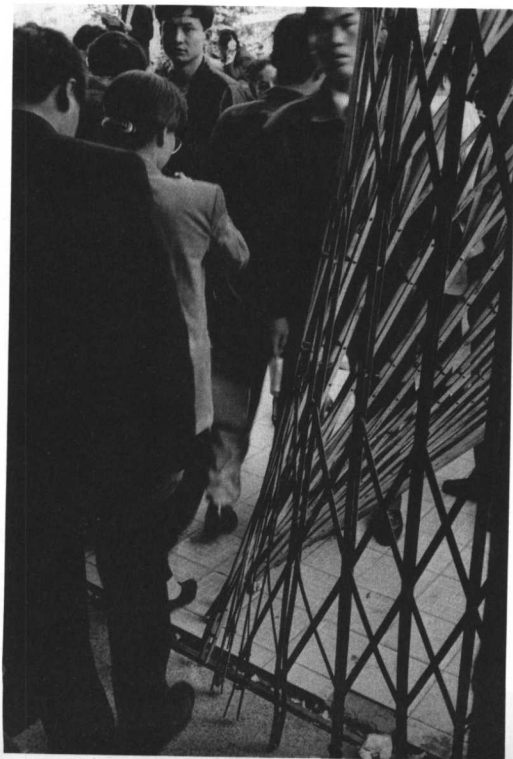
“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深圳 1992

发售抽签表前的半小时，这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洗出列。他从头到脚全被汗水淋湿，眼窝里挂着豆大的眼屎，手里紧攥着捆得结结实实的钞票和身份证，对着我的镜头绝望地喊：“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疲惫的一夜 深圳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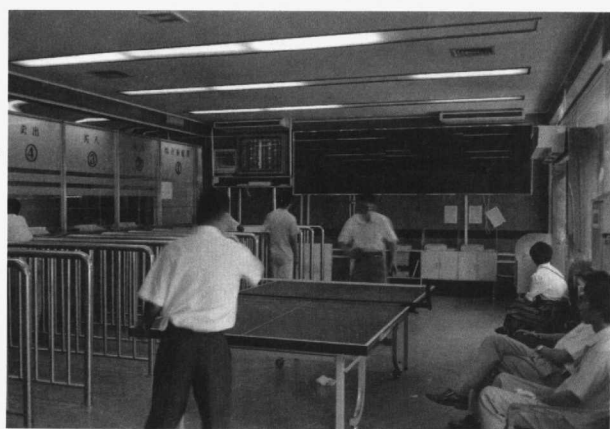
天亮了，大街上满是疲惫不堪的人。这样蜷在路边过夜的人并不少见。



股灾之后，一片狼藉 深圳 1992

卖完了？ 深圳 1992

一些发售点刚开始发售不到半小时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苦日夜排队的民众美梦成空。



股灾过后漫长的熊市 深圳 1992

证券公司门可罗雀,交易大厅里干脆打起了乒乓球。



股潮之后由疯狂走向理智 深圳 1992



2. 别墅养猪牛

除了股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南方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还目睹了另外一个神话，那就是房地产热。其中，广西的北海神话最为经典。

关于北海房地产热的背景资料：

1984年，北海被国家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此后8年，北海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排在14个城市之末。1992年，北海凭借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采取“土地成片批租、成片开发”的发展战略，实行“低门槛”政策，掀起了空前的开发建设热潮。全国数以千计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各类公司蜂拥而入北海，1992—1993年共有6000多家房地产公司进入北海，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北海热”一时席卷全国。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北海建立了近20个开发区，批出土地80多平方公里。批租土地过量和当时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派生了哄炒地皮歪风，致使楼宇供求关系失调，北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别墅群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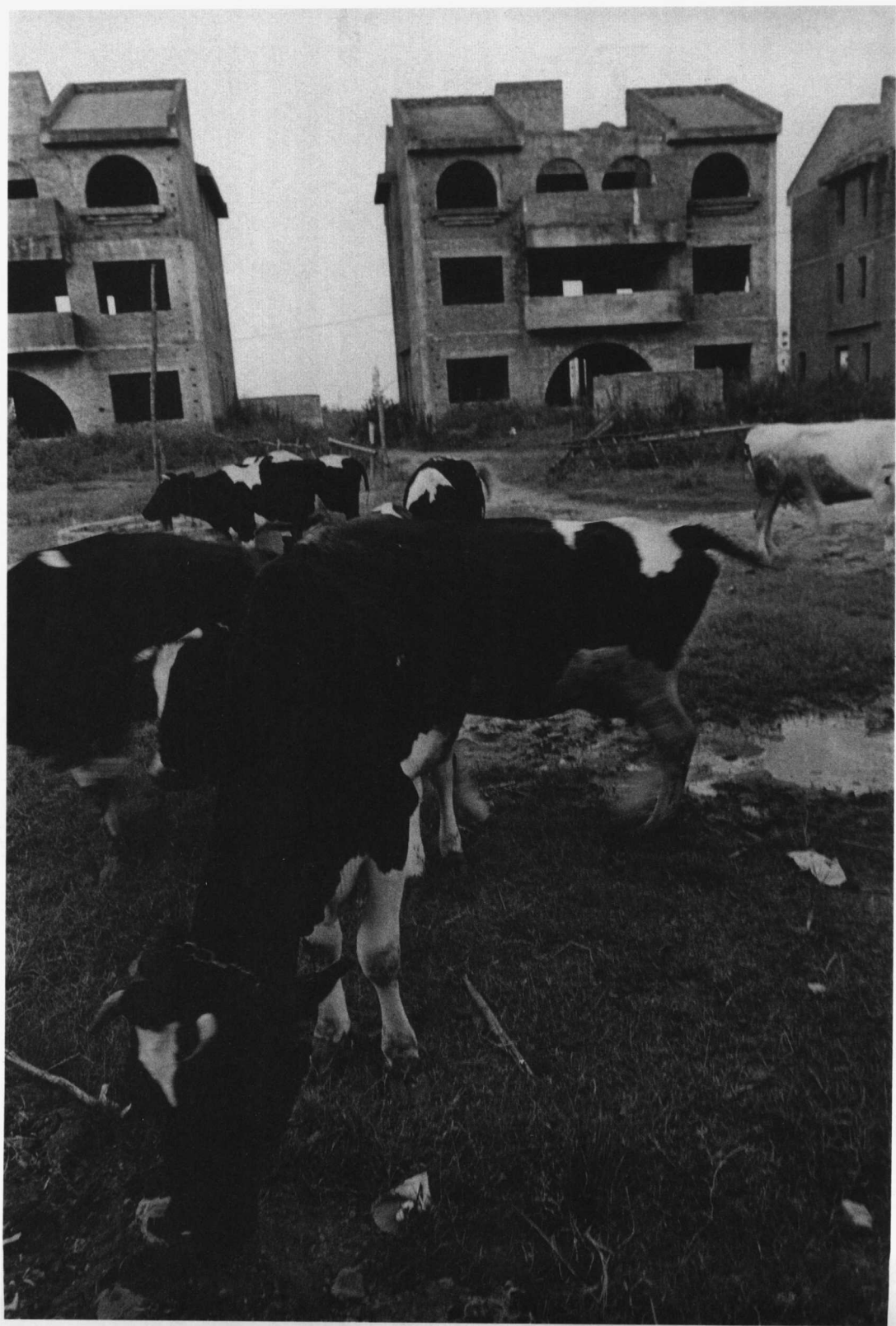
广西北海 1998

位于银滩大道的海泰花园别墅群，是北海诸多别墅群中级别最高的代表性建筑群。从其配套建筑恒利大酒店的高层望下去，别墅群蔚为壮观。

(右页图)“放牧”

广西北海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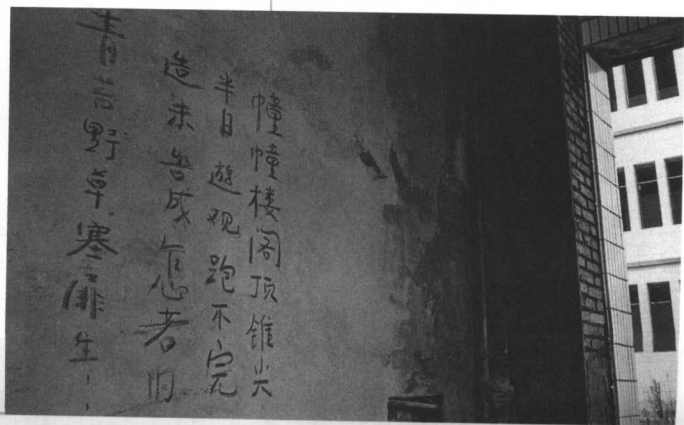
跑马场(未建)旁边的别墅群里，有很多饲养场。奶牛，是别墅里饲养的最大型动物。每天一早一晚，饲养员都会把牛从别墅里赶到空地上放牧。



1998年10月，我在北海银滩海边碰见了讲一口“椒盐”普通话的曾繁书。这位46岁的四川农民，1992年来北海打工，眼看着海边大片大片的别墅群如何建起来，又如何闲置荒芜到现在。老曾在银滩帮人养殖花甲螺，长年住在海滨别墅里。阔硕的落地窗因为没有经过装修，水泥已在剥落，跳过窗台就是银色的沙滩。老曾穿条裤头，戴顶毡帽，招呼我跟他到海边，捞他养殖的花甲螺。那天中午，堆尖一大铁锅炒花甲，无比鲜嫩。

时隔五六年，北海大工地的喧闹消失了。银滩安安静静，寂静得像个巨大的渔村。异样的是，宽阔的银滩大道两边，欧陆别墅群一片连一片，绵延十几里。登高望去，陶瓦屋顶黄橙橙一片，尖、斜、圆、方，千奇百怪，在绿树、海滩的映衬下，甚是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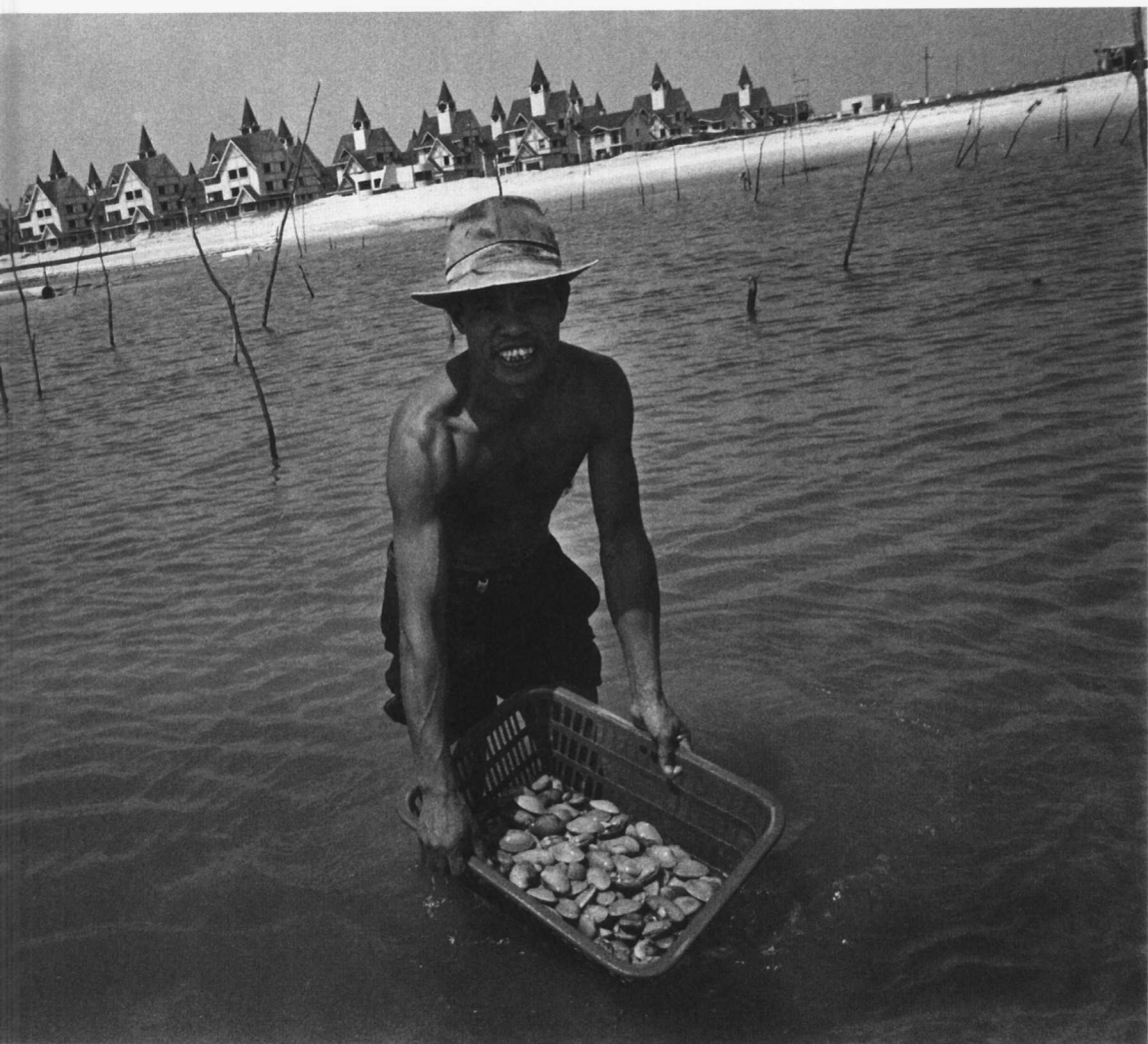
走进位于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海泰花园，除几位保安外，我没有看到一位度假的别墅主人。这座占地62公顷、投资逾6亿的度假村拥有大型豪华别墅294栋，每栋建筑面积少则五六百平方米，多则上千平方米，室内游泳池、车库、花园一应俱全。除了靠银滩大道路边几栋看似经过装修的紧锁大门之外，大部分别墅任人出入，门口野草齐胸，室内遗尿满地。好多室内装修伊始即停，堆放着废弃的水泥沙石。偶尔可以看到用建筑废料拦起的掩体，里面住着仨俩民工。他们说，在这里已经住了好些年了。



别墅涂鸦

广西北海 1998

别墅里的涂鸦：“幢幢楼阁顶锥尖，半日游观跑不完。造未告成怎者旧？青苔野草塞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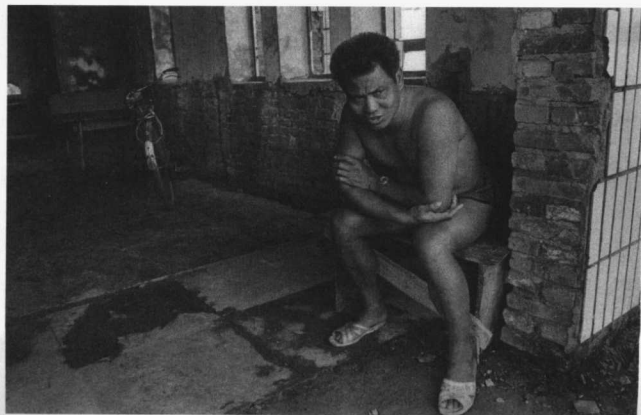
多好的花甲 广西北海 1998

曾繁书的身后是海泰花园别墅群。他说别墅1993年建成，一直荒芜着。

等待中的牛先生

广西北海 1998

42岁的牛先生是湖南益阳人，1994年率施工队进入海泰，承包4栋别墅的内外装修，1995年6月30日停工。牛说他的施工队有30多万元工程款收不回来，他住在自己施工的别墅里等，等个说法。已经等了3年多，看来还得等下去。



有着豪华外表而且大面积的“高尚住宅”，在1998年仲秋，却人迹罕至，甚至连其配套设施也无用武之地。海泰花园旁边有个邮电所，看样子早先曾经派上过用场，如今也是铁将军把门，门口贴了纸条：“9月20日起停止营业。”附近还有好几处大型游乐场，主体建筑刚成雏形，大片空地用围栏圈着，长满杂草。我沿着草径往里走，在一处未建的跑马场附近，居然出现了牛群。我尾随着牛群进入豪宅区，发现“豪宅”里不光养牛，还养猪、养鸭、养鸡、养海产品。其中养鸡的最多。两三天之内看到十几户，每户都养几百只以上。说是朋友的房，空着也是空着，物尽其用，而且养鸡可以在二层以上进行。有两位养鸡的年轻后生说，北海产糖，他们原来是在榨糖厂工作，糖厂在地产热的时候被人买了，当然不是买来榨糖而是为地皮增值。哪想到地皮没有增值，厂却废了，职工全部失业。年纪轻轻，总不能成天无所事事，没办法他们只好养鸡，赚点儿生活费，反正这里有大把空着的别墅可以用来做鸡圈。

在银滩诸多花园别墅群中，我终于寻访到一处像样的售楼处，管理人员说：“白金花园是有人居住的，因为内外装修完好，手续齐备。别墅每栋大约30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3400元。您有心买，价钱还可以商量。您到别处买，产权官司会够你呛。”

到了晚上，银滩安静得让人毛骨悚然。穿过一片又一片黑森森的尖顶水泥怪物群，我没敢想花多少钱可以在这美丽如画的海滨拥有一套别墅的问题。我在想，这些摆在海滩上的建筑物，可都是钱呵！这些成亿成亿被“套牢”的钱，不管来自何方，就这样白白地一摆好几年，而且还得继续白白地摆下去，是不是太造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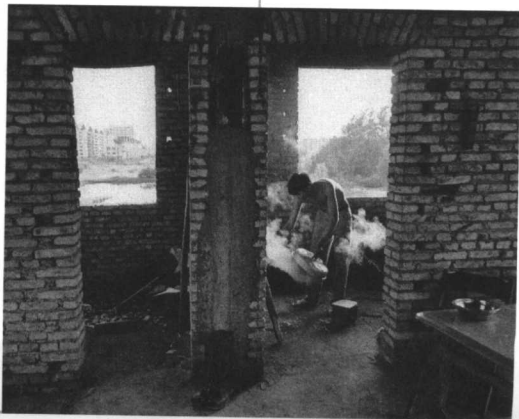
海泰花园旁边那个中途停建的游乐场，抵押给了贷款方北海市工商银行。在圈起来的围墙里，我碰到了正在种西瓜的原住农民。他们种的是由工商银行下属的地产公司投资开垦出的150亩地。地产公司的人说，市里多次下文，要求利用闲置土地复耕还农。

一度因为房地产而大红大紫，同样因为房地产而深陷困境的北海市，正在谨慎地、悄悄地走出阴影。

曾繁书说：“住着别墅养花甲，并不好受。世面老这样冷淡，花甲也不好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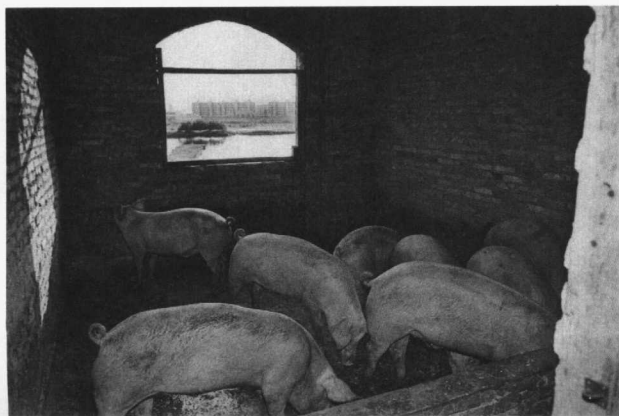
别墅里养鸡的民工正在烧饭
广西北海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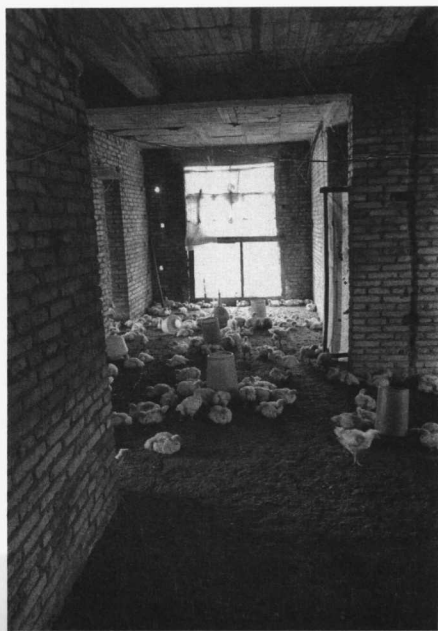


担着肥料去瓜地 广西北海 1998 海泰花园旁中途停建的游乐场，现在成为一片西瓜地。

过去的别墅，如今的猪圈
广西北海 1998



鸡鸭成群
广西北海 1998





直立 北京天安门广场 1993

流向城市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真正进入城市。他们离开了农村，但是依然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走进了城市，但是不为城里人认同；他们已经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却又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城市也改变着这些“外来”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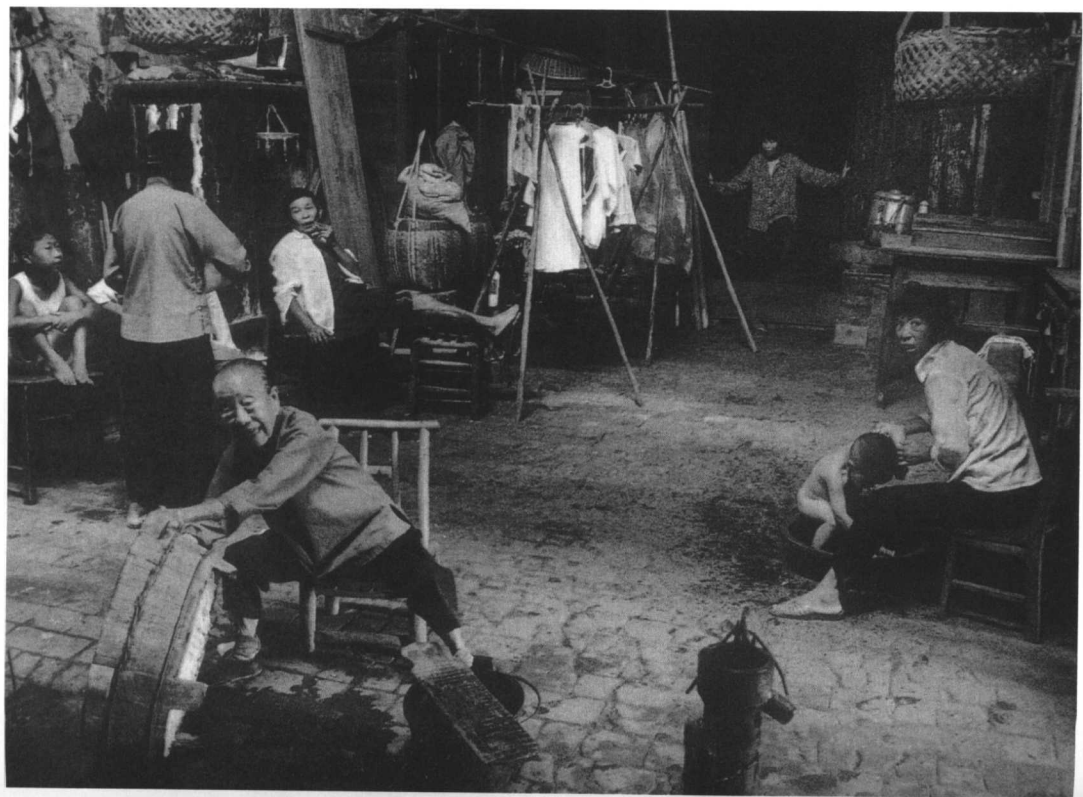


3. “传销让我输个精光”

每天早晨五点多钟,董家兴两口子就起床了。七点钟不到,董家兴已经从龙湖廊桥上的农贸市场买回了当天要用的蔬菜。他说如果去晚一点,稍微好点的蔬菜就没有了。

董家兴的“迎宾饭店”主要以炒菜、水酒、饭食为主,没有专门的客房。1999年我去流坑村的时候,村头已经有了两三家提供住宿的旅店,但都是安了好几张床位的大房间。董家兴希望我在他那里住下,每晚只收我5元床费,图的是方便和我聊天。

董家兴三十多岁,炒起菜来干净利落,但味道实在是太简单。1997年以前,他和老婆都在厦门打工。有了点积蓄的时候,开过一个小饭店。曾经一天做过几百份快餐盒饭,买他盒饭的几乎全是打工者。董家兴说,那时候他“做得很顺”。他本人在一家台湾公司,由于比较精干而且勤奋,老板就让他帮着做一些管理方面的事情,每月给他的基本工资就有1200元。老婆也在一个公司做,每月也能挣六七百。虽然每天都要干12小时以上,每个月放一天假都不容易,很累,但他说老板对他很信任,不但管进货出货,甚至连招工这样的差事也让他负责。招工他就尽招他的老乡。那一段日子是董家兴打工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两口子本来干得好好的,



(左页图上) 村中饭馆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 1999

到1999年，流坑村已有好几家饭馆，但只有两三家生意还好。

(左页图下) 祠堂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 1999

在流坑，像这样的大宅通常住了好几户人家。村民们的商业活动也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

“好喝吗？” 深圳 1991



用攒下的钱开了快餐店。每份快餐卖两块五到三块钱，开张一个月，就净赚2000多块。董家兴刚刚开始尝到自己当老板的甜头，有人就来劝他了，劝他去广州做快餐，说广州的快餐能卖五块到六块。

董家兴听进去了，把厦门的快餐店转让给了别人，带上老婆，带上在厦门几年的积蓄，去了广州。去了之后才知道，他那点积蓄根本不可能在广州打开局面。那位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做传销的，要发展下线，必须拉朋友、拉老乡甚至拉亲戚骨肉下水——“亲骗亲，故骗故，进来的人，全套住”——董家兴说，在厦门成天加班加点，对外面的事情根本不清楚，哪里知道什么叫“传销”啊！所以呢，就进去听他们上课，还真觉得挺像一回事。很多人都称自己赚了，甚至听说有人两个月就赚了好几十万，很快就做到什么总裁位置上了。董家兴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刚刚干了一个月，政府就全面禁止搞传销。董家兴一万多块打工挣来的血汗钱，顷刻间化为乌有。“我一下子全完了，血本无归，好惨啊。”

输得精光的董家兴，只好回到江西乐安县的流坑村老家。1998年的流坑村已经开始利用传统资源发展旅游，董家兴在外面打工多年，见过世面，受过磨难，很快缓过劲来，租赁村里护林员董小年120平方米的老屋，开起了这个“迎宾饭店”。

董家兴有和城里人打交道的经历，还有在台湾老板那里学到的成本核算经验，加上勤奋和能吃苦，饭店很快就做大了。2000年我再流坑，他已经把对面二层楼的小旅店拿了过来。中午在二楼请我喝米酒，吃石蛙，结帐的时候高矮不让我买单。



紧身裤与新式旗袍的相遇 昆明 1995

(右页图) 盲人 四川德阳 1994

行洗干平连工得

地址：北光市场

电机厂二生活区各色
皮夹克皮鞋沙发翻新

北光市场



用我们的专长 实现您的梦想

德阳区技校 缝纫专业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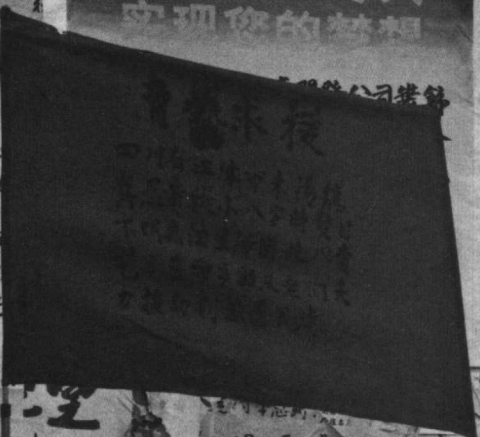
庆祝六一

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
新华书店全体员工向全市的少年
问好，并祝节日快乐！
德阳市新华书店、文艺书店地处市
老城南街，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
时，以读物、儿童文学、写书籍作
展销三天
展销时间：5月30日—6月1日
热忱地欢迎您的光临！！
德阳市新华书店、文艺书店
一九九二、五、二十五

花甲缘

杨波
郑红
一点在南华宾馆边出

德阳区技校 裁剪缝纫专业招生



招生通告

（兵）竞技水平

招聘

德华宾馆楚露
吧诚聘女服务员
名、有、兼、职、均、可、特、选
从化、有意者请
到本
面谈



HUAX

第七章 『农转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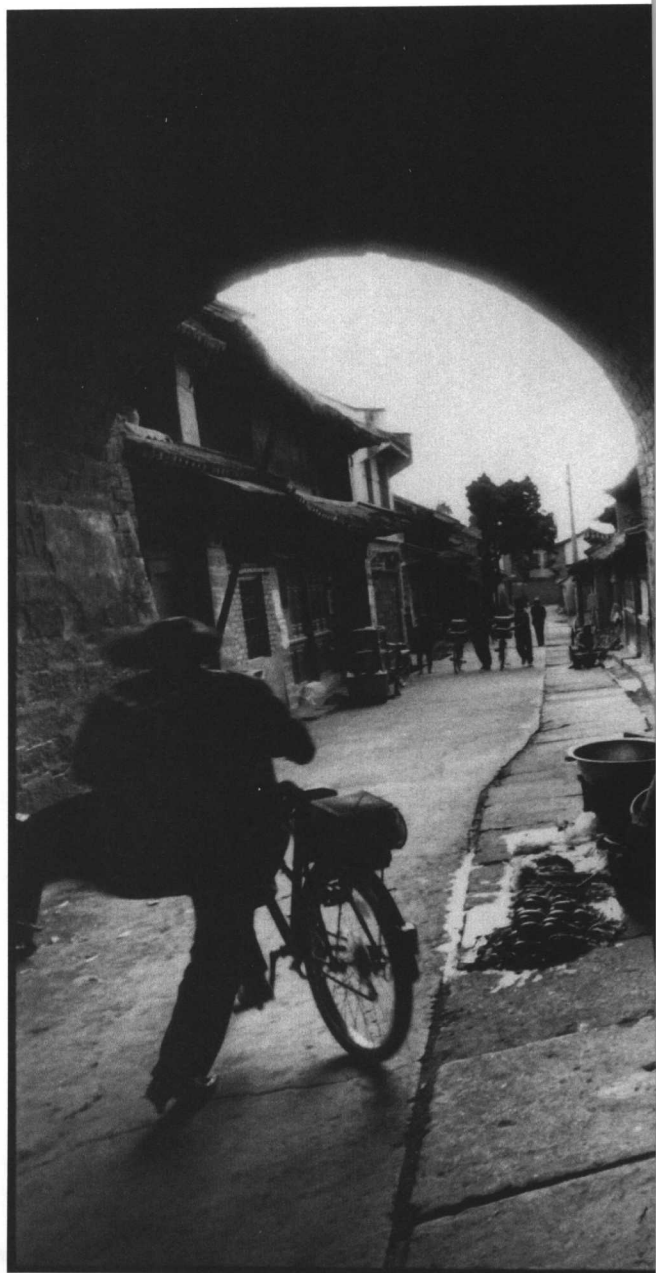
偷自行车的人
深圳 1999



1. “我家住在北光小区”

2000年的冬天，忙完了《流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回老家看看。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要办，仅仅是想回去看看。川西坝子浓雾弥漫，回家两天，总觉得还有啥没看到，第三天便下乡去了当年插队的红花村。30年了，景物依旧，没有任何大的变化。当年的房东，一条很精明的汉子，一直守着土地，从来没有出去打工。虽然当着村里的头儿，但我看他的家，看不出30年了有什么积蓄。让我羡慕的倒是，中午在他堂屋里吃饭，看到他饭量依然是三大碗，酒量依然是烧酒半斤以上，要知道，老哥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他说：“房子还是那些房子，田还是那些田，你看不出有啥变化。但是你知道吗，我10年前就不敢把鸭子赶到田里和沟里去放养了，一放就死。农药和工业废水让畜生害怕，人也害怕。不过你放心，今天招待你吃的，是我专门留了一块地种的米和菜，没有打农药，没有施化肥，自己吃。卖的，都打药。这么些年，都奔发达去了，换来的是，这水，这地，完了，越来越不好种了。”

红花村还处于官渠堰水头上游，我想，下游应该比这里更糟。（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上千亿元。）





门洞下的日子 巍山 1994

云南大理往东，南行30公里山路便是巍山县城。巍山古名邪龙，后改称蒙化，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古南诏国发祥地，曾被乾隆皇帝钦定为云南四个文献名邦之一。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巍山由于地处偏远而被冷落，经济不发达。全县4万人口，居民务农经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

一位穿皮夹克打领带的人进来，问：“还认识我吗？”余闷娃！老了。我们都老了。闷娃说：“我在城里买了房，在北光小区。”

北光小区，德阳市郊一个比较早的工薪族商品房住宅区，我父母买的房就在那个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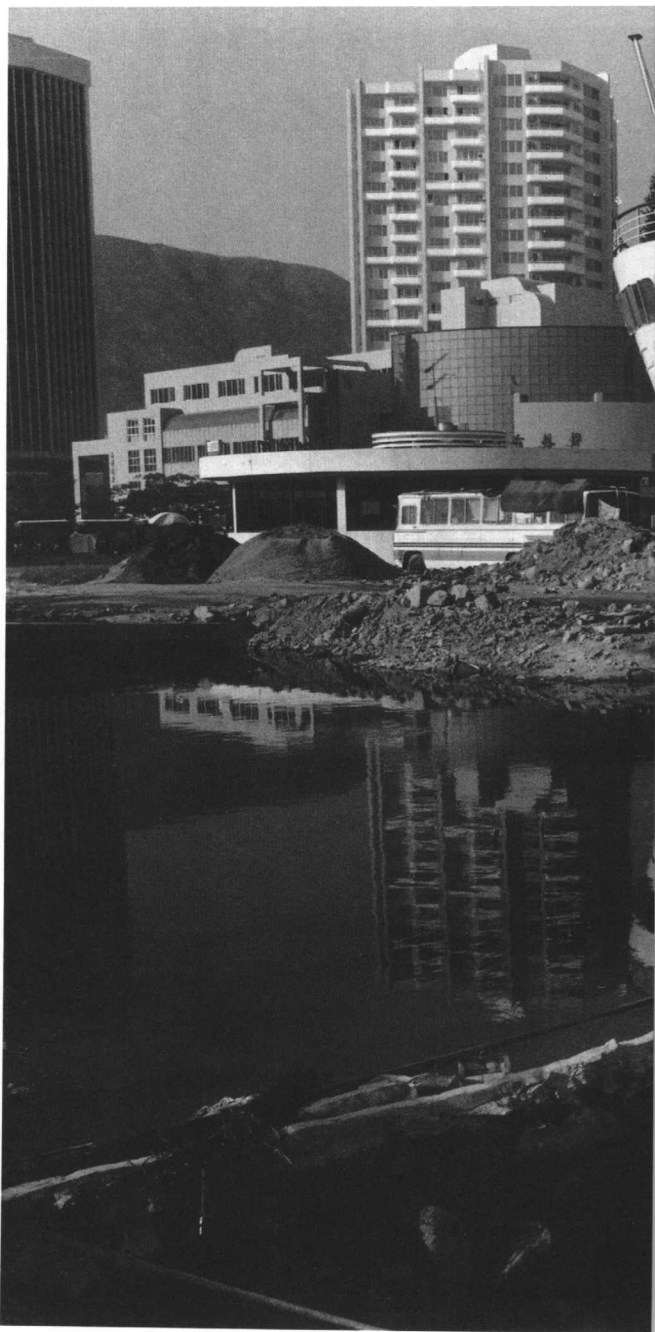
当年那个在村里郁闷得骂娘的农民余闷娃，如今和他的老婆、娃儿，也一样住在那个小区，做着自己的小生意。不用说，在北光小区，在其他无数个住宅区，在中国无数个城市里，从村里来的“闷娃们”还有很多很多。

闷娃说：“前两年想把户口迁到城里去，但价钱太高。现在松了，我又不想迁了——迁进去，乡下的土地就得交出去，划不来。”

我能体会到闷娃说起已经可以取得城市户口时的那种自豪，那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但是他叔说，那一张纸，能当饭吃？

我想到了这么些年拍下的照片。从我开始拍摄四海打工妹打工仔的1990年到现在，数以亿计的人，离开户口所在地，流动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选择自己的新生活 and 机会。可是走到天涯走到海角，也走不出一纸户口。户口粉碎了无数人的梦。不光农民，所有流动着的人，都在诅咒：“狗日的户口！”户口与人的流动之间的对峙，到了20世纪末，终于发生了变化。尽管这变化姗姗来迟，尽管各地管户口改革的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农民在没有真正变为城里人之前，还不能割断和土地的这根脐带。





陆地轮船 深圳 1996

为了增加土地，填海成为必要的手段。这条著名的大船成了陆上景观，“海上世界”只有存在于回忆之中了。



投射 深圳 1991

深圳富了。这个富裕的城市充满了戒备（据深圳市公安局统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95%是流动人口）。中国的保安行业最早就出现在深圳。



2. 深圳百村

1993年，当时在全国极有影响力的专业摄影杂志《现代摄影》想做一件很“土”的事儿——联络一些摄影家拍摄深圳都市里的村庄，编辑出版《深圳百村》画册。

深圳建市以前是一个边陲小镇，隶属宝安县管辖。宝安县治早先设在南头，1952年才迁到深圳镇的蔡屋围。1979年，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圳市。当时深圳市（含宝安县）的常住人口是31万人，暂住人口也只有2000人。建市之前的深圳镇，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农村。

短短10年，沧海巨变。1990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69万，暂住人口激增到133万。而真正的深圳“土著”（铁丝网围起来的经济特区范围内）只有4万多人。

1992年7月，深圳市搞了第一次“农转非”。当年即把特区范围内的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的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成了居委会。

深圳特区从此没有了农村，没有了农民。《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带领一群摄影师、作家、记者进入南山区，打算从南山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行将消失的深圳农村影像全纪录。我参加了那一次拍摄，走过一村又一村，一户又一户，很尽职地拍摄。但是镜头下的影像，已经和常人对于乡村的经典想像相去十万八千里。

老实说，深圳的原住农民早就比“城里人”滋润多了。

十几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深圳的土地变得很金贵，土地象征着财富，谁有土地谁发达。从1979年开始，到1986年前后，深圳的农民就已经洗脚离田。每个村都办企业，依托天时、地利，村办企业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供村民分红分利。公共基础设施也非常城市化，“村”里小楼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出，密密麻麻。屋主自己住一套，租出去好几套。原住民的户口反倒比城市户口值钱得多，因为那是村里分红的凭证。曾经有笑话，如果你得罪了村干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没料到，1992年“农转非”真的来了。



文化衫上印着：“打工没劲！”
深圳 1995

(右页图)
“城中村”密集的小楼
深圳 2004



政府给村民做了大量的动员劝说，完成了这次有形的城市化转变。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也有了居委会，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还是过去的那种物业经济和生活方式。村里的福利制度事实上把人捆绑在一起，村民股份不能流动，村民也没法流动。内外有别，外来人口不管学历多高，都只能是打工仔。即使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村里工作的外来人，也不能享受村里分红。居委会没有完全与村里的股份公司脱钩，实际上是股份公司下面的一个社会发展部。股份公司要摆脱地缘股、血缘股、家族股，让股份真正流动起来，变成政企分开的经济组织和市场主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还有一段距离。

深圳的第一次“农转非”是超前的，但留下了很多“城中村”。第二个10年又过去了，“城中村”中抢建自建的小楼在不断地“崛起”。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特区内竟有30万栋。深圳的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城市，众多的“城中村”显然使这个目标感到尴尬。“城中村”成了深圳的顽疾和毒瘤。

2003年10月，深圳开始第二次“农转非”。准备花一年多的时间，将宝安、龙岗两区现有的27万农村人口，也是深圳最后的27万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完成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这一次，深圳将尽力避免重蹈11年前的覆辙。

深圳农民的富裕，是因为有了深圳。但是“城中村”却不独存在于深圳，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沿海发达城市，都有，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在农民工的出发地——欠发达地区，情况却是相反。

(右页图) 脱衣舞表演

海南三亚 1995

门口两名穿得很少的女子跳动着招徕观众。已是深夜，卖票的男人还戴着墨镜。我刚按下快门便被男人吼住了。公开宣称表演脱衣舞，不光在海南，在内地一些中等城市边缘和小城市也不难见到。这些以“脱”赚钱的班子往往买通了当地的关节。上台的女子大多来自贫困山区。

巷流 成都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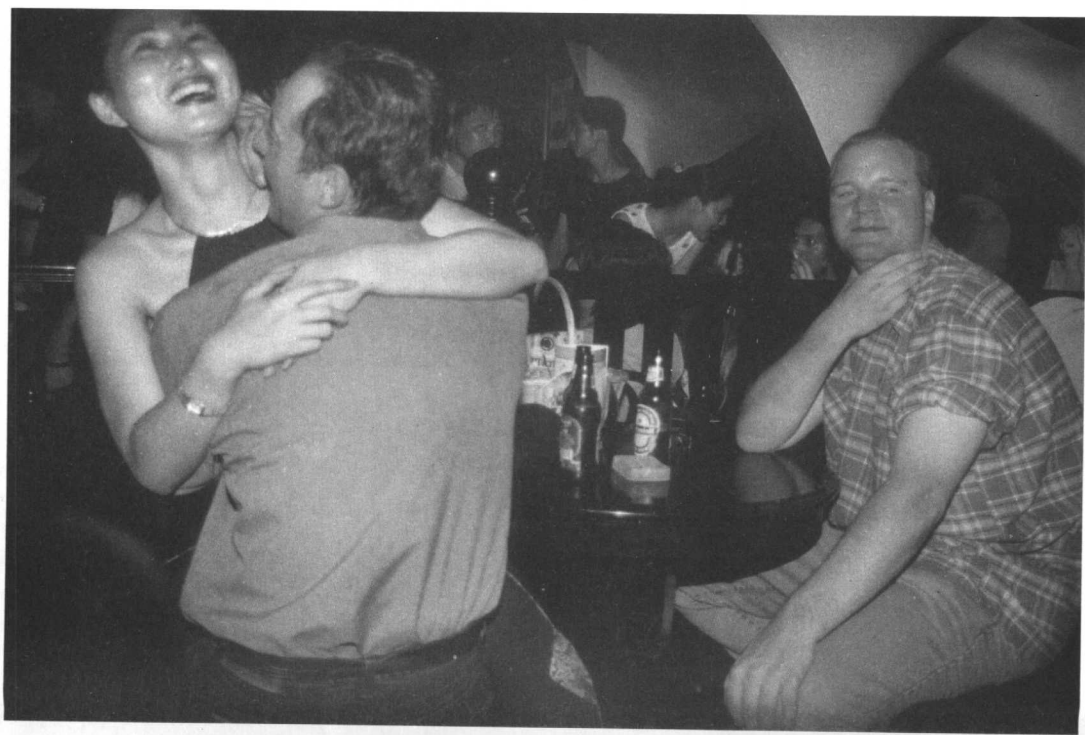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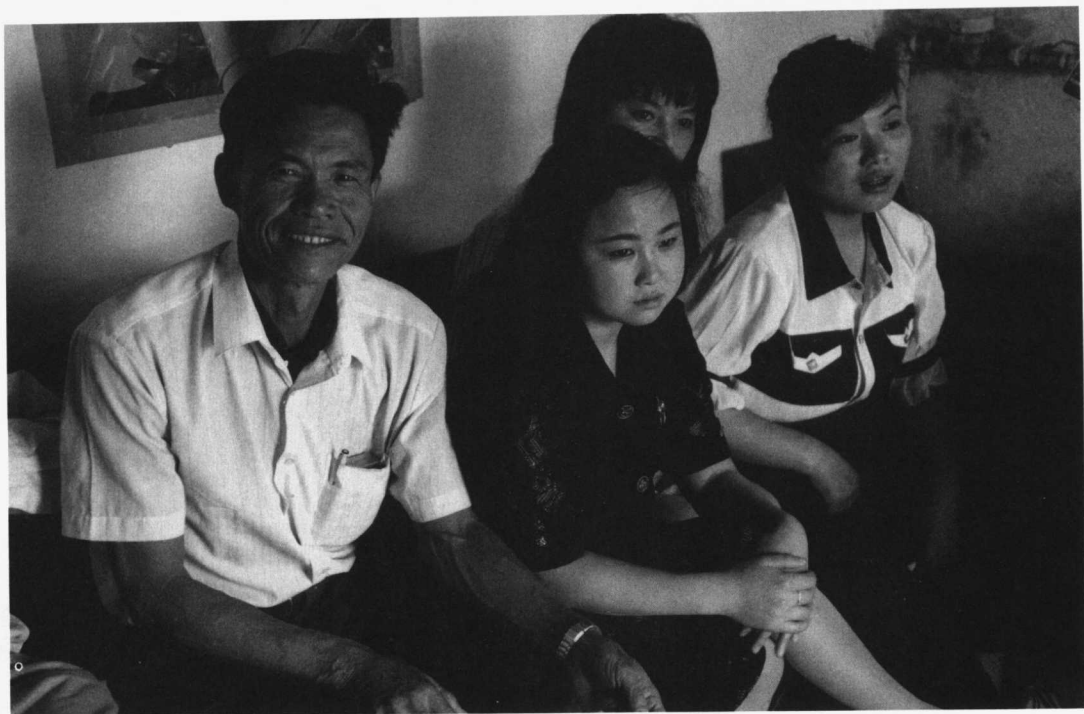


夜幕下的深圳 深圳 1997

香港回归前的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清查“三无人员”的车子在街头呼啸而过。



夜总会 深圳 1999



老板和发廊妹 广东惠阳 1991



爱滋病宣传板上的阴影 海口 1988

3. “农转非”何以人气不旺

报道摘引

新华社郑州2002年1月5日电(记者 李钧德)农业大省河南近年来加快了城市化步伐。1999年,他们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的县镇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去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农转非”指标管理和居住时间限制,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等。但是,这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99年的15个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农户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三分之一。辉县孟庄镇、长葛市后河镇等大部分试点镇,申报“农转非”指标的多则几十人,少则只有几人;沁阳市西向镇、郾城县召陵镇,则没有一个人申报。去年小城镇户籍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后,全省非农业人口增加53万人,其中“农转非”48万人,增速和往年基本持平。

小城镇为啥缺少吸引力?调查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小城镇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有的只是简单地在过去的集贸市场建设小城镇。在许多地方,往往将小城镇建设等同于盖房子、修路子、建场子(市场),因此造成市场建起来了、房子盖起来了,但人气却旺不起来。平舆县东和店镇,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115个重点镇之一,这里地处106国道沿线,交通方便。和店村7组的李国共告诉记者,他们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又没有其他的挣钱门路,便利用自家的空房,开了个小旅社。但因为外来人口很少,一张床位一晚上两块钱都没有人住。因为没有收入,前两年镇里搞小城镇建设,扒掉了他们家沿106国道的两间门面房,让盖两层以上的楼房,结果到现在房子还没有盖起来。

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被占去了耕地的农民大都靠做小生意挣钱养家。据当地知情人介绍,光一个东和店镇,逢集日卖小百货的就有一二百家,卖烟酒的小门市也有好几十家。像这样的小城镇,要城镇户口又有何





城市印象 广东深圳 1995

(214 页图) 乞讨 深圳 1998

乞讨现象在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深圳比较突出。

用！“农转非”对农民吸引力不大，也就势所必然了。

用一位农民的话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市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又不顶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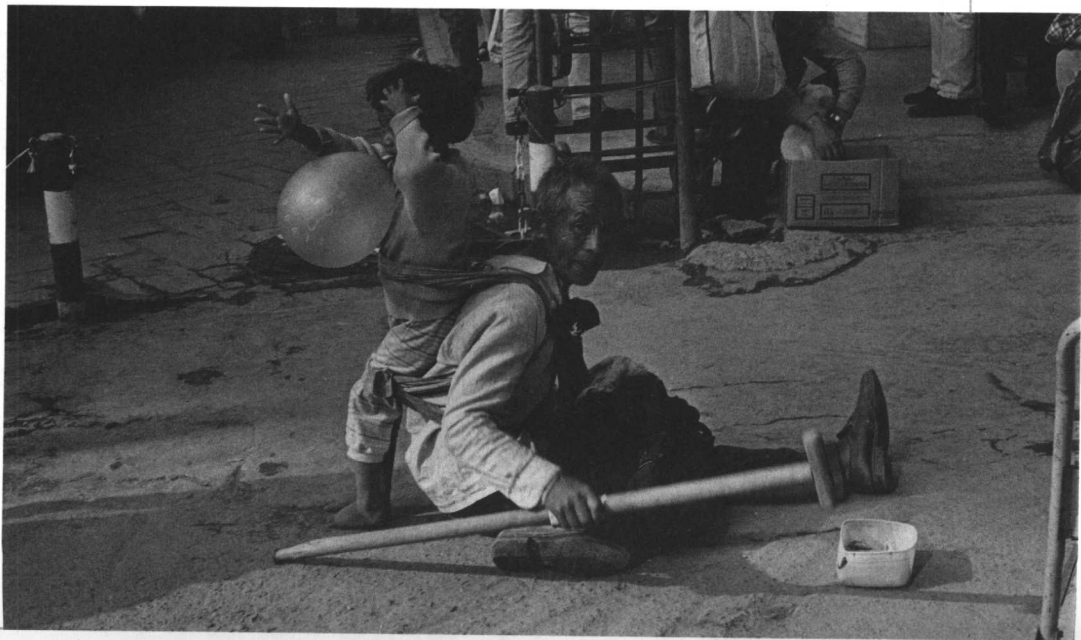
像东和店这样没有像样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在河南并不鲜见。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去年底，河南全省共有建制镇844个，除县市所在地外，其他建制镇共有697个，平均每个建制镇镇区面积仅有1.31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只有0.27万人。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种种原因，乡镇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宽松，部分小城镇成为乱收费的重灾区，直接影响了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

据国家计委的一项调查，在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去年，该市面向乡镇企业的各种收费金额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

据平舆县东和店镇纪检书记朱心正介绍，由于小城镇经济相对活跃，来自县直有关职能部门的各种收费也比较多，粗粗一算，就有烟草、盐业、动检、植检、运管、公安、技监、工商、土地等八九个部门。他们有的设有固定的点，有的干脆流动收费，开个车、拿着旗、穿着制服，几个人往路上一站，就开始罚款。早晨从县城开车过来，罚几百块钱，中午一吃一喝，下午天不黑又开车回去了。他们都是县里管理的部门，镇里对此也无可奈何。

河南省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发展环境不宽松，是造成乡镇企业普遍缺少活力的主要原因。乡镇企业的欠发达，又使小城镇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其应有的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难以发挥。





敬礼 成都 1995



城边的夫妻鞋垫铺 四川德阳 1995



4. 关键词

城市化

全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发展中国家在38%左右。200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31%，已经进入从30%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

城镇

城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全国工业总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集中在城市。

1978—2000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 173个增加到20 312个，市镇总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

“农转非”

2001年10月1日前，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取消了“农转非”指标。在两万多个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

耕地流失

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2 395万亩耕地，按人均耕地不足0.7亩计算，至少有3 400万农民因征地而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度，2000—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

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由于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

土地征用补偿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费为4至6倍。

为了加快城市发展，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眼睛盯向土地。各地补偿标准由于征地用途、耕地年均产值、计算倍数等不一样而相差悬殊，另外一方面，补偿标准制定过低，绝大多数农民不满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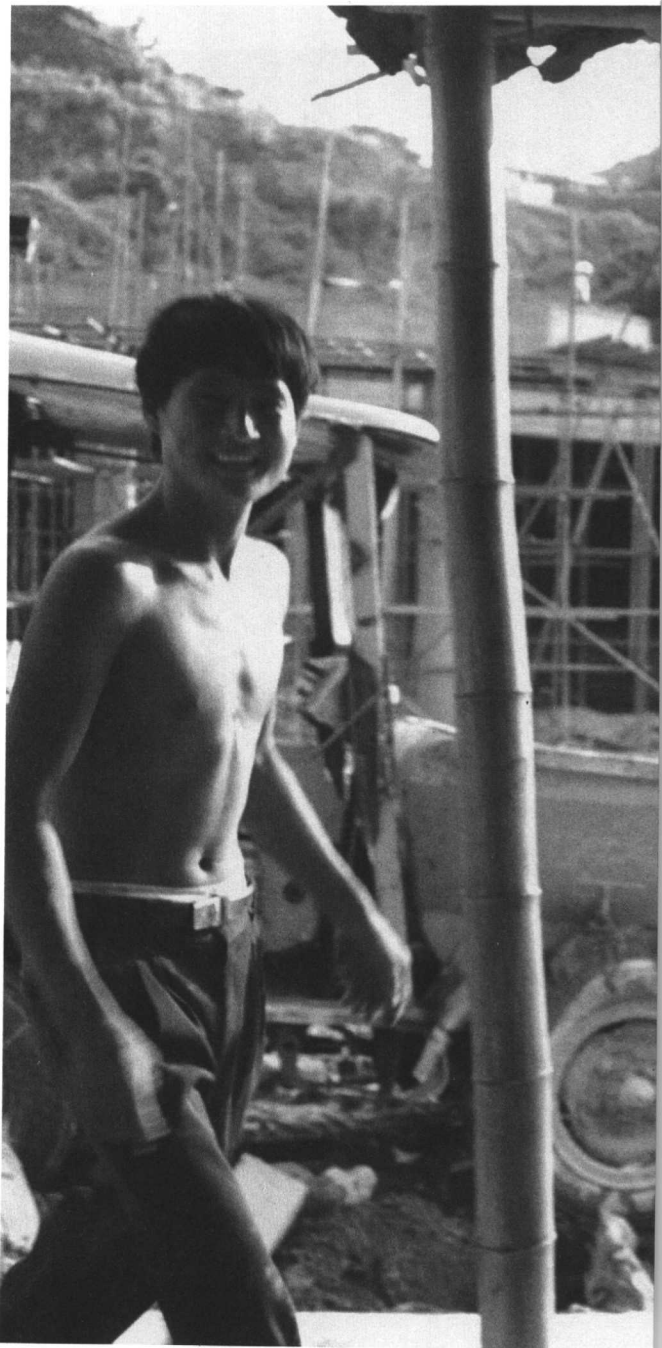
“农村包围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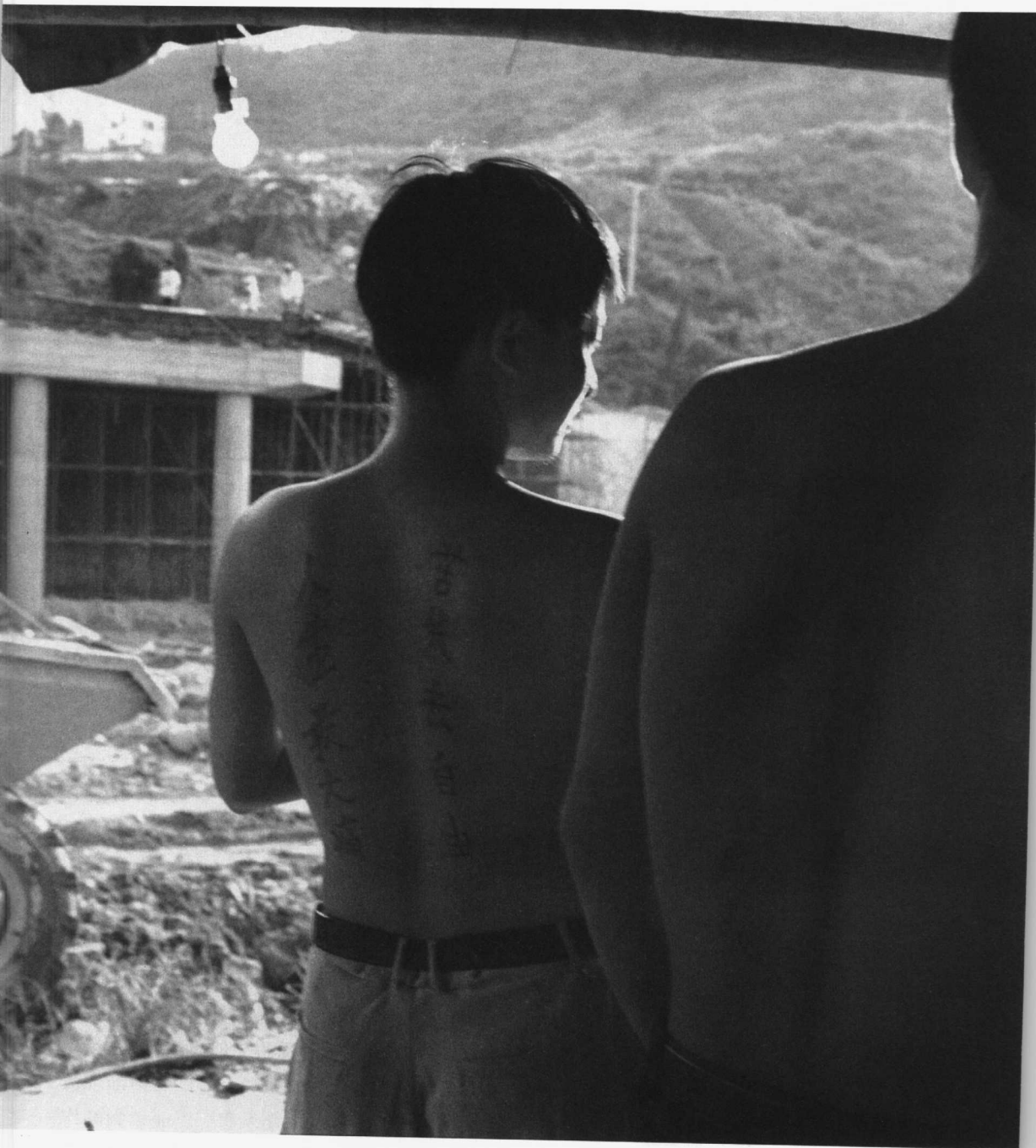
1990—2000年，十年一瞬。

“民工潮”年复一年。农民在不断地流向城镇，流向中等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在21世纪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城市向农村侵袭。乡村变成了城市，田野变成了高楼。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农民曾经交出土地上的收获；当城市化梦想来临的时候，农民交出的则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户籍制度松动了，城市的大门打开了。农业大国的城市化时代，来临了……





背上刺着：“人生最大痛苦失去自由。” 深圳 1995

视觉记录与影像选择

——我看张新民的《包围城市》

陈映芳

社会研究的影像视角

图像在现代社会中正处于一种不无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现代传媒全面视觉化，这使得图像倍受宠爱；与此同时，随着视觉技术的日常化、商品化，视觉化的媒体信息越来越难以摆脱被轻视的命运。像视觉化的演唱组、音乐作品（MTV）被有些人认为是伪音乐，视觉化的杂志被认为是迎合读者消费心理的商业化刊物。

而“视觉化”倾向的这样一种两义性最突出的表现还在于：一般人对于活字/语言的价值远高于图像这一点确信不疑。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活字/语言才能到达事物的内涵，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样一种观念，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中可谓根深蒂固。今天的以观察、研究社会为业的研究者们，大多在回避将视觉用做描述社会事实的手段。除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插图或者表明数据和逻辑关系的图表外，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的教科书和研究成果中，人们很少使用图像，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描述手段。学者们习惯于依赖语言和逻辑的抽象化来记述社会事实。

其实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以社会学为例，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早就强调：“没有什么比眼睛更能充当社会学的工作了。”而早期的社会学界也

不乏将图像应用于研究的先例。像《美国社会学》杂志初期的20多期中，照片作为视觉资料曾被频频用以论文之中。但是后来随着社会学内部强调理论逻辑、强调社会结构功能的倾向的增强，照片渐渐地从学术刊物中消失，“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以及生物学/心理学等感知社会的途径、方法，渐渐地被主流社会学所淡化。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作为社会知识的“社会事实”，基本上都是用语言/逻辑建构起来的。与此相对应，现实中的种种社会存在，统统被各门学科拿去演化为专业概念，譬如进

赶集之后抄小路回家的乡民
云南福贡县 1997



城谋生活的农民们，是人口学中的“流动人口”，经济学中的“廉价劳动力”，行政学中的“人力资源”、“外来人口”，社会学中的“农民工”、“弱势群体”……至于他们作为一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包括他们的生存状态、表情姿势等等，研究者们似乎无暇细看，又好像全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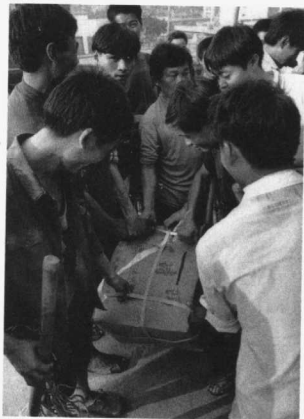
在这里说这些，我是想说明：作为摄影家的张新民所做的工作，其实原本是研究社会的人早就该做的工作。在今天，关于“流动人口”、“进城农民”之类，文人学者的论文、专著、报道之类的文字，多到近于泛滥。但像张新民这样真正用眼睛去看、用镜头去记录、用图像来描述，且用心将这一切当做事业去做的，少而又少。

“农民工”给出的难题

虽然说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摄影家们一直在实践纪实摄影，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注现实社会的纪实作品，对于人们如何用眼睛去观察、认识社会深具启迪意义。但是，《包围城市》依然值得我们关注。不仅由于张新民所拍摄的是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社会群体，更因为这个群体对于我们（作为记录者、研究者的所有的“城市人”）而言，是拥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群体。

一般来说，当我们观察某个社会群体的时候，相应的观念会影响、确定我们的视线，而镜头在拍摄、记录对象的同时，也会暴露出拍摄者的视线及观念：鄙夷的，怜悯的，关怀的，敬仰的……这样一种潜在的关联，事实上限制了我们的记录和观察。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我们可以以较为确定的视线去面对他们，而对另外一些群体，我们就可能很难以确定的视线去面对并记录他们。例如当我们到乡村去考察农民，虽然我们多少会觉得村民是很土、很可怜的“乡下人”，但毕竟村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居住在“遥远的”（心理距离）的乡村，我们只是偶尔到那里去转一圈，然后拔腿就可走人。而且，另一方面，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文学熏陶，又给了我们足够的想像力，让我们可以将村民们想像为诚朴、勤劳的大地之子，现实中他们还遭遇着制度的不公（但那不是我们个人之过）。于是当我们在乡村面对他们时，在观念上、心理上，我们是可以以关怀的、怜悯的视线去面对那些村民。做这些，无论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还是对于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都不太难。也所以，我们可以在各种视觉的或文字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单纯朴实的、辛劳奉献的、承受着中华民族灾难的农民形象。这些既与他们所处的乡村背景相谐调，在欣赏这一切时我们也很容易获得精神上的某种平衡。

即使像某些特殊的边缘群体，如越轨群体，当摄影家、社会学研究者面



一单活，十几个“棒棒”争抢
重庆汽车站 1995

对那些被贴有不良社会标签的对象时,如果我们有意要去发现、记录下他们的“善良的”本质,或他们的由于“社会之恶”而造成的“无辜”、“无奈”的一面,也不甚困难。无论是鄙视他们还是同情、理解他们,观察者的观念及其视线都自然而然,也不难引起社会的共鸣。一些激进的社会学家做过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摄影家做过类似的工作。

但是如今,“农民工”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面对那些进城的“农民”,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视线,这似乎成了个问题。

首先“农民工”不再是乡村里的农民。那些穿戴得不伦不类、模仿着城里人举止的“农民工”,无情地破坏了城市人对质朴“农民”的田园牧歌式的想像。身穿劣质西装的小伙子、红绿失调的姑娘们在城市背景的衬托下,不仅强化了城市人关于“乡下人土气”的观念,而且还让城市人看到了“农民”对物质财富、文明享乐其实也“贪”的一面。

不仅如此,“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不速之客,还打破了历来城市人“看”乡村人的心理上的安全距离。这些年来,大量农民工的进城,冲击了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成了下层城市居民的竞争对手。农民工还到处出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中,公交车上、街头广场上,有些人甚至还住进了城市人的小区。城市人真切地感觉到了农民正在“侵入”并瓜分原为自己独享的城市空间。另外由于城市中流动人员相对较高的犯罪率,不安全感正在城市人中弥漫开来。

所有这一切,对于文化人(身为文化人)的既有的农民观,不可能不造成冲击,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看”农民工的视线。以什么样的视线去面对这些脱离了乡村而闯入到城市中来的“农民”,成了一个问题。观念上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与现实中对“农民工”的不适感,多少让城市里的文化人感到无所适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知识界、文化界,可以看到大量的对作为抽象社会类别的“农民工”表示价值关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少见有认真以现实中的“农民工”为描述对象的视觉的或文字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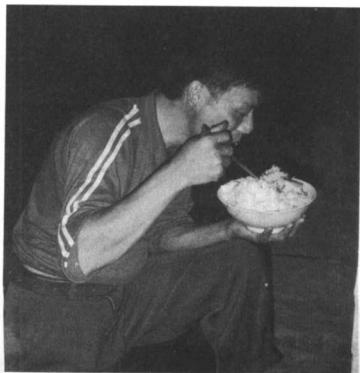
要么“乡村”,要么“都市”——这是笔者看过一些摄影家的纪实作品后留下的一个印象。而现在,张新民让我们看的,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城市中一批特殊的“来客”。

图像解读的多义性

《包围城市》是张新民多年经营的心血之作。为着这个专题的拍摄,他不仅北上南下,记录下了各个地方、各种类型的城镇中的农民,他还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整理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字说明。这样的拍摄,可称是一种研究型的创作。而从作品整体来看,作者举重若轻,《包围城市》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组具有解读多义性的图像:它既没有简单地

在路边端着斗碗吃饭的“棒棒”

重庆 1995



将“农民工”群体演义为一群承受着社会不公的、需要社会来关怀的“弱势群体”，也没有刻意描述这些来自农村的人群与城市间的格格不入。作者拍摄了从农村来到小城镇、大城市的“农民们”（说实话，照片中的有些人我们已经难以分辨其真实身份了），各色各样的人，以及他们的生存样态。

所谓图像解读的多义性，在这主要是指视觉资料可能具备的内涵意义的丰富多样性。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以及场景中人们的千姿百态所蕴含的各种意味，远不是一段文字的描述所能涵盖的。而生活情景的视觉化，好的图像，不应该由作者去框定、削除这种涵义的丰富多样性，而应该尽可能地将其保留下来。要知道，图像解读的多义性，正是图像区别于文字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新民的《包围城市》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于：他并没有将他的拍摄对象严格地镶嵌到他所规定的意义脉络中去，他为读者保留了多义解读的可能性。他既不像在扮演“农民工”的代言人或关怀者，也没显出在迎合城市人，他首先扮演了一个有心而尽职的观看者、记录者的角色。

就我个人来说，读张新民的这组照片，印象最深的，是进了城的农民虽然看似无孔不入般地漫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但显然，他们能够“在”的场所是被限定的，而且他们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从农村到城市，除了车站、车箱以外，工地、工棚、车间、街头，还有城市贫民的简陋住宅，便是他们所能呆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劳作、吃饭、歇息、看热闹，但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他人”的。

此外，张新民的作品还让我注意到了一个不无特殊的情景：各种各样的“小姐”们的城市生活，发廊小姐、礼仪小姐、陪酒陪唱小姐……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较之男性民工，似乎较易找到一些不必出苦力的工作，也较有可能体味城市人的消费生活（照片中的她们出现在一些大众消费场所）。她们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最早进入城市内部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正折射出了城市的欲望、城市的诱惑。

在看张新民的作品时，我曾偶然想到，我们原先看到的一些都市摄影，其实很可能是“视觉清场”的结果：那里面的人，一个个都是那么的“都市”。那样的摄影，要么是摄影家刻意选择了场景，要么是摄影家刻意选择了场景中的人。而反过来，多少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张新民在他的照片中，又让城市主要充当了进城农民的空间背景。城市社会与城市人，与这些农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同样不甚清晰。



三口之家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我和《包围城市》 张新民

这是一本关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和城市生活的书。里面的照片大多数是我的视觉记忆——我经历了，看见了，有些感受，然后用相机拍下来。存放在胶片上的这种记忆，记录了我所“看见”的对象，也记录了当时的我——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我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物质匮乏，照相机是稀罕之物，除了极少数富裕人家拥有之外，绝大多数掌握在宣传机构手里。鬼使神差，1981年我被调到这样的宣传机构编辑一份小报，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台照相机，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发表在传媒上的照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有“思想解放”一说。在此之前，和文学、绘画一样，中国摄影一直都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摄影术本来源自西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摄影从业者一直和西方隔绝，根本无法获取任何外面的信息，直到中国慢慢打开大门看世界。首先涌入中国大陆的，是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沙龙摄影，花鸟鱼虫、山水美人，基本上与社会生活无关。可能正是由于远离意识形态，这一类摄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右了中国摄影师的价值取向。摄影从业者和爱好者群起效仿港澳沙龙，日出日落、雪山草地、少数民族等等，成了摄影者猎取的主要对象。刚刚接触到摄影的

我饥不择食，很自觉的把这种摄影当成了追求的目标，一追就是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记忆被淡化了。

1988年的春天，我不顾一切地离开四川，去了海南岛。来自大陆各地的年轻人都试图在这个刚刚建立的新省施展抱负，当时有人问我：“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我说：“摄影。”人家问：“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摄影？”虽然当时我已经在海南的一家传媒做摄影记者，但是对于摄影的认识，确实不甚了了，依然在追逐图像的“艺术”与“诗意”。1988年的海南是动荡的，生存搏杀是严酷的，留给我的记忆极其精彩。非常可惜，由于摄影理念的不确定，我没有拍下多少和记忆相互对应的胶片，至今追悔莫及。

1988年底我离开海南岛到了深圳。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到爱伦·马克 (Ellen Mark)、德巴东 (Depardon)、罗伯

注目礼

深圳 1994



特·卡帕 (Robert kapa)、尤金·史密斯 (Eugene Smith) 这些西方摄影师的摄影。倍受推崇的“人文关怀”理念和西方摄影师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但同时也差点让我落入人道主义的圈套，去跟风追逐非常态题材来使自己有可能名垂青史。



在公路边开杂货店的当地农民
广东台山 1993

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是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和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自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1990年，我开始拍摄我生活的蛇口工业区。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门楼。拍摄这些打工妹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历史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文革和下乡插队这些在我看来极为珍贵的视觉记忆的缺席，是因为当时的年幼无知或者没有摄影条件的話，那么80年代的再缺席对于我的所谓“摄影”，实在是绝大的嘲讽。当时，中国封闭的大门已经打开，而且谁也不可能再把它关上，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带来找出路，势头汹涌。置身于这样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当时我应该做的摄影。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民工潮的规模越来越大，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离开土地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融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我的摄影也由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他们涌入的城市。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大多只是挂在嘴上的问题。社会对农民是蔑视的，民工潮带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生存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这冲击将改变现存的城乡格局。这种感受，用图片故事形式的几张十几张片子是不可能表述的。1995年左右，思路逐渐清晰起来，以“包围城市”作为拍摄题目的想法，自然而然凸显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到了1996年，我突然问我自己：“包围城市？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

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开始寻找一个乡村。需要“寻找”，是因为我视线所及的乡村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非常城市化了。

流坑作为一个乡村的纯粹和丰富，让我在1996—1999年多次往返其间。流坑给了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我拍摄的这个“源头”最后没有被收进《包围城市》这个选题。《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在2000年5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除了报社的事儿，那些年我就这样奔波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拍摄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和自己情感有关的照片。《包围城市》拍到2000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已经全面松动，大片农田变成了商住楼，被“包围”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乡村。土地能让开发商暴富，一纸城市户口却未必能让农民改变命运。农民们还是在不断地涌入城市，但态势已经和90年代不一样了。

我的视野就这样局限于乡村和城市的中间段，尽自己所能，拍摄和自己的经历与情感有关的照片，绝大部分是记录。除少数照片拍摄于80年代，《包围城市》粗选的210多张照片基本上拍摄于1990—2000年这10年之间。这期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人由不流动转为流动，尤其是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迁徙这一变化，我想，应该是无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我经历了这些变化，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我拍摄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

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我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

这就是2000年以前我所做的摄影。我在这个时期的视觉记忆。



吃的就是这碗饭
重庆朝天门 1995

附：《新周刊》杂志访谈（记者严志刚）

严：从外表上看，我觉得你挺像一个农民。当然不是贬义，我只是说这会不会有助于你在拍摄中更接近对象？

张：我是有农民血统。虽然我现在不是农民，但我当过农民，对农民的生活是熟悉的，拍熟悉的东西，和他们没有情感上的隔阂。

严：一开始拍摄《包围城市》你就有这样完整的拍摄思路吗？

张：当然没有。刚开始只是觉得再也不能去拍那些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照片了，熟悉的东西是自己的感觉，很实在，不熟悉的东西猎奇的成分很大。

严：你的照片给了我们很明确的这个时代的特定信息，你竟然还认为它不是一种“见证”？

张：照片呈现了摄影师和被拍摄对象的某种关系，我在拍照时尽量做到直接一些，这是我的拍照方式。细心的读者除了看到被拍摄的对象，还会看到摄影师。就像你读《老人与海》，听《一无所有》，你读到和听到的不是小说和歌曲本身，是海明威和崔健，他们的情感、想像力、智慧、价值判断及他们的一切。至于见证或者不见证什么，我认为不是作者可以说了算的。

严：从《包围城市》到《流坑》再到《石头记》，你无论是在拍摄手法还是选题上都有不断的思考和尝试。有没有认真想过摄影到底是什么？

张：拍摄《流坑》的时候，能否把照片拍得很“摄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以前提到摄影之所以很隆重，是因为以前相机很少，现在谁都有照相机，运气好的话都可能拍出一张很好的照片。摄影其实是很边缘的，图像的意义跨度很大，可以为任何一门学科所用。摄影有其他门类不可替代的功能，不必辛辛苦苦去为混入艺术圈而努力。

严：就摄影师和被摄者的关系来说，你和他们是不平等的，你是处在强势。在拍摄中会不会因为他们的麻木和缺乏抵抗使你更容易拍到你想拍的影像？

张：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讨论了一万遍。我认为这是属于摄影伦理方面的事，这里恐怕说不清楚。

严：我觉得今天的交谈是不是太严肃和沉重了点？

张：鬼才知道，我今天说的有点乱七八糟，也许是因为面对传媒吧。我不善言谈，可能只适合拍照和写字。

中国农民

包围城市

——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农民在占世界耕地7%的面积上，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今天的中国正在急速地向工业化靠拢，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避免地向城市流动转移，传统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着这些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1949年前后的中国饱经战争创伤，8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是一个工业产值仅占国民收入12.6%的农业国。为了尽快启动工业化进程，中国向前苏联学习，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受到了当时国情的制约，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建设周期长、项目投资大，大多数工作母机和技术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刚刚摆脱战争的中国尚未摆脱贫穷，资本稀缺，可利用的外汇尤其有限，量少的出口仅仅依赖廉价的农产品。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既不可能来自原本就很薄弱的工业，也不可能依靠外援，只能从最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即农业和农民中汲取，这种汲取就是对农产品施行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垄断收购来降低工业原材料成本和工资成本，再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形成一块利润，然后通过财政渠道不断转化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来源。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测算，在1950年以后的40多年里，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1258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支农资金和从农业部门的收益差额，农业为工业提供净资金10636亿元人民币。

这种人为扭曲产品价格要素的特殊的原始积累方式，只能在特殊的体制条件下产生，这种体制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城市单一的国有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计划的运作，严格限制产品的自由交换和自由流动，以行政手段控制资源的分配。同时在城乡之间，建立与之配套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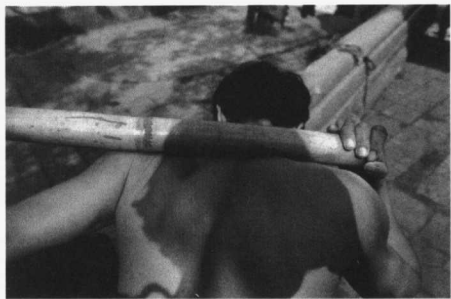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是不受行政限制的，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迁入城市(1954年宪法载入了迁徙自由的条文)。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民约165万左右，自然的人口流动为国家早期工业化和拓边垦殖提供了劳动力。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步

洗墙工的队长在指挥作业
深圳 1997



建立，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开始受到限制。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曾一度出现农业劳动力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致使1961—1963年自然灾害过后不得不进行调整，1964年城市向农村遣返了1300多万人。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到1964年的遣返调整，中国独特的二元化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趋于完善，城市的大门完全关闭。城乡隔绝的户口政策把公民身份分成了两个等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无一例外全部纳入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农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完全由人民公社掌握；而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则可以享受低价生活资料供给（即商品粮、棉、油），以及优先安排就业等一系列福利。城乡之间的差别被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农村子弟跳出龙（农）门局限于参军转业和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等非经济因素，其他途径很少。城乡隔绝的体制一直持续到80年代。

国家发展战略及其体制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其弊端也暴露得愈加明显。二元化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有效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保证了城市的低价福利分配，但是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大量农村人口长期被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人和土地的关系高度紧张，低效率低收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使农村和农业长期不能正常积累而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压抑，最终引发了70年代末期以农村为先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强壮的身体是“棒棒”们的本钱
重庆 1995

农村改革首先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家庭承包责任制让农民重新拥有了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使农业生产得到了第一次解放，农产品供给出现了全面增长。到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越过了温饱线，消费水平快速提高。这一时期的市场前景和劳动力资源迅速结合，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当地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不流动的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流动。1978—1984年，由农村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了2300万人。农民们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流动，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一开始就受到了政府的鼓励。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标志着城乡隔绝体制首次被正式修正。解除管制后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出现了迅猛的势头。1984—1988年，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动力猛增了4300万人。尔后，对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废除粮本和粮票制度、城市居民福利补贴由暗转明、城乡非国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及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城乡隔绝体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范围和政策空间越来越大。1988年，外出打工的农民超过了2000万人，到1993年以后，骤然上升到7000万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流动大迁移，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一向安分

守己的农民们，突然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离开乡村，走出山寨，目标一致：进城打工。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形成势不可挡的流动大潮。



前面的路
湖南怀化 1996

二

民工潮的来势之猛，令人始料不及。人们还没来得及问个为什么，城门已经被打开，铁路已经不堪重负，乡下人堂而皇之地在城里城外安营扎寨，城里人四平八稳的生活顷刻间被搅得乱了套。农村劳动力跨省市大规模流动，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既包括对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冲击，对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也包括农村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是否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土地搁荒弃耕、传统社区结构失衡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

流入城市的农民们一度被视为不安定因素——盲流，遭到城市的清退和遣返。但是80年代以后中国施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带的超前高速增长，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大规模的需求。加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农民向东部省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流动，没有因为清退遣返而受阻，反倒愈演愈烈，城市不得不予以正视并纳入政府日常管理。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对农民跨省流动施以就业证、卡管理。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

为了使大流动组织化、有序化，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具体的管理办法，社会各方面力量也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实施对流动的干预和影响，众多措施所凸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加重了农民的流动成本。据调查，有的地方要求“外来工”、“农民工”必须办理的各种证、卡多达六七种，有身份证、健康证、婚姻证明、受教育程度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外出人口就业卡，以及进出特区通行证、一些行业性的上岗许可证（卡）等等，其中一些证、卡需要定期更换，每次更换都要交费。

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们，大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做临时工、季节工，干的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不屑于干的脏、重、险、累而且报酬又低的体力活。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劳动保险大多仅限于重大工伤事故，通常是一次性赔偿了断。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作注定了外来工、农民工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90年代尚未改革的户籍制度，决定了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可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民工们也没有在城里买房的经济实力，他们通常聚居在临时性的出租屋、工棚，甚至尚未完

工的建筑物里。条件好一些的企业,会提供集体宿舍,但是绝少有夫妻或小家庭能共处一室。子女要想在城市学校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交纳高过城里人数倍甚至数10倍的学杂费。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民办学校开始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边缘地带,还出现了很多以流出地域划分的民工聚居区(如浙江村、河南村等等),小商店、简易娱乐场所、临时的交通线路等等一应俱全,形成了独特的带有贫民窟性质的小社区小社会,虽然屡遭清理,但是一直清而不绝。

农民们向城市远征,所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阻力是:城里人对农民的心理上的抵触甚至歧视。大多数城里人对传统户籍制度习以为常,对于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觉得是天经地义: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农民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就应该呆在农村,进城就增加了城里人的就业压力,等于抢他们的饭碗,不利于城市的稳定。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长期带来的贫富差距和教育水平差距,使很多城里人脑海里形成了难以更改的印象:没文化的农民素质低下,因而对农民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鄙视。慢慢地,贫穷、落后、愚昧、保守几乎成了中国农民的代名词,连城里人骂人都说“真他妈农民”!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土里土气的“外来”民工承担了城里人不愿意承担的劳动,中国的城市才在上个世纪末有了飞速的发展。如今,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工业生产和城市设施建设,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都已经离不开进城打工的农民了。城里人也都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要想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

民工之所以廉价,除农民自身的整体素质之外,还在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城市“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叫“人才市场”,进进出出的都是城里人——城市里还有着数百万失业人口。城乡隔绝体制虽然已经被动摇,但区别城乡居民不同身份的制度还存在,就业竞争被身份所分割,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一个有限度的、体制外的范围内存在。为了在城里挣得的现钱高过在家乡务农的收入,农民们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打工收入的不确定不稳定,以及过高的风险成本和心理调节成本,使绝大多数农民感受到,进城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三

流向城市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真正进入城市。他们离开了农村,但是依然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走进了城市,但是不为城里人认同;他们已经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加入了产业工人队伍,却又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城市也改变着这些“外来”

奔波

武汉 1995



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除台湾省以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按地理位置的不同，习惯上划分为三大地带，即东部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9个省（市、自治区）和西部9个省（市、自治区）。80年代以前，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是非常明显，90年代以后，东部高速发展，地区差距急剧拉大。1994年，三大地区差距比为549:212:100，而且呈上升趋势。在地区差距拉大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49:1。中西部地区农业效益非常低下，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亏本，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90年代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低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在增长。抽样调查显示，1999年，安徽、重庆、四川、湖南、江西5省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分别达到217、120、197、159和88亿元。5省市总计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已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统计数的107.9%，其中安徽、重庆两省（市）最高，分别为124.5%和156.5%。

大规模的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收入，也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职业结构带来了变化，种田不再是乡下人的惟一选择。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经历，使有心计的农民们学到了技术，看到了城里人在怎样经营企业管理企业，从而有了新的发展观念。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回乡创业的“打工仔”同时也把城里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回了乡村，在子女教育、婚嫁观念、对社区管理的参与以及事业心和成就感等等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出过门进过城的农民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家庭经营的兼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打破了传统小农经营的稳态格局，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中国农民的分化进程已经开始。

199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从1991年的34186万人减少到1994年的32690万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被认为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尽管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劳动力跨地区的大流动吸纳了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总数

在1.7亿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处于就业极不充分状态，占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对全国30个省市区6万多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测算：2001年全国农村有18.6%的劳动力外出打工，达到8961万人。农村依然是劳动力的“净输出”部门，每年需要安排的剩余劳动力将维持在千万人上下。受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布局分散等因素影响，近年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加入WTO后，开放国内农产品市

一次成像

牡丹江 1995



场又将影响农业领域的就业，如不开辟新的转移渠道，仅靠在农村内部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这一种方式，本来就相当严重的农民就业问题将会更加恶化。

四

农民进城，绝不仅仅是农民向往城市生活的一厢情愿，而是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农业人口过于庞大和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的现状，以及体制因素，决定了90年代的大流动只是移动而非移民。农民向城市移民之所以成为艰巨的远征，难以跨越的是城乡分离的制度框架，以及在这个框架内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由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手段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必然牵连到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导致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加，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在1992年就已经被提出，但是发育伊始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带着明显的体制分割性，是否具备城市户口几乎是当时所有企业招工简章中的先决条件。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劳动力市场的相对价格扭曲，民工工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户口工人工资的45%左右，在人身、工伤、医疗保险、带薪假期、实物收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条件和待遇，民工更是不能和城市普通职工同日而语。相反还得付出延长工作时间、忍受恶劣环境、雇主克扣拖欠工资、受人歧视刁难等等身心代价。体制分割带来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助长了个体行为短期化和市场无序，抑制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需求。尽管民工潮年复一年，但是这种看似汹涌的移动并不顺畅。

与进城打工相比较，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则感受不到来自城市的歧视，即便是做苦力，也因为挣钱多而受到村里人尊敬。体制分割的特性，使进城的农民感受到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保障还是城里人所没有的土地，土地依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的水土资源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1亩，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给了开发商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如果说90年代农民离土离乡进城打工，并指望获得一纸城市户口改变自己身份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突如其来的城市化热，则迫使农民重新考虑：是选择户口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90年代，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90—1996年，中国城市（未统计台湾省）由467个增加到666个，城市总人口从1990年的30 191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5 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1996年的29.39%。在全国666个城市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75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99个。2001年以后，中国的建制镇已从70年代的2 800多个，增加到1.2万



台风
深圳 1995

多个。全国不包括县城在内的小城镇，拥有人口1.5亿人，其中有1亿人属非城镇户口。

2001年3月底，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规定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建制镇，只要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并规定，要保障在小城镇落户人员“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当地原有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不得对其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得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机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不光小城镇，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户籍政策也开始松动和变革，暂住户口、临时户口、蓝印户口等等相继出现。城市的大门终于开启，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说，要想当上一个城里人已经不再是梦想。

五

户籍制度改革趋向城市化，地方层面兴起了推进城市化的高潮，学术界在讨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产业界则在摩拳擦掌——盯住掌握权力的官员展开“公关”，拿到廉价土地，然后从银行贷款开发一个社区，赚回更多的钱。

从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开始，IT高新科技园、大学城、工业园、县改市、撤乡建镇、撤镇并镇，任何一个新名词的出现都意味着农田的消失。有关统计显示：仅1992年一年，“开发区热”就占掉了耕地2400万亩。乡村变成了城市，田野变成了高楼，一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开发区”为名圈地，但是这种圈地运动式的城市化，却没有把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过去“农转非”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在于“吃商品粮”，政府责成征地单位负责安排工作。如今商品粮和其他福利性的补贴早已不复存在，政府已经无力再为城市居民安排工作，更何况新入城的农民。用土地换来的一纸城市户口，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进城后的住房、就业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社会环境变了，安置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征地补偿依然是非市场化的、强制性的行政标准，再扣除村集体、乡镇政府以及各部门所得，最后落到农民手中的一次性了断补偿极其有限，大约仅占征地价的25%—30%。这种不公平的土地与城市户口的交换，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往往是强制性的。如果说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有回乡的选择，那么落入“农转非”的农民们则已是彻底无路可逃。

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农民曾经交出土地上的收获，当城市化梦想来临的时候，农民交出的则是土地。拥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经营权和大部分受



农闲时的茶馆

四川广汉县连山镇 1984

益权以及部分处理权的农民,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并不知道自己对土地有多少发言权,不知道土地到底值多少钱。土地价值的闷棍还没反应过来,有了城市户口的农民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残酷的就业竞争,他们的素质技能在城市里明显处于劣势,很多人因为在城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而沦为城市新的流民。和90年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流民的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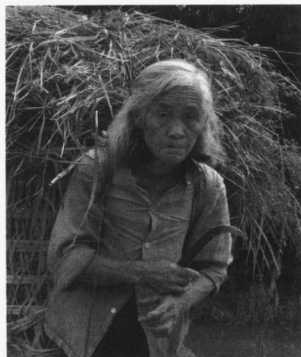
农村包围城市,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格局却是截然相反:城市向农村侵袭。

学术界描述的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向农村侵袭,拿走的是农村稀缺的土地,而不是农村富裕的劳动力。

未来5—1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经济发展对耕地的占用还将保持较高的需求。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1997—2010年,全国共将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950万亩,其中95%以上为集体土地。据测算,将有近2000万被征地的农民需要安置。但面对各地已然兴起的城市化热潮,这个数字还过于乐观。有传媒报道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城市化计划:山西,建好一个现代化大城市,搞好5个城市群,发展100个小城镇;广西,“十五”期间城市化要“采取超常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由20%增至28%;河北,拟将城镇人口比重从目前的29.5%提高到2005年的37%和2010年的43%;江苏,城市人口比重由1999年的34.3%提高到2005年的45%;湖北,2005城市人口指标是38%;广东,2010年城市人口指标计划达到50%。

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全新的城镇化大战略,其目标是转移农村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最浩大的“农转非”工程。

城市大门对农民敞开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让农民进来挣钱,然后再返回乡村,而是要让农民转为市民。面对这个大跨度的转型,农民还将付出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那是另一场远征——农民到市民的远征。



田间归来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完稿于2002年7月21日 蛇口

参考文献:

- 《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年11月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2001年10月
 《中国如何应对高失业率的挑战》 胡鞍钢 2002年7月17日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罗小韵提供 2002年6月
 《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陈廷暄 2002年7月8日
 《流民的诞生》 2002年4月18日《南方周末》



20世纪初，美国著名摄影家里斯名作《五分钱一个床位》中的惨状，

在一个名叫张新民的中国摄影家的照片里，

我们发现了变本加厉的翻版。

在张新民的照片里，我们更其悲哀地发现，

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共住满了20个人，

其中好几个家庭是一家占用一个床位。

就是这种现状，

使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寝食难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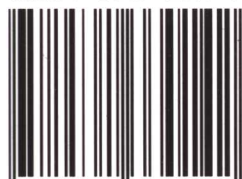
以他的影像展开了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全程追踪。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他以他特有的敏锐与执着，

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ISBN 7-5613-3014-6



9 787561 330142 >

ISBN 7-5613-3014-6/D·72

定价：36.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314092